



著林大斯

論中國革命

編會總會協好友蘇中
行發店書華新

基本定價(甲)5.90

斯大林著
論中國革命

新華書店發行

出版編號 0325

論中國革命

著者 斯大林
編者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版
一九五〇年五月再版

渝(134)1-10000

例 言

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特別是在中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時期，斯大林作了和寫了一系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講演、報告和論文。在這些著作裏面，他深刻而精闢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動力、任務、性質、前途和意義。今天中國人民大革命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業已取得了基本的勝利，這光輝地證實了斯大林這種英明的分析和科學的預見。同時，從這些著作裏，我們可以看出斯大林對中國人民的命運，對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與自由的革命鬥爭，是如何的同情和關心！今逢他的七十大壽，中國人民感到特別地興奮和快活。爲了祝賀這個偉大的日子，

爲了廣大地傳播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著作，我們從他的著作中選了主要的幾篇，印成這本小冊子，並以陳伯達同志專爲祝賀斯大林七十壽辰而寫的『斯大林與中國革命』一文，作爲代序。

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幹事會研究出版部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

目 錄

斯大林與中國革命（代序）	陳伯達	一
不要忘記東方（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民族生活」第三期社論）		三
聯共（布）第十四次大會政治報告節錄：關於			
中國革命的力量（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四〇
論中國革命底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產 國際執委中國委員會上的演說）		四三
一 中國革命的性質		四四
二 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干涉		四七
三 革命軍隊在中國		五一

四	中國未來政權底性質.....	壹
五	中國的農民問題.....	貳
六	中國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參
七	關於中國青年的問題.....	肆
八	若干結論.....	伍
	給秋公諾夫的信（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	陸
	中國革命問題（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爲宣傳員而作的提綱，經聯共（布）中央批准）.....	柒
一	中國革命底前途.....	壹
二	中國革命底第一階段.....	貳
三	中國革命底第二階段.....	參
四	反對派底錯誤.....	肆

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九

第一個問題…………… 九

第二個問題…………… 九

第三個問題…………… 九

第四個問題…………… 九

第五個問題…………… 二

第六個問題…………… 二

第七個問題…………… 二

第八個問題…………… 三

第九個問題…………… 三

第十個問題…………… 三

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底任務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產國際執委第十大會議上的演說) 一三

一 幾個小的問題 一三

二 農民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基礎 一五

三 屠殺共產黨員的南京右派國民黨與支持聯合

共產黨的武漢左派國民黨 一六

四 論中國工農代表蘇維埃 一五

五 兩條路線 一六

時事問題簡評：關於中國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一七

國際形勢與蘇聯國防：關於中國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委會全體聯席會議上的演說) 三

斯大林與中國革命（代序）

陳伯達

——爲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而作

一

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的大會上說過：「斯大林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全人類中間，出了這位斯大林，這是一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辦了。你們知道，馬克思是死了，恩格斯是死了，列寧也死了，如果沒有一個斯大林，那一個來發號

施令呢？這真是幸事，現在世界上有了一個蘇聯，有了一個共產黨，又有了一個斯大林，這世界的事情就好辦了。」毛澤東同志向我們中國黨的同志指出：「我們要慶祝他，擁護他，還要學習他。我們要學習他的兩個方面，一個是道理方面，一個是事業方面。」

毛澤東同志說明了斯大林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功勞，說明了斯大林指導完成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是「開天闢地的大事」，說明了斯大林在道理方面與物質方面援助中國人民的事業。毛澤東同志說：「在過去，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理論上指導世界革命。現在加了一點東西，可以在物質上幫助世界革命了，這就是斯大林的大功勞。」

時間又過了十年，現在我們在慶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壽辰。這時間，正是在人類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以蘇聯爲首的各國人民打倒德、意、

日三個法西斯帝國之後，是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新的人民民主國家之後，是在中國人民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並接着進行推翻國民黨反革命統治、驅逐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因而得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是在蘇聯在世界上無比地強大、而以美帝國主義爲首的世界帝國主義制度則正搖搖欲墜的時候，這十年來的一系列偉大歷史事變，都是和斯大林的名字分不開的，都是和斯大林的事業分不開的，都是和斯大林對於各國人民的援助分不開的。十年來的世界歷史事變，更加說明了斯大林不但是蘇聯人民勝利的旗幟，而且是世界一切進步人類勝利的旗幟，同時也更加說明了毛澤東同志在十年前所指出的：「斯大林是世界革命領袖的領導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全人類中間，出了這位斯大林，這是一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辦了。」世界上有了這一位斯大林，「這真是幸事」啊！

斯大林壽辰是世界上的「人日」。中國人民能够和蘇聯人民一道，和世界上一切進步的人類一道，來共同慶祝這一位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以後，在人類解放事業上聯繫最普遍、成就最寬廣的世界最偉大人物和天才導師的七十壽辰，這個慶祝本身也就是中國人民的幸事。這個慶祝本身就是慶祝人類的解放，慶祝人類的希望和將來。

但我們中國人的慶祝斯大林，還有其特殊的方面，這就是：斯大林與中國革命的密切關係，斯大林的關心中國人民的命運及其在中國革命問題上所作的偉大理論貢獻。

二

根據對於中國社會具體情況的具體分析，斯大林，這位唯物辯證法的

科學大匠，世界的革命導師，在中國第一次大革命的時候，提出了關於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問題，並對之作了極端英明的論斷，粉碎了反革命托洛茨基派關於中國問題的胡說八道，幫助了中國黨走上了布爾什維克的道路。斯大林在這個時期內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正是革命理論與革命實際結合的模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寶庫裏面有關人類命運的重大一部分，那許多著作不但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而且在二十幾年來的中國革命實踐中，也都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當中國人民初初露出自己的革命鋒芒的時候，斯大林即已看出中國革命具有無限的力量。最近馬林科夫在紀念十月革命的報告裏面，曾特別引述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的一段預見：

「中國革命運動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這種力量還沒有能使自己確當地爲人

感覺出來。但是它們定會在將來使它自己被人感覺出來。看不到這種力量以及不給它們以應有估計的東方和西方的統治者們，將要因此吃大苦頭。」

斯大林這一個預見，是建立在計算中國政治經濟諸條件和中國社會內部各種力量對比的基础上面，同時也是建立在計算世界政治經濟諸條件和世界各種力量對比的基础上面。

關於中國方面，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間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時候，曾經作過這樣一個重要的估計：『中國革命主導者和領導者的作用，中國農民領袖的作用，不可避免地要落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手中。』斯大林這個估計，是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這一點聯繫起來講的。這是非常重要的估計。因為如果是這樣，如果只有中國無產階級才能成爲中國革命的領導者，那麼，中國農民及其他一切人民大眾，就有可能在

國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把自己的革命力量發揮到盡致，而這個佔有地球上人口將近四分之一的國家的人民大眾，一旦能夠作到這一點，那它就必然要改變世界的面貌。

關於世界方面，顯然地，斯大林是從列寧發明的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及其矛盾的特別尖銳化這一個著名的規律出發，因而估計到中國革命有可能跟着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繼續在東方衝破帝國主義的陣綫。斯大林又是從蘇聯的存在和強大這樣一個事實出發，這就是斯大林在「論中國革命前途」所指出的：「……與中國並列着的，還有蘇聯存在和發展着，它的革命經驗和幫助不能不便利於中國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中國中世紀封建殘餘的鬥爭。」

因為斯大林的預見是從堅固的科學基礎上出發，他看到了中國人民鬥

爭之異常深刻的性質，所以不論在什麼時候，不論中國革命曾經遇到如何重大的挫折，他都相信中國革命終將前進而取得勝利。當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後，斯大林即駁斥了托洛茨基派把土耳其『基馬爾式的革命』和中國革命混爲一談的胡說。斯大林分析了中國和土耳其的差別，認爲在中國沒有土耳其『基馬爾式革命』的可能。斯大林說：

「……在中國，帝國主義却不能不從民族的中國之活的肉體上開刀，把它割裂成許多塊，奪取它的整個省份，以保持他們的舊有陣地，或者最低限度維持這些陣地的一部分。因此，要是在土耳其，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可以基馬爾主義者的斬了尾巴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而告終，那麼在中國，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一定要採取深刻的人民的和鮮明的民族的性質，一定要一步加深一步，一直到和帝國主義作拚命的決鬥，震撼帝國主義在全世界的基礎本身。」（斯大林：『與中山大學

學生的談話」)

斯大林又指出：

「在中國，不是中國的墨索里尼如張作霖張宗昌之類獲得勝利，後來由土地革命的浪潮，把他們沖倒；就是武漢（指當時革命的武漢而言——伯達註）獲得勝利。蔣介石及其黨羽，企圖在這兩個陣營之間找一條中間路，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倒台，和張作霖、張宗昌遭受同一命運。」（斯大林：「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

當汪精衛接着蔣介石繼續叛變革命之後，斯大林又繼續駁斥托洛茨基派關於中國革命破產的胡說，而斷定中國沒有改良主義的可能。斯大林說：

「新舊軍閥相互間的混戰，又重新爆發起來，這個戰爭，不能不削弱反革命

的力量，同時不能不使農民破產，怨天怨地；」

「在中國還沒有這樣一個集團或這樣一個政府，這樣集團或政府能夠實行類似斯托雷賓式的改良，可用作統治集團的避雷針和續命湯；」

「要壓抑那亟欲奪得地主土地的千千萬萬的農民，並使他們對土地垂頭喪氣，那是很不容易的；」

「無產階級在勞動羣衆當中的威信，一天一天在增強着，他們的力量還是遠沒有被殲滅的。」（斯大林：「時事問題簡評：關於中國」）

事實的發生是預言的試金石。

一九二七年以來，在中國發生了一系列事變：蔣介石變成中國的墨索里尼而代替了張作霖、張宗昌，國民黨新舊軍閥互相間的不斷混戰，中國土地革命的浪潮，國民黨反革命統治任何「改良主義」企圖的破產，日

本帝國主義——接着又是美帝國主義的在中國肉體上開刀，中國人民同日
本帝國主義及美國帝國主義作了拚命的決鬥，這種鬥爭的震撼帝國主義在
全世界上的基礎，蔣介石走上了與張作霖張宗昌同一命運而從反革命的政
治舞台上倒下來……這一系列的事變，完全證實了斯大林二十幾年前的預
見。

斯大林的預見，在二十幾年來鼓舞了中國人民的鬥爭，顯出了革命科
學是不可抵抗的力量，同時又暴露了托洛茨基派和一切反革命丑角替蔣介
石汪精衛的反革命作無恥吹噓的醜態。

三

一九二七年五月間，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作了這樣的

概括：『今日在中國革命便是兩支革命運動的巨流——反封建殘餘的革命運動與反帝國主義革命運動之匯合。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是反封建殘餘鬥爭與反帝國主義鬥爭之匯合。』（斯大林：『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底任務』）這是斯大林精闢分析中國社會所得的結論。這是對於中國革命問題有很重大歷史意義的結論。斯大林指出：這是當時『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問題全部路綫的出發點』。當時托洛茨基派正是反對了這樣的路綫。托派認為中國對外的問題只是海關的問題，因而否定了中國革命的反帝國主義性質；托派否認中國封建殘餘佔有優勢的作用，因而否定了中國革命的封建性質。斯大林指出：托洛茨基及其嚙囉們所持的這種觀點乃是反革命的張作霖與蔣介石的觀點。大家知道：中國托洛茨基派正是根據了托洛茨基全部反革命的觀點，同時又根據其關於中國問題這種反革命的觀

點，而和各國托洛茨基派一道，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斯大林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僅在反對封建殘餘而已，它同時還反對帝國主義。』（斯大林：『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底任務』）必須根據中國社會的情況從而確定這樣的革命性質，我們黨才能正確地估計在每一個具體的歷史場合上階級關係的具體變化，以便規定革命的具體任務，組織革命的陣綫，而引導革命向前邁進，並造成中國革命在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之下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有長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一九二七年陳獨秀機會主義就是反對了斯大林這個辯證法的分析的。陳獨秀主義後來即和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義合流，這是大家都知道的，這裏不準備去多說它。這裏需要指出：一九二七年以後，二十幾年來，在我們黨內發生的或『左』或右的機會主義錯誤，也通常首先是在革命性質問題上違反了

斯大林這個辯證法的分析，或者疎忽了反帝這一方面，或者疎忽了反封建這一方面。例如在十年內戰期間內，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就長期疎忽了反帝這一方面，疎忽了斯大林所指出的『中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其鋒芒是反帝國主義』（『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底任務』）；因而不善於利用形勢去正確地組織反帝的陣綫，以配合土地革命的鬥爭，而打破自己的孤立。他們在這一個時期內，並過早主張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冒險。又例如在抗日戰爭期間內，原來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志轉而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們的意見又正像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主義一樣，疎忽了反封建這一方面，『只看見資產階級』，『沒有看見中國土地革命運動底決定的意義』，『不主張放開鄉村裏的革命，害怕農民革命破壞了反帝國主義統一戰綫』。當然，這種錯誤的意見也恰恰是直

接反對了斯大林，因為按照斯大林的意見乃是這樣的：『中國農民捲入革命越快越徹底，則中國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綫，亦將越強大越有力量。』（『論中國革命底前途』）這類右傾機會主義者在這一個時期內，既然否認了反封建這一方面，所以就又和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主義一樣，主張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只看到資產階級的前途，而沒有看到人民革命勝利的前途與社會主義的前途。

很明顯，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是和中國革命每一個階段的具體策略問題相聯繫的。如果他在革命性質的問題上犯了錯誤，那麼他在具體的革命策略問題上，也就不能不犯錯誤。

斯大林在駁斥托洛茨基派關於中國問題的胡說的時候，曾經特別說明了列寧主義的幾個主要策略原則：

「第一，在製定共產國際對於每個國度工人運動底領導指示時，務須要考慮到這些國度的民族特點與民族特殊性之原則；第二，各國共產黨務須利用極小的可能以保證無產階級須有羣衆同盟者之原則，即使這個羣衆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堅定的、不可靠的也罷；第三，務須考慮到這個真理之原則，就是爲了政治上教育千百萬羣衆，僅僅是宣傳和鼓動一項是不夠的，爲了這個目的，還需耍羣衆自身的政治經驗。」（斯大林：『時事問題簡評：關於中國』）

斯大林接着又着重地說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則與民族特點相結合的問題。斯大林寫道：

「雖然我們黨有思想上的增長，但是可惜的，在我們黨內還存在着某種類的「領導者」，這些「領導者」誠懇地相信，可以根據電報，可以根據某些公認的共產國際的一般原則來領導中國革命，而無須考慮到中國經濟、中國政治制度、中國

文化、中國道德、中國傳統的民族特點。這些「領導者」與真正領導者的區別，就是不論任何時候他們的懷中總有着兩三個現成的、適用於一切國度和任何條件之下的所「必須」的公式。考慮到每個國度底民族特點和民族特殊性的問題，對於他們是不存在的。把共產國際的一般原則，跟每個國度裏革命運動之民族特點聯繫起來的問題，使共產國際的一般原則適用於個別國度底民族國家特點的問題，對於他們是不存在的。他們不懂得，在各國共產黨已經長大而成爲羣衆性的政黨的現在，領導底主要任務，就在於發現、掌握及善於把每個國度革命運動底民族獨有的特徵，跟共產國際的一般原則結合起來，以便促進和在實踐上使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目標能夠實現。因此，便企圖把一切國度的領導千篇一律化。因此，便企圖機械地搬用若干一般的公式，不考慮到個別國度裏革命運動之具體條件。因此，在公式與個別國度裏革命運動之間便發生了永久的衝突，這些衝突乃是這些不幸領導者領導之基本結果。」（同上）

斯大林特別地用中國的革命性質問題來說明中國的革命策略問題，並從而駁斥了托派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同時又是關於中國革命策略問題上的胡說。斯大林把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和中國革命策略的問題聯繫起來，而指出了並概括了中國革命的民族特點。

斯大林這裏所闡述的思想，用毛澤東同志平常的語言來說，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一九二七年以來，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者，他們又是犯『左』的或右的機會主義者，他們的錯誤，也正是忘記了斯大林這個駁斥托洛茨基派的教訓，而認為領導中國革命，只需要他們的懷中有兩三個現成的、『適用』於一切國度和在任何條件之下所『必須』的公式就够用了。考慮到中國民族特點和民族特殊性的問題，對於他們是不存在的。因此，在他們機械搬用若干的

公式與中國的具體革命之間便發生了永久的衝突。

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把自己限制在抽象的公式和簡單的歷史類比裏面，而不從中國的具體情況出發，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在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上，或在這個時候犯了這個錯誤，或在那個時候犯了那個錯誤；又因此，他們也就不能按照具體情況的變化而把原則性與靈活性結合起來，不能如斯大林所說：爲了擊敗強大的敵人，『就需要有無產階級的靈活和深思熟慮的政策，就需要善於利用敵人陣營裏的每個空隙，善於給自己找尋同盟者』（『時事問題簡評：關於中國』）。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在十年內戰時期主張一切打倒，或者如毛澤東同志對他們的嘲笑：『在朝的打不倒，就要打倒在野的。人家已經在野了，你還要打倒他。』但在另一個歷史場合，例如在抗日戰爭的場合，他們却又轉到主張一切聯合，而否認抗日統

一戰纔裏有左中右三派，否認我們黨對於這三派的政策應有的區別。又因此，他們也就不會按照具體情況去認真聯繫羣衆，而是對於羣衆實行一連串的命令主義。斯大林說：『必須要使羣衆自己根據親身的經驗去認識國民黨領導當局底不可靠性、反動性、反革命性。』但是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忘記了斯大林這個教訓，以爲只要少數『領導者』認識，就可發號施令使羣衆跟着來了。斯大林說：『革命不僅是先鋒隊、不僅是個別的即使是「偉大」的「人物」所「幹」的，並且首先、而且主要地是千千萬萬的人民大衆來幹的。』但是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忘記了斯大林這個教訓，以爲革命首先、而且主要地是他們幾個自以爲是的『領導人物』所『幹』的。

三十年來的中國事變，說明了中國革命進行的極端複雜性與極端曲折性，而這種極端複雜性與極端曲折性，特別是由反帝鬥爭與反封建鬥爭的

複雜地和曲折地交錯所引起的。這樣，也就引起了一系列的革命策略問題，引起了統一戰綫的問題，引起了革命在城鄉之間關係的問題，同時也引起了軍事鬥爭重要戰略的問題。正如斯大林所說：『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樣武裝鬥爭的進攻重點，在什麼時候需要放在什麼地方？是否在進攻中還有防禦或退却？進攻與防禦或退却如何互相結合？防禦或退却又如何轉變為進攻？大家知道，這等等一系列的問題，乃是毛澤東同志在長期中和機會主義（時而冒險主義，時而逃跑主義）鬥爭的重要部分，而凡是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正是反對了斯大林。

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叛變之後，發生了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當時托派是主張冒險對上海進攻的。斯大林反對了這種冒險。當時斯大林說：『上海是各帝國主義集團重要利益交錯底世界中心。』斯大林

主張要『在軍事上充分準備，盡量發展土地革命，進行緊張的工作，以破壞蔣介石的前綫與後方，然後再提出上海的全部問題』（斯大林：『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因爲『在不順利條件之下，要是不避免（要是可以避免的時候）決死的戰鬥，這等於幫助革命的敵人』（斯大林：『中國革命問題』）。但在十年內戰時期內，我們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就恰恰主張在力量懸殊的條件之下對大城市進行簡單盲目冒險的進攻，主張在不順利的條件之下要和敵人進行決死的戰鬥。

斯大林說：『有些同志以爲在一切戰綫上同時進攻，是現在革命精神底基本徵候。不，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在目前（指當時在蔣介石叛變革命之後——伯達註）在一切戰綫上進攻，乃是愚蠢，而不是革命精神。不能把愚蠢和革命精神混爲一談。』（斯大林：『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

但在十年內戰時期內，我們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就恰恰不管在什麼條件下，都主張在一切戰綫上進攻，而把愚蠢和革命精神混爲一談。

斯大林說：『不能把革命運動看作一直上升的運動。這是對於革命的書本的非現實的觀念。革命總是曲綫進行的，它在一些區域裏進攻和破壞了舊制度，而在其他區域裏却遭受到局部的失敗，實行退守。』（『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但在十年內戰時期內，我們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就恰恰認爲革命只能是筆直上升的運動，革命的進行是不能有什麼曲綫的，因此，他們就認爲要進攻的話，就只能全綫進攻，或叫做『全綫出擊』。如果有人主張要在一些區域進攻，而要在另一些區域退守，那麼他們就要『斷定』那是『機會主義』的。

斯大林說：『不能一下子把一切任務放在自己身上，這會有支持不住

的危險。」（「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但在十年內戰時期內，我們的「左」傾機會主義者，就恰恰當我們革命力量還很不足的時候，主張一下子把「一切打倒」、「全綫進攻」的一切任務，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切任務，都放在自己身上。如果有人批評這種做法「會有支持不住的危險」，那末，他們也就一定會給人家戴上一頂「機會主義」的帽子。

很明顯，一九二七年以來，我們黨內一些先後犯各種機會主義錯誤而反對毛澤東同志正確路綫的同志，不論在革命性質問題上或革命策略問題上，不論在政治問題上或在軍事問題上，都正是忘記了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駁斥托洛茨基派的各種教訓，因而使我們革命的進行嘗過了不少的苦頭。

四

毛澤東同志是正確的。我們黨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終於在曲折的道路上，克服了客觀的困難和主觀的錯誤，而把革命進行到勝利，就是因為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關於中國革命策略問題，是和斯大林的思想完全一致的，並在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發展了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思想。毛澤東同志在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內，就極力堅持無產階級必須領導農民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以支持反帝國主義的鬥爭，而反對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在十年內戰時期內，在當時的土地革命運動中，毛澤東同志則又始終不忘記反帝國主義這一個極端重大的政治因素，而反對了「左」傾機會主義。毛澤東同志關於建設革命根據地的戰略計劃，以

及所規定的對各階級的政策如爭取中間階級等等，都正是把反帝國主義這一個因素計算在內的。在抗日戰爭時期中，毛澤東同志認為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必須發動農民羣衆才能使抗日戰爭得到廣泛的羣衆基礎，才能使抗日戰爭有成爲人民的勝利的可能，因此就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作了極頑強的鬥爭。歷史證明：與斯大林思想相一致的毛澤東同志在各個革命時期內進行的這些鬥爭都是正確的，特別是在抗日戰爭的初期和中期關於黨的路綫問題的鬥爭，乃是決定了現在中國革命勝利的全局。

不錯，應該說明這麼一個事實：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曾經在很長的時候，不論是在一九二七年陳獨秀還在當權的時候，或在一九二七年以後，機會主義者總是或有意地或無意地阻礙在中國黨內散佈和宣傳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又因爲文字的條件，反革命的隔離，就

使得我們黨內許多在實際上領導中國革命的同志沒有機會去有系統地閱讀到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而毛澤東同志也是其中的一個。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許多著作是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以後，才在我們黨內有系統地編輯出來，而在不久以前，並經過毛澤東同志規定編出『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一書爲十二本幹部必讀書之一。機會主義者爲着散佈自己錯誤的觀點和主張，而或有意地或無意地掩蓋斯大林關於中國問題的著作，這一點對我們黨說來，是很不幸的。但雖然這樣，毛澤東同志在許多根本問題上，却能根據馬、恩、列、斯的革命基本科學，以自己獨立的思考達到了與斯大林相同的結論，因而保持了自己和他的戰友們的正確。

毛澤東同志有機會寬泛地閱讀斯大林的著作，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用最高的熱情，來閱讀和深思熟慮他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各種著

作。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在他所寫的「新民主主義論」裏面，就說明了斯大林的著作所給他的重要的啓發。毛澤東同志說明了中國共產黨人提出關於中國革命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這一個正確的命題是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的。毛澤東同志根據斯大林的理論發揮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而在這部署名的戰鬥著作裏面，一方面迎頭痛擊了關於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反動夢想，另一方面則迎頭痛擊了企圖使無產階級追隨資產階級的黨內機會主義。

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以來所寫的許多著作裏面，特別喜歡咀嚼斯大林關於「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人民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一句名言，又特別喜歡咀嚼斯大林關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這一句名言。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情況，把斯大林這兩句名言聯繫

起來，加以發揮，而嚴厲駁斥了抗日戰爭時期我們黨內機會主義者忽視無產階級必須領導農民戰爭這一個最基本的觀念與政策。

爲着準備我們革命的勝利，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一——四二年發動了我們黨內的整風運動，這時毛澤東同志特別喜歡反覆引用了斯大林那部在思想上武裝全世界布爾什維克的傑作——『論列寧主義基礎』裏面關於理論與實踐相互關係的兩句話。毛澤東同志說：『依然是斯大林的話說得對：「不與實踐相聯繫的理論只是空洞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不與理論相聯繫的實踐只是盲目的實踐。」』毛澤東同志應用了斯大林的前一句話，去反對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而應用斯大林的後一句話，去反對我們黨內的經驗主義。

毛澤東同志把斯大林論布爾什維克化的十二條件和聯共黨史結束語六

條列爲我們黨整風運動最基本的文件。毛澤東同志爲着使同志們能夠深思熟慮斯大林這兩個文件，特別作了一次很長的演講，他認爲這兩個文件是一致的東西，是一百年來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革命經驗的總結。毛澤東同志根據我們黨二十幾年的經驗，對於這兩個文件，逐條逐條地加以解釋，而區別了真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假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兩個文件在我們整風運動中是給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以沉重打擊的。

毛澤東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文件中，號召我們黨內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應以斯大林的偉大著作『聯共黨史』爲中心教材。毛澤東同志寫道：『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上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

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以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工作了。」

毛澤東同志是斯大林的學生和戰友。毛澤東同志之所以能夠成爲斯大林的優秀學生，能夠成爲中國革命勝利的領導者，也就是因爲他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是斯大林的方法，他用斯大林的方法去學習斯大林。這種方法就是如斯大林在爲列寧五十壽辰而作的名文中所說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一派人不是在歷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像的事情裏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針，而是由研究周圍的情形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針。在工作時，他們不拿引證和成語來作根據，而是拿實際經驗來作根據，拿經驗來審查自己的每一步的工作，在自己的錯誤中來學習和教訓別人去建設新生活。所以，在這一派人底工作中，言行總是一致的，馬克思的學說，完全保證着自己的、活潑的、革命的力量。」正因爲如此，所以斯大林의思想和學說，一

到了毛澤東同志的手裏，也就「完全保證着自己的、活潑的、革命的力
量」。在我們黨內，有些人，這些人就像我們前面所說的教條主義者，他
們在主觀上或許是想學斯大林，可是他們是用反斯大林的方法去學習斯大
林，或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他們學習馬、恩、列、斯的方法是直接
違反馬、恩、列、斯的。」他們的方法也就是如斯大林在爲列寧五十壽
辰而作的名文中所說的教條主義者：「他們不拿經驗、不拿實際工作的計
算來作工作的根據，却拿那些從馬克思著作中摘錄下來的語句來作工作的
根據。他們不在分析實際生活中去求得指示和方針，却在相同的事情和歷
史上相像的事情裏面去求得指示和方針。言行不符——這就是這一派人的
基本弊病。因此，他們總是灰心失望，始終都是不滿於那個常欺騙他們的

「厄運」。

斯大林的學說，斯大林的方法和理論，經過毛澤東同志的介紹和運用，極大地啓發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廣闊眼界，提高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自覺，幫助我們黨有足夠的思想力量，可以打敗任何反革命和任何阻礙革命前進的敵人。

我們已獲得一個革命的勝利。我們需要繼續勝利。但如何能夠保證我們的繼續勝利呢？正如毛澤東同志經常所告訴我們的：我們必須善於學習，必須善於向人類偉大勝利的旗幟和我們的導師——斯大林學習，善於向偉大的聯共黨學習，而我們學習的方法就是要像毛澤東同志一樣，用馬克思的方法，用恩格斯的方法，用列寧的方法，用斯大林的方法，一句話，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

還是重複毛澤東同志十年前在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時所說的話：「我

們要慶祝他，擁護他，還要學習他。」

向斯大林學習——這仍然是我們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時的重要結論。
爲着人類的幸福和將來，至高無上的、光榮的、偉大的斯大林萬歲！

不要忘記東方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民族生活』第三期社論

當日益高漲的歐洲革命運動的時際，舊的玉座王冠紛紛瓦解，而讓位給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委員會，被佔領的地區從自己的地域內趕走了帝國主義的走狗，這時大家的視綫，自然是朝向西方了。在那裏，在西方，首先應當有暴風雨般的新的社會主義生活了。在這樣的時際，遠東和其數萬萬被帝國主義所奴役的人口，從視野中『自行』消失了，被忘記了。

可是，忘記東方連一分鐘也不行的，即使因為它是世界帝國主義的『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後方。

帝國主義者們總是把東方視作自己幸福的基礎。東方各國的不可計算的天然富源（棉花、石油、金子、煤、鐵礦），難道對各國帝國主義者們不是『傾軋的蘋果』嗎？老實說，這就可以說明，帝國主義者們在歐洲打仗和空談西方時，從未忘懷中國、印度、波斯、埃及、摩洛哥，因為，老實說，他們是時時關心東方的。這主要地就可以說明，他們為何那樣熱

● 保希臘神話，說海娜、亞夫羅德、雅典三個女神拿了金蘋果到牧童巴里斯處，叫他評判誰最美麗，就把蘋果給誰。巴里斯把蘋果給與亞夫羅德，自此此蘋果就成了亞夫羅德與海娜和雅典兩個女神之間不和之根源。此話轉為不和之源或嫉妒之種子的意思。

——譯者

心地維持東方各國的『秩序和法律』，沒有這，帝國主義的深遠後方是沒有保證的。

不過，對帝國主義者們所需要的不僅是東方的富源而已。它們所需要的是東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有的大量的『溫順的』『人材』。它們所需要的是東方各民族的『慇懃的』和低廉的『人手』。此外，他們所需要的是東方各國的『溫順的』『青年朋友』，它們從這種『青年朋友』中徵募所謂『有色』軍隊，立即運用它們去反對『自己的本國的』革命工人。所以，它們把東方各國叫做自己的『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

共產主義的任務，就在粉碎東方各被壓迫民族的長久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感染這些國家的工人和農民，掀起他們來和帝國主義作鬥爭，並以此剝奪世界帝國主義的『最可靠的』後方，它的『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

沒有這，就談不到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談不到完全戰勝帝國主義了。

俄國的革命頭一次掀起了東方各被壓迫民族去反對帝國主義。波斯、印度、中國的代表會議是東方工人農民的長久沉睡行將成爲過去的頭一個標誌。

西方的革命，無疑地，給了東方的革命運動一個新的推動，給他們灌注了英勇的精神和勝利的信心。

帝國主義者們自己和他們的新的兼併對東方革命化的事情正在給予不少的援助，這種兼併把新的國度捲入反帝國主義鬥爭之中，而擴大了世界革命的基礎。

共產主義者的任務，就在參與東方日益增長的自發運動事情，向前發

展這一運動，使之成爲自覺的反帝國主義的鬥爭。

在這個意義上，不久以前舉行的回人共產主義者代表會議●關於加強東方各國——波斯、印度、中國宣傳工作的決議案，無疑地有着深刻的革命意義。

我們希望，我們的回人同志能執行自己的高度重要的決定。
因爲需要永遠領會這個真理，即：誰願望社會主義勝利，那誰就不能忘記東方。

（『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四卷一七一——一七三頁）

●係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莫斯科所舉行的回人共產黨員第一次代表大會而言。大會選舉了俄國共產黨（布）回人組織中央局。

——譯者

聯共(布)第十四次大會政治報告節錄：關於
中國革命的力量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關於日本說兩句。在西方，我們的敵人當中有人搓搓手說：你看，在中國開始了革命運動，——自然，這是布爾什維克收買了中國人民，——誰還要收買四萬萬人民？——這個一定弄成「俄國人」和日本人打起架來。這都是胡說八道，同志們。

中國革命運動的力量是不可計量的。這些力量還沒有能使它自己確實地爲人感覺出來。但是它們一定會在將來使自己被人感覺出來。東方和西方的統治者，他們看不到這些力量，不以應有的程度來計算這些力量，他們將因此吃苦頭。我們作爲一個國家，不能不計算到這個力量。我們認爲，中國正面對着一個問題，像美國所曾經面對過的問題一樣，那時美國會統一而成爲一個國家；又像德國所曾經面對過的問題一樣，那時德國會團結爲一個國家，並且統一起來；又像意大利所曾經面對過的問題一樣，那時意大利會統一起來，並且從外敵手中解放出來。在這裏，真理和正義，完全是在中國方面。這就是爲什麼我們現在和將來都同情中國革命的緣故，這個革命正在爲了把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羈絆下解放出來並爲了把中國統一爲一個國家而鬥爭着。誰要是現在和將來不計算到這個力量，那誰一定

要失敗的。我以為，日本懂得，它，日本也應該計算到這個向前邁進、掃除自己道路上一切的中國民族運動的日益增長的力量。張作霖之所以死亡，正是因為他不了解這一點。而且他之死亡，也因為他把自己的全部政策建築在蘇聯與日本之反目上，建築在蘇聯與日本關係之惡化上。滿洲的任何一位將軍，任何一位統治者，要是把自己的政策建築在我們與日本之反目上，建築在我們與日本關係之惡化上，那他一定要死亡的。他們之中只有誰把自己的政策建築在我們與日本關係之改善上，建築在我們與日本之接近上，誰才能站住脚跟，只有這樣的將軍和這樣的統治者才能牢牢地坐在滿洲，因為我們沒有興趣使我們與日本的關係尖銳化。我們的興趣是沿着使我國與日本接近的路綫前進的。

（『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二九三——二九四頁）

論中國革命底前途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產國際執委

中國委員會上的演說

同志們！在講問題以前，應該聲明的，就是我没有關於中國問題的詳盡的、爲了展開中國革命的全景所必要的材料。因此，我被迫只限於講一些原則性的、對中國革命基本方向有直接關係的若干一般意見。我所有的只是白特洛夫的提綱、米夫的提綱、譚平山的

兩個報告及賴扶思對中國問題的意見。我想，這些文件，雖然可貴，但是它們都有很大的缺點，就是它們都忽略了中國革命底好多根本問題。我想，首先對這些缺點，必須加以注意。因此，我的發言同時將有批評的性質。

一 中國革命底性質

列寧說過，中國人在很快的時間內將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有些同志把這句話了解成這樣，就是中國人應該把我們於一九〇五年在俄國所作的，照樣重演一番。這是不對的，同志們。列寧絕沒有說過，中國革命將是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抄本。列寧只是說，中國人將有自己的「一九〇五年」。這就是說，中國革命，除了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一般特點以外，將還

有它自己的特殊的特點，這些特點在中國革命上定要印下自己特有的痕跡。

這些特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特點，就在於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同時，它又是民族解放的革命，其鋒芒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這一點首先是使它與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不同的地方。事情是在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不僅表現在其軍事的威力上，而且首先表現於中國工業底基本命脈：鐵道、工廠、作坊、礦井、銀行等等，都是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掌握之中或者控制之下。由此可知，與外國帝國主義及其中國代理人作鬥爭的問題，不能不在中國革命中起演嚴重的作用。這使中國革命與各國無產者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直接聯系起來了。

中國革命底第二個特點是在於，民族大資產階級在中國是極端軟弱的，他們比一九〇五年時期底俄國資產階級更無比地軟弱。這是很明顯的。工業底基本命脈既集中在外國帝國主義者手裏，那末中國的民族大資產階級不能不是軟弱和落後的。在這一關係上，米夫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底軟弱性乃是中國革命底特有事實之一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由此可知，中國革命主導者和領導者底作用，中國農民領袖底作用，不可避免地落在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底手中。

也不要忘記中國革命底第三個特點，這個特點就在於，與中國並列着的，還有蘇聯存在着和發展着，它的革命經驗和幫助不能不便利於中國無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中國中世紀封建殘餘的鬥爭。

中國革命底基本特點，就是如此。這些特點就決定了它的性質和方

向。

二 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干涉

這些提綱底第一個缺點，就在於它們都忽略了或過低估計了帝國主義在中國干涉的問題。要是仔細地讀一下這些提綱，那便可以想，現在在中國老實說是沒有帝國主義干涉的，而所有者只是北方與南方的鬥爭，或者是一派軍閥反對另一派軍閥的鬥爭而已。並且在這裏喜歡把干涉了解成爲這樣一種狀態，即有外國軍隊開入中國境內的事實才算干涉，若果沒有這種事實，那便不算干涉了。

同志們，這是一個絕大的錯誤。干涉決不限於軍隊之入境，而軍隊之入境也決不是干涉底基本特點。在現代資本主義各國革命運動底條件之

下，外國軍隊底直接入境，可以引起一系列的抗議和衝突，所以，現在的干涉帶着更靈活的性質和更掩飾的形式。在現代條件之下，帝國主義寧願採取在附庸國家內組織內戰的辦法，採取資助反革命力量以反對革命的辦法，採取在精神上或財政上援助其中國代理人以反對革命的辦法，進行干涉。帝國主義者就喜歡把鄧尼金和高爾恰克、尤登尼奇和弗蘭格爾反對俄國革命的鬥爭，描寫成爲純粹國內的鬥爭。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不僅是我們都知道，而且全世界都知道，在這些反革命的俄國將軍背後站着的是英、美、法、日等帝國主義者們，假使沒有他們的援助，那末俄國的嚴重的內戰是完全不可能的。關於中國，亦可說是如此。吳佩孚與孫傳芳、張作霖與張宗昌反對中國革命的爭鬥簡直是不可能的，要是各國帝國主義者們不鼓舞這般反革命的軍閥，要是各國帝國主義者不給他們供給款項、軍

械、教練官、顧問等等的話。

廣東軍隊底力量是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他們有思想、有熱情，這些東西鼓舞他們去反對帝國主義爭取解放，就在於他們謀中國的解放。中國反革命軍閥底力量是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他們的後面站着各國帝國主義者，一切在華鐵道、租讓權、工廠、作坊、銀行和商店等的主人。

因此，問題不僅是在於或甚至不在於外兵之入境，而是在於各國帝國主義者對中國反革命所予的那種幫助。借他人的手來干涉，——這就是現在帝國主義干涉的根源。

因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干涉，乃是一件毫無疑義的事實，而中國革命的鋒芒也正是在反對這種事實。

因此，誰忽略或過低估計帝國主義在中國干涉的事實，那誰就要忽略

或過低估計中國最主要最根本的東西。

有人說，日本帝國主義者們表現着『傾向』於廣東和一般中國革命的若干徵兆。有人說，美國帝國主義者在這一關係上並不落後於日本帝國主義者。這是自欺欺人的話，同志們。應該善於把帝國主義者——連日、美帝國主義者也在內——政策底本質跟它的假面具區別開來。列寧常說，革命者是很難拿棍棒和拳頭戰勝的，但是有時却很容易拿慰勸戰勝他們。同志們，永不要忘记列寧所說的這個真理。很明顯的，不論怎樣，日、美帝國主義者都很深切地了解了這個真理的意義。因此，應該把帝國主義者對於廣東的慰勸和恭維，跟那最不吝惜慰勸的帝國主義者把『自己』在華的租讓權和鐵道握得牢牢而千萬不同意放棄的事實，嚴格分別清楚。

三 革命軍隊在中國

與上述提綱有關的第二個意見，是關於中國革命軍隊的問題。原因是這些提綱中，都把軍隊的問題忽略了或估計不足。（會場喊聲：『說得對！』）這就是這些提綱底第二個缺點。普通把廣東的北伐不是看作中國革命底展開，而是看作廣東軍閥反對吳佩孚和孫傳芳的鬥爭，看作一部分軍閥對另一部分軍閥爭權奪位的鬥爭。同志們，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革命軍隊在中國，乃是中國工農爭取自己解放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在今年五月或六月以前，中國的情況，被估計為馮玉祥軍隊失敗後所到來的反動之統治，但是後來到了今年夏季，廣東勝利的軍隊北進而佔領湖北以後，景況又根本為之一變，而有利於革命了，難道這是一種偶然性嗎？不是

的，這不是一種偶然性。因為廣東之北伐，是表示對帝國主義的一種打擊，對其在華代理人的一種打擊，是表示中國一般革命分子，特別是工人有集會之自由、罷工之自由、出版之自由、結社之自由。這就是中國革命軍隊的特點和重要意義之所在。

從前在十八和十九世紀，革命總是這樣開始的：通常是大部分沒有武裝或是武裝很壞的人民，舉行起義，與舊制度的軍隊發生衝突，力謀瓦解舊的軍隊或者至少部分地使舊的軍隊轉到自己的方面來。這是過去革命爆發底典型形式。一九〇五年在我們俄國的情形，也是這樣。在中國，却不然了。在中國，不是沒有武裝的人民，而是以革命軍隊為代表的武裝的人民，起來反對舊政府的軍隊。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底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底優點之一。革命軍隊在中國底

特殊的意義，也正是在這裏。

這就是爲什麼對革命軍隊之估計不足乃是上述那些提綱底不可允許的缺點。

由此可知，中國共產黨人應當對軍隊中的工作予以特別的注意。

第一，中國共產黨人應當極力加強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力謀使軍隊成爲中國革命思想底現實的和模範的擔負者。這是特別必要的，因爲現在與國民黨沒有絲毫共同點的各種各樣的軍閥都依附於廣東了，都依附於那摧毀中國人民敵人的力量了，他們在依附於廣東時，給軍隊帶來了解體。使這種『同盟者』中立，或者使他們變爲真正的國民黨人，惟有採用加強政治工作和採用對他們建立革命監督的辦法才行。否則，軍隊可能陷於困難的地位。

第二，中國革命者，連共產黨人在內，應該切實從事研究軍事。他們不應把軍事看作次要的事情，因為軍事現在在中國乃是中國革命底一個最重要的因素。中國革命者，也就是說共產黨人，應該研究軍事，為的逐漸向前推進，在革命的軍隊中佔據某些領導職位。這就是中國革命軍隊依着正確道路前進，一直達到目的的保證。否則，軍隊中的游離和動搖是必不可免的。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軍隊問題上的任務，就是如此。

四 中國未來政權底性質

第三個意見，是關於提綱中對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性質的問題沒有估計到或估計不足這一點。米夫在他的提綱中，曾接近了這個問題，這是他

的功績。但是在走到跟前時，他却像害怕什麼，未曾進行到底。米夫以爲，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將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底政權。這是什麼意思呢？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時，也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都是革命的。這是不是說，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將是一種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式的政權呢？不，不是這樣的意思。爲什麼？因爲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式的政權在本質上會是一種帝國主義的政權，而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不能不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在這裏有根本的差別。

麥克唐納（英國工黨過去的頭子——譯者）底政府，甚至是『工人的』政權，但是它同時又是帝國主義的政府，因爲它是以保存英國在印度和埃及的帝國主義政權爲基礎的。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與麥克唐納政府比較起

來將有這樣一個優點，即它將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

問題不僅在於廣東政權——它是未來全中國革命政權的萌芽——底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並且首先是在於這種政權乃是而且不能不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這個政權之每向前進展一步，就表示給世界帝國主義者一個打擊，因之，也就是有利於世界革命運動的一個打擊。

列寧說得對，他曾說，要是從前，在世界革命時代到來以前，民族解放運動會是一般民主運動底一部分。那末現在，在俄國蘇維埃革命勝利和世界革命時代到來以後，民族解放運動就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一部分了。

米夫沒有估計到這個特點。

我想，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就它的性質講，在共同點上將類似我們

在一九〇五年所說的那種政權，就是說，將類似工農民主專政之類的東西，然而，所不同的地方，就是這個政權主要將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

這將是走向中國非資本主義、或者更確切些說，走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政權。

這就是中國革命所應走的方向。

以下三種情況將便利於革命發展底這條道路：

(一) 中國革命，乃是民族解放的革命，它的鋒芒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其在華的代理人；

(二) 中國民族大資產階級是軟弱的，要比一九〇五年時期的俄國民族資產階級更軟弱些，這就便利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便利於無產階級政黨對於中國農民的領導；

(三) 中國的革命將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發展起來，這種情況使得可以利用蘇聯勝利了的革命之經驗和幫助。

這條道路是否必然和無條件獲得勝利，——這要依許多情況而定。然而，不論如何，很明顯的，爭取中國革命這條發展道路的鬥爭，乃是中國共產黨人底基本任務。

從此就發生了中國共產黨人對於國民黨和中國未來革命政權問題上的任務。有人說，中國共產黨人應該退出國民黨。同志們，這是蠢話。假如現在中國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乃是一個最大的錯誤。中國革命底全部進程，它的性質，它的前途，都毫無疑義地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應該留在國民黨內，加強自己在那裏的工作。

中國共產黨人可否參加未來的革命政權？這不僅可以，而且應該參

加。中國革命底行程，它的性質，它的前途，都很明顯地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應當參加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

這就是真正實現中國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必要保證之一。

五 中國的農民問題

第四個意見，是關於中國農民的問題。米夫以爲，要立刻提出在中國農村裏成立蘇維埃，即成立農民蘇維埃的口號。我以爲，這是一個錯誤。米夫太跑在前面了。不能避開中國的工業中心，在鄉村中建立蘇維埃。可是，在中國工業中心組織蘇維埃的問題，目前還沒有提在日程上。此外，還應當注意的，就是不能離開與周圍環境的聯系來考察蘇維埃。蘇維埃——這裏所說的是農民蘇維埃——只有在這種場合之下，才能組織，就

是中國已處於打破舊政權、創造新政權的農民運動之高度高漲的時期；估計到中國工業中心已經衝破了隄防並進到了組織蘇維埃政權的階段。不能說，中國農民和一般中國革命已經進到了這個階段？不，不能這樣說的。所以，現在談蘇維埃，那是說跑在前面了。所以，現在應當提出的不是組織蘇維埃的問題，而是組織農民委員會的問題。我是指由農民所選舉的農民委員會而言，這種委員會可以提出農民的根本要求，可以採取各種辦法，以使用革命的秩序來實現這些要求。這種農民委員會應該成爲展開鄉村革命的核心。

我知道，在國民黨人中間，甚至在共產黨人中間，有些人不主張放開鄉村裏的革命，害怕農民捲入革命會破壞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綫。同志們，這是一個最大的謬誤。中國農民捲入革命越快越徹底，則中國反帝國

主義的統一戰綫，亦將越強大越有力量。提綱起草人，特別是譚平山、賴扶思說得很對，他們說好多已經最成熟的農民要求之即刻滿足，乃是中國革命勝利底最必要的條件。我想，打破國民黨某些分子對於農民漠視和『中立』的時候，已經到了。我想，不論中國共產黨或國民黨，就是說廣東政府，都應該立即放棄空言，採取實際行動，提出現在滿足農民底最迫切要求的問題。

在這一關係上前途究竟應當如何，可以而且需要做到什麼程度——這要依革命的行程而定。我想，歸根到底，要作到土地國有。不論如何，我們不能擯棄像土地國有這樣的口號。

中國革命者，爲了喚起中國數萬萬農民起來革命，所應走的道路是什麼呢？

我想，在當前條件之下，只能談到三條道路：

第一條道路，這就是成立農民委員會和中國革命者加入這種委員會以影響農民的道路（會場喊聲：但是『農民協會呢？』）。我想，農民協會將團結在農民委員會的周圍，或者把農民協會變成農民委員會，而付與實現農民要求所必要的某種權力。關於這條道路，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但是這條道路還是不夠的。誰以為中國幹這個事情的革命者已經很够了，那是可笑的。在中國，約有四萬萬人口，其中約三萬萬五千萬是中國人（即漢族——譯者）。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農民。以為幾萬個中國革命者，就能汲盡這個農民大洋，那是弄錯了。這就是說，還應該有別的道路。

第二條道路，這就是經過新的、人民革命的政權機關以影響農民的道路。毫無疑義的，在新的已解放的省份裏，將成立廣東政權型的新政權。

毫無疑義的，這個政權和這個政權底機關，要是它想真正向前推進革命的，那就應該設法滿足農民底最迫切的要求。所以，中國共產黨人和一般革命者底任務，就在於加入新政權的機關，使這個機關接近農民羣衆，並經過這個機關幫助農民羣衆滿足其迫切的要求，至於方法：或是用奪取地主土地的辦法，或是用減稅減租的辦法，則依情況而定。

第三條道路，就在於經過革命軍隊以影響農民。我已經說過了革命軍隊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意義。中國的革命軍隊是這樣一個力量：它是第一個深入於新的省份，它是第一個深入農民羣衆，農民首先拿它來判斷新的政權，判斷它的質量之好壞。農民對於新政權、對於國民黨、對於一般中國革命的關係，將依革命軍隊底行爲，將依它對於農民和地主的關係，將依它幫助農民的決心以轉移。要是再注意到不少懷疑分子曾依附於中國革命

軍隊，這些分子可以變壞軍隊的面目，那末便可明白，軍隊底政治面貌和其對於農民的政策，在農民眼中有多麼大的意義了。所以，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一般革命者，應該採取一切辦法使軍隊中反農民的分子中立起來，保持軍隊的革命精神，並做到使軍隊幫助農民，掀起他們參加革命。

有人說，在中國，一般人民都是熱烈地歡迎革命軍隊的。但是一到軍隊駐紮以後，却發生了若千的失望。這在我們蘇聯內戰時期，也有同樣的情形。這是由於軍隊在解放新的省份而駐在該地時，不得不靠周圍的人民來給養。我們蘇聯的革命者，普通是用極力經過軍隊幫助農民以反對地主的辦法來彌補這個缺點的。必須使中國革命者，也學會用經過軍隊實行正確的農民政策的辦法來彌補這個缺點。

六 中國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底領導權

第五個意見，是關於中國無產階級的問題。我以為，在提綱中對於中國工人階級底作用和意義，強調得不够。賴扶思問道：中國共產黨人應該以誰——以國民黨的左派還是中派——為方針呢？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我想，中國共產黨人首先應該以無產階級為方針，使中國解放運動底活動者走向革命。惟有這樣提出問題才是對的。我知道，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有些同志認為工人改善其物質和法權地位的罷工是不應有的，勸告工人不要罷工（會場喊聲：『在廣東和上海就有這樣的事實！』）。同志們，這是一個大錯誤。這是對中國無產階級比重和作用之最嚴重的估計不足。這個絕對不好的現象，應當在提綱中指出來。要是中國共產黨人不利用現

今順利的環境，去幫助工人改善其物質的和法權的地位，即使是經過罷工也罷，那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中國革命究竟爲的什麼呢？要是帝國主義底代理人，在罷工時期，肉刑拷打中國無產階級底兒女，那無產階級就不能成爲領導力量。千萬應該消滅這種中世紀的罪惡，以便在中國無產階級中間提高他們自己力量的感覺和自尊心，使之能够領導革命運動。否則，休想中國革命底勝利。因此，可以嚴重改善中國工人階級地位之經濟的和法權的要求，應當在提綱中佔有相當的位置（米夫說：『這在這提綱中已經說到了』）。是的，在提綱中曾說到這一點了，但是可惜的，這些要求提得不够突出。

七 關於中國青年的問題

第六個意見，是關於中國青年的問題。很奇怪的，在提綱中沒有估計到這個問題。然而關於青年的問題，現在在中國却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譚平山底報告中說到了這個問題，可惜說的不够突出。青年問題現在在中國有頭等的意義。學生青年（革命的學生）、工人青年、農民青年——這些都是可以大大推進革命的力量，要是使他們服從國民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響的話。●。應該注意的，沒有人像中國青年這樣深切而強烈地感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沒有人像中國青年這樣尖銳和沉痛地感到必須與這種壓迫

●「全集」版註：「在當時條件之下，這種政策會是正確的，因為那時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人與多少左的、實行反帝國主義的革命政策的國民黨人之一種聯盟。以後這種政策，因不再適合於中國革命的利益，就取消了，因為國民黨已經離開了革命，並且進一步變為反對革命的中心了，同時，共產黨人也與國民黨破裂，退出國民黨了。」

作鬥爭。這個情況，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者，從極力加緊青年中工作的意義一點說來，應當盡量估計到。在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中，青年應佔其應有的地位。

八 若干結論

我想關於中國反帝國主義鬥爭的路綫和農民問題的路綫，指出若干結論：

毫無疑義的，中國共產黨現在不能只限於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現在甚至像張學良這樣的反革命者都是贊成這個要求了。很明顯的，中國共產黨應該前進一步。

其次，應該提出鐵路國有的問題，當作前途。這是必要的，這是應該

要做的。

再其次，應當注意到把最重要的工廠和作坊收歸國有的前途。在這裏，首先應當提出那廠主以對中國人民特別仇視和特別侵略性著稱的企業收歸國有的問題。復次，應該推進農民問題，把它與中國革命的前途聯系起來。我想，歸根結底，應做到沒收地主土地，交給農民，並實行土地國有。

其他問題是一目了然的，不用再說了。

同志們，我要說的一些意見，就是這樣。

給秋公諾夫的信。

覆信過分遲延了，請原諒。

(一) 一九二二年列寧所作的對孫中山的批評。自然，並沒有陳奮，還有效力。但是這個批評是關於舊的孫中山的。原來孫中山不是時時都站在一個點上。他是向前發展的，正如世界上的一切發展着一樣。十月革命以後，特別是在一九二〇——一九二二年，列寧對孫中山很尊敬，主要是因為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人接近和合作起來。當人們談到列寧與中山主義的時候，這種情況是應當注意到的。這是不是說，孫中山會是共產主義

者？不，不是這個意思。中山主義與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區別，依舊是有的。可是，中國共產黨人既與國民黨人在一個黨內，在國民黨內合作，那末這可以下面一點說明，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族、社會主義，——乃是中國革命發展底特定階段上共產黨人與中山主義者在國民黨內共同工作的一個完全可以接受的基礎。

有人說，俄國有一個時候也是面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可是共產黨人和社會革命黨人那時並未加入一個共同的黨，——這種說法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問題是，俄國那時在民族關係上不是一個被壓迫的國度（它自己是壓迫其他民族的），因之，在俄國就沒有把全國各種革命力量聯合而成一個統一陣營的強大的民族要素，而在今日的中國，民族要素不僅存在着，而且還是一佔優勢的要素（反對帝國主義壓迫者的鬥爭），這個要素決定

着國民黨內部中國各種革命力量之間相互關係之性質。

(二) 我在黨的第十四次大會上的報告裏面^①，沒有一個字說到『對日讓步』，而且還要『犧牲中國』。這是不嚴肅的，秋公諾夫同志。我在該報告中僅僅說到對日本的友好關係。從外交的觀點看來，何謂友好關係呢？這就是說，我們不願與日本打仗，我們是堅持和平政策的。

(三) 至於美國的兩面政策，那末，這種兩面性是一目了然，毋庸懷疑，不需要說明的。即致

共產主義的敬禮

И·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二〇三—二〇四頁

- 按此信第一次在全集發表。——譯者
- 係指列寧的『中國的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一文。——譯者
- 請參看本書四〇——四二頁。——譯者

中國革命問題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爲宣傳員而作的提綱，

經聯共（布）中央批准

一 中國革命底前途

決定中國革命性質的一些基本事實：

- 一、中國底半殖民地地位及帝國主義在財政上、經濟上的統治；
- 二、封建殘餘之壓迫，這種壓迫由軍閥制度及官僚制度的壓迫加強

了；

三、數萬萬工農羣衆反對封建官僚壓迫、反對軍閥制度、反對帝國主義的日益增長的革命鬥爭；

四、民族資產階級底政治上的軟弱性，它對於帝國主義的依賴性，它對革命運動壯闊的畏懼；

五、無產階級底日益增長的革命積極性，其在億萬勞動羣衆中間的威信之增長；

六、與中國爲鄰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

由此，中國事件的發展有兩條道路：

或者民族資產階級打敗無產階級，而與帝國主義勾結，共同反對革命，以確立資本主義的統治，而結束革命。

或者無產階級把民族資產階級拋棄在一邊，鞏固自己的領導權，統率城市及鄉村的億萬勞動羣衆，以克服民族資產階級的反抗，達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完全勝利，然後，把它逐漸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之軌道上。

二者必取其一。

世界資本主義底危機與蘇聯無產階級專政（它的經驗可以由中國無產階級順利地利用）底存在，大大地便利於實現中國革命第二條道路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在基本上是以統一戰綫進攻中國革命，現在在帝國主義中間沒有比如那在十月革命以前曾經在帝國主義陣營內存在而削弱了帝國主義的分裂和戰爭——這種事實告訴說，中國革命在勝利的道路上

遇着了比俄國革命更多的困難，這一革命進程中的挫折和叛變行爲，將比蘇聯內戰時還要無比地多。

因此，這兩條革命道路之間的鬥爭，乃是中國革命底特有的特點。

正因爲如此，共產黨人底基本任務是在於爲中國革命第二條道路底勝利而鬥爭。

二 中國革命底第一階段

在中國革命底第一時期，在第一次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在接近揚子江流域時，曾節節獲得勝利；而工農底強大運動還沒有來得及開展起來，在這個時候，民族資產階級（不是買辦的●）是與革命一道前進的。這是聯合起來的全民族戰綫之革命。

這並不是說，革命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會沒有過矛盾。這只是說，民族資產階級在支持革命時，力謀利用革命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使革命主要走向那種奪取外部地盤的方向，限制革命的濶度。在這個時期，國民黨內右派與左派間的鬥爭，曾是這種矛盾的反映。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想把共產黨員逐出國民黨的企圖，乃是民族資產階級想抑制革命底第一次最嚴重的企圖。大家都知道，當時聯共中央已經認為，『必須進行那種把共產黨員保留在國民黨內的路綫』，『須要使國民黨右派退出國民黨，或者把他們開除出去』（一九二六年四月）。

這條路綫就在於使革命進一步展開，使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內左派與共

● 全集版註：「買辦是外國資本與本地市場的中間人，是殖民地及附庸國土著商業資產階級底一部分。中國買辦資產階級表現為外國帝國主義底代理人和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兇惡敵人。」

產黨員親密合作，鞏固國民黨底統一，同時揭露和孤立右派，使右派服從國民黨底紀律，要是右派服從國民黨底紀律，則利用他們的聯系和經驗，或者他們破壞這種紀律和叛賣革命底利益，就把右派逐出國民黨。

以後的事件，完全證實了這條路線底正確性。農村裏農民運動底強大發展和農民協會及農民委員會之組織，城市裏強大的罷工浪潮和職工會代表會議之成立，國民革命軍向被帝國主義海陸軍所包圍的上海之勝利的推進——所有這些及類似的事實，都證明：我們所採取的路線是唯一正確的路綫。一九二七年二月國民黨右派謀分裂國民黨及在南昌成立新中央的企圖，在武漢革命的國民黨底一致抵抗之下，遭受了破產，這個事實，只有用上述情況才能說明。

但是這個企圖，已是徵兆，表示國內階級力量正在發生重新結合，右

派與民族資產階級正感到不安，他們將要加緊反對革命的工作。

因此，蘇聯共產黨（布）中央是對的，它於一九二七年三月曾說：

（一）『現今與階級力量之重新結合及帝國主義軍隊之集中相聯系，中國革命正處在危急的時期，其進一步的勝利只有在發展羣衆運動底堅決方針之下，才有可能』；

（二）必須要保持武裝工農，將各地方的農民委員會變爲實行武裝自衛的真正政權機關之方針；

（三）『共產黨不應該隱蔽國民黨右派底背叛的與反動的政策，應該動員羣衆，團結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周圍，來揭穿國民黨右派。』（見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日決議）

因此，很容易了解：以後一方面革命底強大濶度，和他方面帝國主義

在上海的襲擊，不能不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拋入反革命的營壘中去，因為國民革命軍之佔領上海與上海工人底罷工，不能不使帝國主義聯合起來，來壓迫革命。

事情正是這樣地發生了。在這一點上，南京的屠殺就成了中國鬥爭力量重新分清界限底信號。帝國主義者們在南京實行屠殺並提出最後通牒，爲的是要表明：他們正在尋求民族資產階級底幫助，來共同反對革命。

蔣介石槍殺工人露天大會及舉行政變，是作爲回答帝國主義底號召，表示他甘願與帝國主義勾結，與民族資產階級一道反對中國工農了。

三 中國革命底第二階段

蔣介石底叛變標誌着民族資產階級之退出革命，民族反革命中心之產

生及國民黨右派與帝國主義勾結來反對中國革命。

蔣介石底叛變是表示，自此以後，在中國南方將有兩個營壘，兩個政府，兩個軍隊，兩個中心：武漢革命的中心和南京反革命的中心。

蔣介石底叛變是表示：革命已進入到其發展的第二階段，已經開始由全民·族·聯·合·戰·綫·的·革·命，轉變到億·萬·工·農·羣·衆·底·革·命，轉變到土·地·革·命了，這種土地革命，將要加強和擴大反帝國主義、反土豪劣紳和封建地主、反軍閥及蔣介石反革命集團的鬥爭。

這就是說，兩條革命道路之間的鬥爭，擁護革命進一步展開的人們和主張撲滅革命的人們之間的鬥爭，將要一天一天劇烈起來，充滿革命之現今這一全部時期。

這就是說，武漢革命的國民黨，在進行反軍閥及反帝國主義的堅決鬥

爭時，將要在事實上變成工農底革命民主專政的機關；而南京反革命的蔣介石集團，却因爲脫離工農，接近帝國主義，最後，要分担軍閥的命運。

由此可知，保持國民黨統一的政策，在國民黨內使右派孤立和利用他們來達到革命目的的政策，已經不適合於革命底新任務了。這種政策應該代以堅決把右派從國民黨驅逐出去的政策，與右派作堅決鬥爭、乃至政治上完全消滅他們的政策，把國家全部政權集中於革命的國民黨——即沒有右派分子的國民黨，作爲國民黨左派與共產黨人聯盟的國民黨手中之政策。

其次，由此可知，左派與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親密合作的政策，在目前階段上獲得了特殊的力量與特殊的意義，這種合作反映着國民黨以外日益形成的工農聯盟；沒有這種合作，則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再其次，由此可知，革命的國民黨底基本的力量源泉，則是工農革命、

運動之進一步的展開及其羣衆組織：革命的農民委員會、工人職工會以及其他羣衆的革命組織之鞏固；這些羣衆的革命組織，乃是將來蘇維埃底準備成份；數萬萬勞動羣衆革命積極性之增長乃是革命勝利底主要保障；而工農底武裝，乃是反對反革命的主要解毒劑。

末了，由此可知，共產黨在和革命的國民黨員在一個隊伍中鬥爭的時候，應當比任何時候都更應該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這是保障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所必要的條件。

四 反對派底錯誤

反對派（拉狄克及其夥伴們）底基本錯誤，是在於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底性質，不懂得中國革命現在正處在什麼樣的階段，不懂得中國革命底

目前的國際環境。

反對派要求中國革命，要近似十月革命那樣的速度發展起來。反對派不滿意上海的工人沒有採取堅決的戰鬥，來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幫手。

但是，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不能以很快的速度發展起來，因為目前國際環境沒有像一九一七年那樣順利（在各帝國主義者之間沒有戰爭）。他們不懂得，在不順利的條件之下，其時後備軍還沒有準備妥當，是不可以採取堅決的戰鬥的；正如同一九一七年四月或七月間，布爾什維克不採取決死的戰鬥一樣。

反對派不懂得，在不順利的條件之下，不避免（要是可以避免的時候）決死的戰鬥，這就等於幫助革命的敵人。

反對派要求立刻在中國成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可是現在成立蘇維埃

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不能在什麼時候都可以成立蘇維埃，——蘇維埃只有在革命浪潮特別高漲的時期才可以成立。

第二，成立蘇維埃，並不是爲了講空話，——它們的成立，首先就是當作反對現存政權的機關，當作爲奪取政權而鬥爭的機關。在一九〇五年，就是這樣。在一九一七年，亦是這樣。

在現時，比如像在武漢政府底行動區域內，成立蘇維埃，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提出反對這些區域內現存政權的口號。這就是說，提出成立新的政權機關的口號，提出反對革命的國民黨政權的口號，而共產黨人加入這種國民黨，與國民黨左派結成聯盟，因爲現在在這些區域內，除了革命的國民黨之政權而外，是沒有任何其他的政權了。

這就是說，把成立和鞏固現在革命的國民黨所依靠的工農羣衆組織，例如：罷工委員會、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職工總會、工廠委員會等等的任務，與成立新型的國家政權——蘇維埃制度以代替革命的國民黨政權的任務，混淆起來了。

這就是說，他們不懂得，中國革命目前是處在怎樣的階段上。這就是說，給了中國人民的敵人以新的武器來反對革命，來散佈謠言，說中國現在所進行的不是民族革命，而是人工地硬搬『莫斯科蘇維埃化』。

這樣，反對派提出在目前成立蘇維埃的口號，乃是獻媚於中國革命底敵人罷了。

反對派認爲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不適宜的。因之，反對派認爲共產黨退出國民黨是很合宜的。但是，現在正當一切帝國主義匪徒及其走狗要求

把共產黨人趕出國民黨的時候，共產黨退出國民黨，那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放棄戰鬥場所，拋棄自己在國民黨內的同盟者，以取得革命敵人之歡心。這就是說，削弱共產黨，破壞革命的國民黨，幫助上海的『卡文雅科』們^①，而將中國所有旗幟中最通行的國民黨旗幟，交給國民黨右派。這正是現在帝國主義者、軍閥及國民黨右派所要求的。

這樣，就可以得個結論說，反對派主張在目前共產黨退出國民黨，乃是獻媚於中國革命底敵人罷了。

因此，不久以前，我黨中央全會^②，曾堅決地駁斥了反對派底這個政

① 卡文雅科（一八〇二——一八五七年），法國軍人，一八四七年六月巴黎工人起義，他率領十五萬反動軍隊進攻革命羣衆，實行殘酷的大屠殺。結果，起義失敗。

——譯者

② 全集版註：係指聯共中央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十六日所舉行的全體會議。這

網，那是完全正確的。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三三一——三三〇頁。）

次全會討論了一系列與蘇聯和蘇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有關的問題，並決定了召開聯共第十五次大會日期的問題。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就全會日程問題及在討論加里寧的報告「蘇聯和蘇俄蘇維埃大會問題」時發言。全體會議討論了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關於它所通過的有關國際事件（中國事件等）的決定之通知以後，批准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國際問題的政策，堅決地駁斥了托洛茨基及季諾維也夫反對派的反黨綱領。

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同志們！抱歉得很，今天我只有兩三個鐘頭談話的工夫。也許下一次我們可以舉行一次比較長的談話。今天，我想，我們只能限於談一談你們用書面提出的那些問題。我一共收到了十個問題。在今天談話中我就來答覆這些問題。如果還有補充問題的話——據說，還另有問題的——那末在下次談話中，我再來答覆。現在我就開始來講吧。

第一個問題

「拉狄克認為：中國鄉村農民的鬥爭是反對資產階級，而不是反對封建主義底殘餘。這種觀點，爲什麼不對？能不能說商業資本主義或者封建主義殘餘在中國佔有統治地位？爲什麼中國軍閥既是大工業企業底所有者，同時又是封建制度底代表？」

拉狄克，確實說過像這個問題上所說的意見。我還記得，拉狄克在其在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大會上的發言中，不是完全否認中國鄉村中有封建制度殘餘之存在，就是不承認封建制度殘餘在中國鄉村中之嚴重的意義。自然，這是拉狄克底一個大錯誤。如果在中國不會有封建制度底殘餘，如果這些殘餘對中國鄉村沒有嚴重的意義，那末，那時就沒有土地革命底根

據了，那時也就談不上土地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現階段上的主要任務之一了。

中國鄉村裏是否存在着商業資本呢？是的，是存在着，不僅存在着，而且它從農民身上榨取膏血，不亞於任何封建主。可是這種原始積蓄型的商業資本，在中國鄉村中，是與封建主底統治、與地主底統治，特別地結合在一起，它抄襲了地主的中世紀的剝削和壓迫農民的方法。同志們！問題就在這裏。拉狄克底錯誤，就在於他沒有了了解這種特質，沒有了解在保留封建中世紀剝削和壓迫農民的方法之下，中國鄉村裏封建殘餘統治與商人資本存在的這種結合。軍閥制度、督軍、省長和一切現今殘酷的、搶劫人民的軍事的和非軍事的官僚，都是中國這種特點底上層建築。帝國主義正在支持並鞏固着這個全部的封建官僚機構。某些軍閥握有莊

團，同時兼做工業企業底所有者，這種情況，在基本上並沒有改變事情底本質。許多俄國地主在當時也有工廠和別的工業企業，可是這並未妨害他們依舊是封建殘餘的代表。如果在許多區域裏，農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是交給豪紳和地主；如果地主在經濟方面以及在行政和司法方面，都享有實際的權力；如果迄今在許多省份裏還有買賣婦女和兒童的情事，那末，就應該承認：封建殘餘底力量，地主底力量，那與商業資本底力量特殊結合的軍事的和非軍事的地主官僚底力量，就是這種中世紀環境中的統治力量。

這種特殊的條件，就造成了那在中國日在增長而且將來還要擴大的農民土地運動之基礎。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如果沒有封建殘餘和封建壓迫，那末在中國就不

會有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的問題了。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則中國土地革命，便無法了解了。

第二個問題

『拉狄克同志認爲：既然馬克思主義者不承認有幾個階級底政黨，所以國民黨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這個觀點爲什麼不對？』關於這個問題，須要作幾個說明。

第一，這個問題是提得不正確的。我們從前沒有說過現在也沒有人說：國民黨是幾個階級底政黨。這是不對的。我們過去和現在都只是說：國民黨是幾個被壓迫階級底聯盟之政黨。同志們，這兩者是不同的。如果說國民黨是幾個階級底政黨，那末問題就要歸結成這樣：加入國民黨的各

階級中，不論那一個階級，在國民黨以外，都沒有自己的政黨了，而國民黨本身是所有這些階級底一個共同的唯一的政黨了。難道在實際上事情就是這樣的嗎？難道加入國民黨的中國無產階級，同時沒有自己的獨特的、與國民黨不同的、有着自己的特別政綱、自己的特別組織的政黨——共產黨嗎？很明顯的，國民黨並不是幾個被壓迫階級底政黨，而是各有自己特別組織的幾個被壓迫階級底聯盟之政黨。因之，這個問題是提得不對的。在實際上，在目前的中國，只能說國民黨是幾個被壓迫階級聯盟底政黨。

第二，說馬克思主義在原則上不承認有幾個被壓迫的革命階級聯盟底政黨，說加入這種政黨對於馬克思主義者在原則上是不允許的——這也是不對的。同志們！這是絕對不對的。在事實上，馬克思主義不僅承認（而且還繼續承認）：馬克思主義者加入這種政黨，在原則上是可以允許的，

而且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還在事實上實行了這樣的加入。我可以引舉這樣一個例子，例如在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時馬克思本人所作的，其時馬克思及其同志都加入了德國有名的資產階級民主聯盟，在這個聯盟中他們同革命的資產階級底代表者們合作。大家都知道，加入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的，加入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除了馬克思主義者而外，還有革命的資產階級底代表者。當時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就是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底機關報。只是到了一八四九年春天，德國革命已經走上退潮的時候，馬克思及其同志才退出了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決定建立工人階級底完全獨立的組織，執行獨立的階級政策。看吧，馬克思甚至比我們今日中國共產黨人還做得更厲害些，因為中國共產黨還是當作獨立的無產階級政黨和其獨特的組織加入國民黨的。

在一八四八年，問題是同革命的資產階級一同來作反專制政體的革命鬥爭，關於當時馬克思及其同志加入德國資產階級民主聯盟是否適當，這是一個策略問題。可是馬克思曾經承認這種加入在原則上是許可的，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第三，如果說，武漢國民黨是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把點應當打在這上面，那是根本不正確的。只有那些既不懂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作用，又不懂得中國革命性質的人，才能這樣地表徵國民黨的。國民黨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小資產階級的政黨。有各種各樣的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俄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也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可是它們同時又都是帝國主義的政黨，因為它們同英帝國主義者結成了戰鬥同盟，同英帝國主義者在一起來侵略和壓迫別的國度——如土耳其、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加利

西亞等等。能不能說，國民黨也是帝國主義的政黨呢？顯然是不可以的。國民黨是個反帝國主義的政黨，正如中國革命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一樣。在這裏有着根本的差別。如果看不清這個差別，把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黨跟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帝國主義的政黨混爲一談——這就是說，完全不懂得中國民族革命運動。自然囉，要是國民黨是個帝國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那末，中國共產黨人也許把它要拋到九霄雲外的。可是問題正是在這裏，就是國民黨是個反帝國主義的政黨，它跟帝國主義者及其在華的代理人進行革命的鬥爭。在這個意義上，國民黨要比一切和任何的克倫斯基和蔡列特里型的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高出三個頭的。甚至國民黨右派蔣介石，在其叛變以前用各種陰謀詭計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的蔣介石，——甚至蔣介石當時都要比克倫斯基和蔡列特里高明一些，因

爲克、蔡兩人都是爲了奴役土耳其、波斯、美索不達米亞及加利西亞而進行戰爭，因而是鞏固了帝國主義；而蔣介石却是進行——無論好壞——反對奴役中國的戰爭，因而是削弱了帝國主義。

拉狄克同志和一般反對派底錯誤，就在於他們離開了中國底半殖民地地位，沒有看到中國革命底反帝國主義性質，沒有看到武漢的國民黨，沒有國民黨右派的國民黨，乃是中國勞動羣衆反對帝國主義鬥爭底中心。

第三個問題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你在東方大學全體學生大會上的演說中，說國民黨是兩個力量——共產黨與小資產階級——底聯盟；而共產國際關於國民黨的決議中說，國民黨是四個階級底聯盟，大資產階

級也在內。這兩種估計之間，有沒有矛盾？在中國無產階級專政時，共產黨可否加入國民黨？」

第一，首先要指出的，就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國民黨內實際情形的規定，在你們的『問題』中轉述得不正確，轉述得不完全確當。在『問題』中說：『大資產階級亦在內。』可是買辦資產階級也是大資產階級。這是否說，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共產國際曾認為買辦資產階級也是國民黨內聯盟底一員？明顯的，不是這個意思，因為買辦資產階級會是而且現在還是國民黨底死敵。共產國際決議案中所說的不是一般大資產階級，而是『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底一部分』。因之，這裏所指的，並不是任何的大資產階級，而只是非買辦型的民族資產階級。

第二，應該聲明的，就是在這兩個對於國民黨的界說當中，我看不出

什麼矛盾。我所以沒有看出，因為這裏是從兩個不同的觀點來規定國民黨的，其中不能說那個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它們兩個都是正確的。

我在一九二五年曾說，國民黨是個工農聯盟底政黨，當時我並不是指國民黨內實際情形的特徵而言；不是指在一九二五年事實上那些階級加入了國民黨的特徵而言。我當時所說的國民黨，係就國民黨只是當作東方被壓迫國度——尤其是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度內特殊的人民革命政黨之類型，只是當作那應該依靠於工人與城鄉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這種人民革命政黨之類型一點而言的。當時我爽直地說：『在這些國裏，共產黨員應該由民族統一戰綫之政策轉變到工人和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之政策。』（參看斯大林：『論東方大學底政治任務』）因之，我當時不是指一般人民革命底政黨，尤其國民黨之現在而言，而是指它的將來而言。在這裏我是

完全對的。因為像國民黨之類的組織，只有在它們力求依靠於工人和小資產階級底聯盟的場合之下，才能够有前程；並且這裏所說小資產階級，主要是指農民而言，因為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國度裏，農民是小資產階級底基本力量。

共產國際所感興趣的是事情底另一方面。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不是從國民黨底將來之觀點，不是從應當成爲什麼東西之觀點，而是從現在的觀點，是從國民黨內部實際情形如何和一九二六年事實上那些階級會加入了國民黨的觀點，來觀察國民黨的。共產國際會說，在今日，在國民黨還沒有分裂時，國民黨事實上曾是工人、小資產階級（城市與鄉村的）及民族資產階級底聯盟，這是完全正確的。這裏還可以補充一點，就是不僅在一九二六年，國民黨正是依靠於這些階級底聯盟，而且在一九二五

年，亦是如此。共產國際底決議案（在起草這個決議案時，我是積極參加的）曾正面地說：『無產階級跟積極爲自己的利益而鬥爭的農民，跟城市小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之一部分，組成聯盟』；又說：『各種力量之這種結合其政治的表現爲國民黨和廣東政府內相適應的結合。』（參看原決議案）可是，因爲共產國際不是只限於一九二六年的實際情形；同時還論到了國民黨之將來，所以，共產國際不能不說，這種聯盟只是一個暫時的聯盟，在最近的將來，這種聯盟應當代以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底聯盟。正因爲如此，所以共產國際決議案中接着又說：『在目前，革命運動正處在第三階段的門口，正處在階級力量重新結合的前夜』；『在這個發展階段上，革命運動底基本力量，將是一個更有革命性質的聯盟，——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底聯盟，同時排除（着重語氣的標點是

我加上的——斯大林）資本主義的大資產階級之大部分。」（仍參看原決議案）這也就是國民黨所應該依靠的那種工人與小資產階級（農民）之聯盟，這也就是在民族資產階級離開革命以後在武漢已開始形成的這種聯盟，也就是我於一九二五年在東方大學的講演中所說的那種聯盟。

因之，這裏是從兩個不同的方面來估計國民黨，第一個是從國民黨的現在，是從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內實際狀況來觀察；第二個是從國民黨的將來，是從國民黨這個東方各國人民革命政黨構造底類型應該成爲什麼東西來考察。這兩個估計都是並重的，都是正確的，它們從兩方面估計國民黨，便可最後給一個詳盡的全景。

請問這裏有什麼矛盾？

爲得更加明瞭起見，我們可以英國「工黨」（「勞動黨」）爲例。大

家都知道，在英國存在着一個依靠於工人職工組織的獨特的工黨。誰也不懷疑把這個黨叫做工黨。不僅在英國人的著作中，就是在一切別的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它都是這樣被稱呼着。但是能不能說：這個黨是真正工人的政黨，是把自己同資產階級對立起來的工人底階級政黨呢？能不能說：這個黨實際上是一個階級——工人階級——底政黨，而不是比如兩個階級底政黨呢？不，是不能的。實際上，英國的工黨乃是一個工人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底政黨。實際上，這個黨是兩個階級聯盟底政黨，並且，如果要問在這個黨內誰的影響大些，是把自己與資產階級對立起來的工人之影響呢，還是小資產階級底影響？那末就應該說：小資產階級底影響，在這個黨內是佔據優勢的。這便說明了，英國工黨事實上是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政黨的附屬品。可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都把它稱叫做工黨。這個

「矛盾」可用什麼來解釋呢？可用下面一點來解釋，就是在規定這個黨爲工黨的時候，通常都不是就這個黨在現在的實際狀況而言，而是就工黨底一種構造類型而言，由於這種類型，在一定的條件之下，這個黨在將來應該變成把自己同資產階級世界對立起來的工人底真正的階級政黨。這並不排斥這種事實，反之，正是以這種事實爲先決條件，就是現時在實際上這個黨乃是工人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底政黨。這兒沒有矛盾，正如我剛剛關於國民黨所說的沒有什麼矛盾一樣。

在中國無產階級專政時，中國共產黨可否加入國民黨？

我想這是不適當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不僅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就是在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之下，這個加入，都是不適當的。因爲何謂在中國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呢？這就是成立兩重政權。這就是國民黨與蘇維

埃爲政權而鬥爭。成立工農蘇維埃，乃是準備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到無產階級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在加入一個總的革命民主政黨的兩個政黨之領導之下，能不能進行這個準備呢？不，是不可以的。革命底歷史告訴我們：要是說到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的話，那末，只有在一個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能準備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將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革命底歷史告訴我們：只有在一個黨——共產黨領導之下，無產階級專政才能够獲得和發展。否則，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是不會有也不能有真正而完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所以，不僅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甚至在這種專政以前，在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之下，中國共產黨都應該退出國民黨，以便在自己獨自領導之下，準備中國的十月。我想，在中國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和準備中國的十月時期，中國共產黨應該用國民黨外的聯盟，來

代替現時國民黨內的聯盟，這種國民黨黨外的聯盟，有如在轉變到十月革命時期我們和社會革命黨左派的聯盟一樣。

第四個問題

『武漢政府，是不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底民主專政？如果不是，那末，應該用那些鬥爭方法，來爭取這種民主專政？馬爾丁諾夫同志認為可以不經過「第二次」革命即可以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意見，是否正確？如果正確，那末，中國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間的界限何在？』

武漢政府還不是無產階級與農民底民主專政。它能够轉變成這種專政。如果土地革命能盡量展開，則武漢政府定會成爲民主專政；可是它現

在還不是這種專政底機關。怎樣才能使武漢政府變成工農民主專政底機關呢？這裏至少必須有兩個條件：第一所必要的，就是使武漢政府變成中國農民土地革命底政府，竭力擁護這個革命的政府；第二所必要的，就是使國民黨從工農當中吸收土地革命底新領袖以補充其上層領導分子，擴充其下層組織，將農民協會、職工會代表會議以及城市和鄉村中的其他一切革命組織，統統吸收進來。現在國民黨只有五十萬黨員，這個太少，這對中國，着實太少。必須使國民黨底組織內能有幾百萬革命的工人和農民，以便將國民黨轉變成無數百萬人的革命民主的組織。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國民黨才能够產出這樣一個革命政府，這個政府能够變成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底機關。

馬爾丁諾夫同志是否確實說過和平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話，我並不

知道。我沒有讀過馬爾丁諾夫同志底論文，因為我沒有可能瀏覽我們日常的一切著述。如果他確實說過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平地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之可能，那他就錯誤了。一位中國同志秋洛夫，好像這樣問過我：

『斯大林同志！難道不能經過國民黨，一下逕直用和平方法，轉到無產階級專政嗎？』我轉過來問他：『秋洛夫同志！你們中國實際情形怎樣呢——你們那裏有沒有國民黨右派，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呢？』他答說有。我就向他說：『那末那時就非決鬥不可了。』這還是在蔣介石叛變以前說的。在原則上，當然可以提出關於中國革命和平發展可能性的問題。比如，列寧就會經認為俄國革命經過蘇維埃的和平發展是有可能的。這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到七月時期中的估計。可是在七月失敗以後，列寧即承認和平的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應認為是不可能的了。我想，

在中國，和平的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更其是沒有可能的。爲什麼？第一，因爲中國革命的敵人太多，太強，內有張作霖、蔣介石、大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等等，外有帝國主義者。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談不到在往後的革命發展中是可以避免嚴重的階級決鬥，可以避免嚴重地撕打與脫逃的；第二，因爲沒有根據可以認爲國民黨的國家組織形式，是一種適合於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最後，因爲比如在俄國，蘇維埃曾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典型形式，都不能經過蘇維埃而和平地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難道在中國有什麼根據可以預想這個轉變能够經過國民黨而成功呢？

所以，我想，和平的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應當認爲在中國是沒有可能的。

第五個問題

「爲什麼武漢政府不向蔣介石進攻，倒去進攻張作霖呢？武漢政府和蔣介石同時進攻北方軍閥，這是不是蒙混了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戰綫呢？」

同志們！你們對武漢政府的要求，未免太多了。能同時攻打張作霖、蔣介石、李濟琛以及楊森，那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可是目前武漢政府底形勢，却不允許它在所有四條戰綫上一齊進攻。武漢政府之決計進攻奉軍，至少有下面兩個原因：第一，因爲奉軍企圖奪取武漢，把它消滅，因之進攻奉軍是一個完全不可遲緩的防禦辦法；第二，因爲武漢政府希望與馮軍聯合，以擴大革命根據地，這在目前對於武漢政府是一件極重要的軍

事政治事情。在反對蔣介石和張作霖這樣兩條重要戰綫上，同時進攻，這在現在對於武漢政府還是一件力不從心的事情。關於西攻楊森和南伐李濟琛，更不用說了。在俄國國內戰爭時期，我們布爾什維克是更有力量些，可是我們不能在一切前綫上發展順利進攻行動。有什麼理由，可以在現時要對武漢政府要求的更多些呢？其次，奉軍和吳佩孚軍隊要南下進攻武漢，而現在却要東征上海，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只是說便於奉軍南下，把與馮軍的會師延緩至無定的時期，而在東征方面，又一無所得。到不如暫時讓蔣介石在上海一帶去胡鬧，同帝國主義者通款曲吧。奪取上海還要經過更惡的戰鬥的，這種戰鬥，決不像現在奪取鄭州等地所進行者。不是的，在上海還要進行更加嚴重、更加流血的戰鬥的。上海是各帝國主義集團重要利益交錯底世界中心，帝國主義絕對不會輕輕地放棄上海的。起初同馮軍

會師，在軍事上充分準備，盡量發展土地革命，進行緊張的工作以破壞蔣介石底前綫與後方，然後再提出上海的全部問題，這是不是更適當些呢？我想，這樣幹是更適當些。所以，在這裏問題並不在於『蒙混了』與中國資產階級作鬥爭的戰綫，因為要是土地革命能够發展起來，而且現在發展起來，將來還能發展下去，那末你還是沒有蒙混的，——現在這一點是毫不容置疑的了。我再重複一下：問題不在於蒙混，而在於採取適當的鬥爭策略。有些同志以為在一切戰綫上同時進攻，是現在革命精神底基本徵候。不，同志們，這是不對的。在目前，在一切戰綫上進攻，乃是愚蠢，而不是革命精神。不能把愚蠢和革命精神混爲一談。

第六個問題

「基馬爾式的革命，在中國是否可能？」

我認爲基馬爾式的革命在中國是不可置信的，因而也是不可能的。

基馬爾式的革命，只有在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而且沒有強大的農民土地革命的各國，如土耳其、波斯、阿富汗這些國度內，才有可能。基馬爾式的革命是民族商業資產階級底上層的革命，這個革命是在與外國帝國主義作鬥爭中產生的，在其往後的發展中，就其本質說，是以反對工農，反對土地革命之一切可能性爲方向的。基馬爾式的革命，在中國所以沒有可能，是因爲：第一，中國有着某種最低限度的戰鬥的和積極的工業無產階級，他們在農民中間享有巨大的威信；第二，中國有着日益展

開的土地革命，這種土地革命在其發展過程中將掃清封建殘餘。數萬萬的農民，在許多省份裏已經起來奪取土地，他們在其鬥爭中都是由中國革命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這就是中國預防所謂基馬爾式的革命底可能性之抗毒劑。

不能把基馬爾黨和武漢國民黨相提並論，正如不能把土耳其同中國相提並論一樣。在土耳其並沒有像上海、武漢、南京、天津等這樣的中心，昂哥拉距武漢之遼遠，正如基馬爾黨距左派國民黨之遼遠一樣。

同時，從國際地位的觀點看來，也應該看到中國與土耳其間的差別，在對土耳其關係上，帝國主義已經獲得了其許多的基本要求，它們奪取了土耳其的敘利亞、巴勒斯坦、美索不達米亞及其他對帝國主義重要的要點。土耳其現在已被降到一個地域不大的國家，人口只有一千萬到一千二

百萬。土耳其對帝國主義既不是一個什麼重要的市場，也不是什麼決定性的用力點。除了其他原因以外，在土耳其所以能發生基馬爾式的革命，是因為舊土耳其是個許多民族混合物，只是在安那托尼亞一帶，才有緻密的土耳其居民。中國則不然，中國是一個在民族關係上緻密的有幾萬萬人口的集團，這個集團在全世界上是一個最重要的出賣商品和輸出资本的市場。如果，在土耳其，帝國主義能够利用舊土耳其內部土耳其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民族仇視，割取東部許多最重要的地區即感覺心滿意足；那末，在中國，帝國主義却不能不從民族的中國之活的肉體上開刀，把它割裂成許多塊，奪取它的整個的省份，以保持他們的舊有陣地，或者最低限度維持這些陣地的一部分。因此，要是在土耳其，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可以基馬爾主義者的斬了尾巴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而告終；那末在中國，反帝國主

義的鬥爭，一定要採取深刻的人民的和鮮明的民族的性質，一定要一步加深一步，一直到同帝國主義作拚命的決鬥，震撼帝國主義在全世界上的基礎本身。

反對派（季諾維也夫、拉狄克、托洛茨基）底最重大的錯誤，就在於他們沒有看到中國和土耳其間的這些差別，把基馬爾式的革命和土地革命混爲一談，毫無鑑別地把一切東西都混在一起。

我知道，在中國民族主義者當中，有人正在懷抱基馬爾主義的思想。扮演基馬爾角色的人，現在在中國已不少了，其中第一個就是蔣介石。我知道，有些日本的新聞記者，也情願稱頌蔣介石是中國的基馬爾。可是這一切，都是驚惶失措的資產階級的夢想罷了。在中國，不是中國的墨索里尼如張作霖和張宗昌之類獲得勝利，後來由土地革命底浪潮，把他們冲

倒；就是武漢獲得勝利。蔣介石及其黨羽，企圖在這兩個營壘之間找一條中間路，他們不可避免地要倒台，和張作霖、張宗昌遭受同一命運。

第七個問題

『在中國現在是需要提出農民馬上奪取土地的口號嗎？你對於湖南農民奪取土地這件事實，怎樣估計？』

我想，是需要的，而且是絕對需要的。事實上在許多區域裏，沒收土地的口號已經在執行着。在許多區域裏如湖南、湖北等地，農民已經在從下而上地奪取着土地，設立着自己的法庭、自己的制裁，並實行自衛。我想，在最近的將來，全中國的農民都要轉到實行沒收土地的口號的。中國革命底力量就在這裏。如果武漢政府想獲得勝利，如果它想要創造反對張

作霖、反對蔣介石、反對帝國主義的實際的力量，——它就應當盡力支持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土地革命。如果以為在中國只用軍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制度和帝國主義，那是癡人作夢。沒有土地革命，沒有數百萬農工羣衆積極幫助武漢軍隊，要想打倒這些反動力量，是絕對不可能的。

反對派常常把蔣介石底叛變估計爲中國革命之衰落。這簡直是胡說八道。把蔣介石叛變估計爲中國革命衰落的人，在實際上就是擁護蔣介石的，在實際上就是贊成蔣介石回到國民黨裏來的。顯然，他們以為，如果蔣介石不叛變的話，那末革命的情形也許要好些。這種想法是愚蠢的、不革命的。蔣介石之叛變，在事實上是使國民黨洗去了污點，把國民黨底核心推向左邊了。自然，蔣介石底叛變，不能不使許多區域裏的工人受到局部的失敗。不過，這只是局部的、暫時的失敗而已。在事實上，因爲蔣介

石底叛變，整個革命已進到了其發展底最高階段，土地革命階段。中國革命底力量和威勢，就在這個地方。

不能把革命運動看做一直上昇的運動。這是對於革命的書本的非現實的觀念。革命總是曲綫進行的，它在一些區域裏進攻和破壞了舊制度，而在其他區域裏却遭受局部的失敗，實行退守。蔣介石底叛變，是中國革命進程中這種曲折之一，這種曲折是必要的，因為藉此可以給革命洗去污點，把革命推動到強大的土地革命的道路上去。

但是要使土地革命能够普遍形成，那就須有一個概括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沒收地主的土地。

第八個問題

『爲什麼組織蘇維埃這個口號在目前是不正確的？河南已經組織了工人蘇維埃；這樣，中國共產黨不是有做革命運動尾巴的危險嗎？』

你們是指怎樣的蘇維埃而言呢？是指無產階級的蘇維埃呢，還是指非無產階級的蘇維埃，指『農民的』蘇維埃，『勞動羣衆的』蘇維埃，『人民的』蘇維埃而言？列寧在其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提綱中，曾說，在東方各落後國度中成立『農民蘇維埃』、『勞動羣衆蘇維埃』。列寧是指『沒有或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那些國度而言，如土耳其斯坦者。他是指像波斯、阿富汗等這樣的國度而言。所以，這就說明了，在列寧的提綱中沒

有一個字講到要在這些國度裏組織工人蘇維埃。但由此可以看出，列寧底提綱並不是指中國而言，關於中國不能說它『沒有或者幾乎沒有工業無產階級』，他是指別的更落後的東方各國而言。

因之，你們這裏所講的，是指在中國馬上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而言。因之，在解決這個問題時，所應注意的，不是列寧底提綱，而是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所通過的羅易底提綱。這個提綱中，曾講到，在像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度內，成立工農蘇維埃。然而這個提綱中說：只有在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在這些國度裏，才應該組織工農蘇維埃。

什麼是工農代表蘇維埃呢？工農代表蘇維埃，主要是反對現存政權的起義機關，為爭取新的革命政權而鬥爭的機關，新的革命政權之機關。同

時，工農代表蘇維埃是組織革命的中心。正是因爲如此，所以反對派主張在中國組織這種蘇維埃，可是工農蘇維埃，只有在它們是推翻現存政權的機關時，只有在它們是新的革命政權之機關時，它們才能成爲組織革命的中心。如果它們不是新的革命政權之機關，那末它們就不會成爲組織革命運動的中心。反對派反對對工農代表蘇維埃之列寧主義的了解，他們是不願意了解這一層的。

現時比方在武漢政府行動底區域內成立工農蘇維埃，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成立兩重政權，組織起義機關，反對武漢政府。現時中國共產黨人應不應該推翻武漢政府呢？顯然，是不應該的。恰恰相反，中國共產黨人現在應該支持武漢政府，把它轉變爲反對張作霖、反對蔣介石、反對地主豪紳、反對帝國主義的機關。如果中國共產黨人現在不應該推翻

武漢政府，那末，現在爲什麼要組織工農代表蘇維埃呢？二者必居其一：或是現在組織工農代表蘇維埃，來推翻武漢政府，這在目前是不正確的，是不許可的；或是中國共產黨人現時組織工農代表蘇維埃，可是不執行推翻武漢政府的路綫，不把蘇維埃變成新的革命政權之機關——那時，蘇維埃就死亡而變爲對蘇維埃底嘲弄了。列寧在說到成立工農蘇維埃時，總是反對這樣作的。

你們的『問題』曾說河南已經出現了工人蘇維埃，並說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向羣衆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便有作爲羣衆尾巴的危險。同志們，這是笑話。現在在河南並沒有任何的工人蘇維埃。這是英國報紙所造的謠言。現在河南只有『紅槍會』，只有農民協會，但還沒有什麼工人代表蘇維埃。自然，可以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這不是很困難的事。但是問題不

在於組織工人蘇維埃，而在於把蘇維埃轉變為新的革命政權之機關。否則，蘇維埃只是空談，只是把蘇維埃當兒戲。過早地組織工人蘇維埃，以致後來把它們搞垮，變成空架子，這正是說要把中國共產黨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袖，變成關於蘇維埃的一切超左練習底附屬物。一九〇五年彼得堡工人蘇維埃首任主席赫魯斯達列夫，在一九〇六年夏天，也主張恢復就是說主張成立工人代表蘇維埃，他認為蘇維埃本身不顧環境如何，就能把階級力量之對比關係倒轉過來。列寧當時反對赫魯斯達列夫，曾謂在一九〇六年夏天，不應該組織工人代表蘇維埃，因為後備軍（農民）還沒有走近先鋒隊（無產階級），在這種條件之下，組織蘇維埃，因而提出起義口號——這是危險的，不適當的。但由此可知，第一，不應誇大蘇維埃本身的作用；第二，在組織工農代表蘇維埃時，不能不估計到周圍的環境。

一般地講，在中國是否需要組織工農代表蘇維埃呢？

是需要的，絕對需要的。在武漢革命的政府鞏固以後，在土地革命展開以後，在由土地革命、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是需要組織蘇維埃的。組織工農代表蘇維埃，就是說在中國奠定蘇維埃政權的基礎。可是奠定蘇維埃政權的基礎，這就是說奠定兩重政權，採取以蘇維埃政權來代替現時國民黨政權的方針。

我想：現在，這種時機還未到來。

在你們的『問題』中還講到了中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底領導權問題。

要有些什麼條件，才能促進中國無產階級在現時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呢？首先，就要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底堅固組織，有自己的綱領、自己的方針、自己的組織及自己的路線。第二，就要中國共產

黨人能够站在農民土地革命底最前列，教導農民尤其是貧農組織起來，成立革命的農民協會和農民委員會，領導他們沒收地主的土地。第三，就要中國共產黨人在軍隊中鞏固起來，使軍隊革命化，革新軍隊，將軍隊由各個野心家底工具變成革命底工具。最後，就要中國共產黨人能參加武漢政府底地方的和中央的機關，能參加武漢國民黨底地方的和中央的機關，在這些機關中執行堅決的鬥爭，使反對地主、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進一步展開。反對派主張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和武漢政府，說這是保持中國共產黨獨立性的辦法。這不過是俄國孟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所說的那種極端可疑的『獨立性』而已。大家都知道，孟什維克當時極力反對列寧說：『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工黨底領導權，而是工黨底獨立性。』列寧當時答覆得很好，說：這種主張只是否認無產階級領導權，把獨立性和領導權對立起

來，乃是把無產階級變爲立憲民主派資產階級底附屬品而已。我想，現時談到中國共產黨獨立性和同時要求或暗示中國共產黨退出國民黨和武漢政府的反對派，正是墮入到一九〇五年時期孟什維克所說的『獨立性』的道路上去了。中國共產黨只有當它在國民黨內或國民黨外——在廣大的勞動羣衆中間成爲領導分子時，它才能保持真正的獨立性和真正的領導權。所以，現在中國共產黨底任務，就在於不是退出國民黨，而是在國民黨內及黨外，都要保證自己的領導作用。

第九個問題

『在目前，能不能在中國提出組織常備紅軍這個問題？』

我想：在發展前途上，這個問題應加以注意。可是，如果在實踐上提

出問題，那末，在目前用新的紅軍來代替現有的軍隊，是不可能的，理由很簡單，就是現在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出來代替現有的軍隊。目前最主要的就是要改善現有的軍隊，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使軍隊革命化，現在從受過土地革命訓練的革命農民和革命工人中間奠定新的革命軍團之基礎，成立許多新的真正可靠的軍團和可靠的軍官；把這種軍隊，作為武漢革命政府底柱石。這種軍團應是新軍隊底核心。這種新的軍隊以後再發展成中國紅軍，這不僅對於前綫鬥爭，尤其對於後方反對一切反革命暴發戶的鬥爭，都是需要的。

如果沒有這樣的軍隊，就不能預防前綫和後方的潰散，不能預防叛變和倒戈。

我想，這種辦法，是目前唯一可能而適當的辦法。

第十個問題

「在現在同資產階級鬥爭時期中，能不能提出奪取中國企業這個口號？在什麼條件之下，才能奪取在華的外國企業，而奪取外資企業，會不會同時引起對中國企業的奪取？」

我想，一般說來，奪取中國企業的時機尚未成熟。可是，這並不排斥，如果中國企業家頑強怠工，關閉許多企業，故意造成失業，——那末這種情形可以迫使武漢政府，採取這樣的政策，就是在現時即開始將若干這些企業收歸國有，並用武漢政府的力量運用這些企業。現在在個別情形之下，武漢政府迫不得已而採取這種強迫手段，以對付那些特別險惡的和反革命的中國企業家，是有可能的。

至於外資企業，把它們收爲國有，則是將來的問題。把這種企業之收歸國有，就等於向帝國主義宣佈直接的戰爭。要宣佈這樣的戰爭，就需要比現在略微不同的、更爲順利的環境。我想，在革命的現階段上，革命還沒有鞏固起來，這種舉動還是過早的，因而也是不適當的舉動。現在的任務，並不在這裏，而是在於：盡量燃起土地革命底火焰，保證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的領導權，鞏固武漢政府，把武漢政府變爲向中國革命一切敵人作戰的中心。不能一下子把一切任務放在自己身上，這會有支持不住的危險。尤其國民黨及其政府都不適於解決這些基本任務，如剝奪中外資本家的任務。要解決這些任務，需要有別種環境，別種革命形式，別種革命政權機關。

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底任務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在共產國際執委第十次會議上的演說——

一 幾個小的問題

同志們！很對不起，今天我遲到了執委會會議，未能全部聽到托洛茨基同志在今天會議上的發言。但是，我想，最近幾天來，托洛茨基同志關於中國問題寫了大量的論文、提綱和交給執行委員會的信，使我們批評反對

派的材料不能說是不夠了。所以，我對於托洛茨基同志的批評，將以這些文件爲根據；不容置疑的，這個批評，同時也將是對於今日托洛茨基同志發言底根本意思的批評。

我竭盡可能地在論戰中避免個人的成份。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對於聯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個別委員的個人攻擊，不值得加以申辯。顯然的，托洛茨基同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會議上想把自己描寫得像一個英雄，以便將執行委員會對於大戰危險和中國革命問題等的工作，變成關於托洛茨基一人問題的工作。我想，托洛茨基同志是不值得予以這樣大的注意的（會議席上喊聲：『對呀！』）。況且托洛茨基同志並不像一個英雄，倒像一個戲子，把戲子和英雄是無論如何不能混爲一談的。像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這種曾經被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指責爲

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人，痛罵了布爾什維克一頓，這對於布哈林或斯大林是毫無侮辱的地方，這話用不着我說了。反之，要是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這種半孟什維克，把我誇獎一番，而不罵我，那倒是對我的莫大侮辱了。

關於反對派今日的這種小組織行動，是否違犯了他們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所應允的義務，我也不來多說了。托洛茨基同志斷言說，根據反對派於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的宣言，他有權利堅持自己的觀點。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如果托洛茨基同志要想肯定說，那個宣言底內容就只是限於這點，那除了把這叫做詭辯主義之外，便無別話可言了。反對派十月十六日的宣言中，不僅說到反對派有堅持其見解的權利，而且說到這些見解，只有在黨所許可的範圍以內才能堅持，說到小組織行動應當拋棄，應當取

消，說到反對派應當「無條件地服從」黨底意志與中央底決定，說到反對派不僅應當服從這些決定，而且應當自願地「實行」這些決定。由此可知，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反對派底宣言，已被他們粗暴地違犯和撕成碎片了，這難道還需要證明嗎？

關於反對派在無數提綱、論文和講演中對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所持立場之極端誣蔑與曲解，我也不來多說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二同志不停止地說，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似乎曾經堅持而且現在還在堅持着「支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二同志底這種說法乃是虛構、毀謗，是故意曲解事實，——這是用不着證明的了。事實上，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曾經堅持的，不是支持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而是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只要中國革命一天還是全民族聯合戰綫底

革命的話；後來當中國革命已成爲土地革命，而民族資產階級已經離開革命的時候，他們就用與民族資產階級作武裝鬥爭的政策代替了這個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只要把這些文件，比如第七次擴大會議底決議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底有名的宣言、斯大林爲宣傳員而寫的中國問題提綱、以及布哈林同志最近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的提綱等，拿來看一下，就可以相信這一點的。反對派的不幸，就是正在於他們若不造謠和曲解，便寸步不能行了。

現在，言歸正傳吧！

二 農民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基礎

托洛茨基同志底基本錯誤，就是在於他不懂得中國革命底意義與性

質。共產國際是從下述一點出發的：即封建殘餘乃是中國在現時引起土地革命的主要的壓迫因素。共產國際是從下面一點出發的：即中國農村中封建殘餘及建築在這種殘餘上面的全部軍閥官僚上層建築物，若督軍、若省長、若張作霖等，——都是今日中國土地革命所以發生和日益展開的基礎。若是在許多省份內，農民收入底百分之七十，要繳納給地主和劣紳；若是地主（武裝的或沒有武裝的）不但是經濟的、而且是行政的和審判的權力；若是直到現在在許多省份內還在實行着中世紀的買賣婦女和小孩的事情，那末不能不承認封建殘餘是中國各省壓迫之基本形式。正因為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層建築物，乃是中國壓迫之基本形式，所以，現在中國正在經歷着一個按其力量及其發展說來最偉大的土地革命。什麼叫做土地革命呢？土地革命就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基礎和內容。唯其如此，

所以共產國際說，中國在現在正在經歷着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

但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僅是在反對封建殘餘而已；它同時還反對帝國主義。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及其所有在中國的金融和軍事的力量，正是那支持、鼓舞、培植、維持封建殘餘及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層建築物的力量。因爲不同時進行反對在中國的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就不能消滅中國的封建殘餘。因爲誰想要消滅中國的封建殘餘，那誰就應當必須舉手反對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集團。因爲不與帝國主義作堅決的鬥爭，便不能澈底打倒和消滅中國封建殘餘。唯其如此，所以，共產國際說，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時又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

這樣，今日的中國革命，便是兩支革命運動巨流——反對封建殘餘的革命運動與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之匯合。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是

反封建殘餘鬥爭與反帝國主義鬥爭之匯合。

共產國際（也就是說和聯共中央）對於中國革命問題底全部路線之出發點，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同志對中國問題立場之出發點是什麼呢？他的出發點是與剛才所述的共產國際之觀點直接相對立的。托洛茨基同志不是完全不承認中國封建殘餘之存在，便是認爲這些封建殘餘沒有決定的意義。托洛茨基同志（也就是說和反對派）對中國封建官僚壓迫底力量與意義估計過低，硬說中國民族革命底基本原因就在於中國海關制度之依存於帝國主義各國。請就托洛茨基同志幾天以前交給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執委的那篇有名的提綱中引證一段吧。托洛茨基同志底這個提綱底標題是：『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底提綱』。托洛茨基同志在這個提綱中說道：

「布哈林同志企圖援引「封建殘餘」在中國經濟中彷彿起演主要作用一語，以辯護機會主義的妥協主義的路綫，這個企圖，是根本上沒有根據的。甚至即使布哈林同志對於中國經濟的估計，是根據於經濟的分析，而不是根據於一些煩瑣哲學的定義，而「封建殘餘」仍不能辯護那顯然促進了四月政變的政策。中國革命之所以有着民族資產階級的性質，其基本原因是在於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力之發展固定於中國海關制度（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之依存於帝國主義各國。」

（參閱托洛茨基：「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底提綱」）

要是不用心看清這一段引證，那便以為托洛茨基同志不是在反對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問題的路綫，而是反對布哈林同志底「妥協政策」。但這當然是不對的。在事實上，這段話，骨子裏是否認中國封建殘餘佔有優勢的作用。在事實上，這段話，骨子裏是要把中國今日日益展開

的土地革命宣佈爲一種上層的革命，所謂反海關的革命。托洛茨基同志在這裏所以要說出布哈林同志底『妥協政策』的空話，是爲的要掩蔽他自己對共產國際路線之放棄。我爽直地說，這是托洛茨基同志底慣用的惡辣手腕。

這樣，照托洛茨基同志的話可得個結論，說，中國封建殘餘和其全部軍閥官僚上層建築，不是現時中國革命底基本發動力，而是一個次要的不大的力量，只值得把它放入括弧裏面。

這樣，照托洛茨基同志的話可得個結論，說，中國民族革命底『基本發動力』，乃是中國海關之爲帝國主義者所操縱，因此，中國革命，主要地是一個所謂反海關的革命。

托洛茨基同志概念底出發點就是這樣，托洛茨基同志關於中國革命性質的觀點，就是這樣。

不客氣地說吧，這個觀點正是張作霖「陛下」顧問們底觀點。

如果托洛茨基同志底觀點是正確的話，那末，就應當承認，張作霖和蔣介石也是對的，因為他們也都說不願意土地革命，又不願意工人革命，只想達到廢除不平等條約，確立中國海關的自主就算完事了。托洛茨基同志居然滾到張作霖和蔣介石部下辦事員底觀點上去了。

要是把封建主義底殘餘放在括弧裏面；要是布哈林同志說，封建主義底殘餘在革命現階段上有着主要的意義，是不對的，因之，共產國際也是不對的；要是中國革命底基礎是海關的不獨立，而不在於與封建殘餘及支持它們的帝國主義作鬥爭；那末，現時中國土地革命還有什麼內容呢？土地革命及沒收和國有地主土地之要求是自何而來的呢？在這種場合之下，有什麼根據認為中國革命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呢？難道土地革命為資產階

級民主革命的基礎，不是一件千真萬確的事實嗎？難道土地革命可以從天上落下嗎？像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省數百萬數萬農民羣衆已經被捲入在偉大的土地革命之中，在這些省裏農民正在建立自己的政權、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自衛力量，驅逐地主，『平民式地』制裁他們，——難道這不是事實嗎？若說封建軍閥的壓迫在中國不是壓迫力量底主要形式，那末，這樣雄壯洶湧的土地運動是自何而來的呢？如若不承認帝國主義是中國人底封建軍閥壓迫者之基本同盟者，那末，數萬萬農民底這種雄壯洶湧的運動，又怎樣同時採取了反帝國主義的性質呢？僅在湖南一省，現在農民協會會員數目已達二百五十餘萬以上，——難道這不是事實嗎？而在湖北、河南，現在農民協會會員數目更不知有多少，最近將來在中國其他各省，不知又將達到多少？還有『紅槍會』、『大刀會』等等——難道這些都是

空想，而非現實嗎？難道可以認真地說，數萬萬農民提出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起來幹土地革命，不是反對真正而不容懷疑的封建主義殘餘，而是反對只可放在括弧內的想像的封建主義殘餘嗎？托洛茨基同志已經滾到張作霖『陛下』公務員們底觀點上去了，難道還不明顯嗎？

因此，我們看到有兩條基本路線：

(一) 共產國際底路線——估計到了中國封建殘餘之存在爲壓迫之主要形式，估計到了雄壯洶湧的土地運動之決定的意義，估計到了封建殘餘與帝國主義之聯繫，估計到了中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性質，其鋒芒是反對帝國主義；

(二) 托洛茨基同志底路線——否認封建軍閥壓迫之決定的意義，沒有看見中國土地革命運動底決定的意義，僅以中國資本主義要求中國海關

獨立之利益來解釋中國革命之反帝國主義的性質。

托洛茨基同志（也就是說和反對派）底基本錯誤，是在對中國的土地革命估計過低，是在他不懂得這個革命底資產階級民主性質，是在他否認中國數千百萬農民土地運動底前提，是在對農民羣衆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估計過低。

這個錯誤對托洛茨基同志，不是今天才有的。這個錯誤，曾是托洛茨基同志在他和布爾什維主義作鬥爭之整個時期中的全部路線底最大特點。對農民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估計過低，這個錯誤自一九〇五年起，就緊隨着托洛茨基同志的，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這個錯誤曾經表現得特別明顯，直到今天，這個錯誤還未離開托洛茨基同志。

現在，讓我把托洛茨基同志與列寧主義作鬥爭的事實舉幾件出來：

比如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夜，我們會達到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勝利。當時托洛茨基同志肯定地說，農民中間的分化既日益加強，現在既是帝國主義時期，無產階級把自己與資產階級的民族對立起來，那末，農民的作用就要降低下來，土地革命便不會有它在一九〇五年那麼大的意義了。當時列寧是怎樣回答這個問題呢？茲從列寧於一九一五年關於農民在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問題的著作中舉一段於下：

「托洛茨基底妙論（即指托洛茨基底「不斷」革命論而言——斯大林）一方面是竊取自布爾什維克爲無產階級進行堅決的革命的鬥爭及奪取政治權力的號召，另一方面，是竊取自孟什維克對於農民作用的「否認」。似乎農民已經分化了：它的可能革命作用已經全然消失了；在俄國，「民族」革命再沒有可能了，因爲「我們是生活在帝國主義時代」，而「帝國主義不是拿資產階級的民族來與舊制

度對立，而是拿無產階級來與資產階級民族對立的。

茲舉一個「玩弄字句」的滑稽例子：「帝國主義」。若是在俄國已經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民族」相對立，那就是說，俄國現在正面臨着社會主義革命了！那就是說，「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是不對的了（在一九一二年一月代表會議之後，托洛茨基於一九一五年又重複說），那就是說，不應當說「革命的工人」這個字，而應當說「在社會主義政府中的工人了」！托洛茨基會說，無產階級以其堅決性吸引了「非無產階級的（！）人民大眾」（第二一七期）！！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他的糊塗不清，會達到何種程度了。托洛茨基未曾想到，若是無產階級能引起鄉村底非無產階級羣衆去沒收地主的土地和推翻君主政體，那末這就是俄國「民族資產階級革命」之完成了，這就是工農底民主革命專政了！（此處着重點爲我所加——斯大林）

全部十年時間（偉大的十年）——從一九〇五至一九一五年，證明了俄國革

命底兩條階級路線，亦僅只有兩個階級路線之存在。農民之分化，加強了農民本身內部的階級鬥爭，喚起了許多在政治上曾經酣睡的分分子，使農村無產階級（從一九〇六年起，布爾什維克派就主張農村無產階級要有自身特殊的組織，並把這個要求曾經插入在孟什維克派底斯托哥爾姆大會底決議案中）接近了城市無產階級。但是「農民」與馬爾柯夫、羅曼諾夫、沃史多夫等中間的敵對性曾經加強、增長、尖銳化了。這是一個很顯明的真理，甚至托洛茨基底幾十篇巴黎大作中的數千辭句都不能把它「推翻」。托洛茨基在事實上是幫助了俄國自由主義的工人政客，這些政客把對農民作用之「否認」正理解為不願意掀起農民來幹革命。而問題的要點，却正在這裏。」（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二一三——二一四頁）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圖式之特點，這個圖式就在於他只看見資產階級，只看見無產階級，而沒有注意到農民，不了解農民在資產階級民主革

命中的作用，正是這個特點，構成了反對派對中國問題的基本錯誤。

托洛茨基同志與反對派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的「半孟什維主義」，正是在這裏。

從這個基本的錯誤中，就產生了反對派底一切其他的錯誤，就產生了反對派關於中國問題的提綱中的一切混亂。

三 屠殺共產黨員的南京右派國民黨

與支持聯合共產黨的武漢左派國民黨

比如拿關於武漢問題來說。共產國際關於武漢革命作用問題的方針，是大家所深知明瞭的。因為中國正處在土地革命中，因為土地革命底勝利即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勝利，即工農革命專政底勝利；因為南京是民族

反革命底中心，而武漢爲中國革命運動底中心，——所以，必須支持武漢國民黨，而在能保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國民黨內和國民黨外領導權的條件之下，共產黨人必須參加這個國民黨及其革命政府。現時的武漢政府是否爲工農底革命民主專政之機關呢？不是的，現在它還不是這樣的機關，它也不能很快地成爲這樣的機關。但是在革命進一步發展之下，在這一革命勝利之下，它有發展爲這樣一個機關的機會。

共產國際的立場就是如此。

托洛茨基同志完全是另外一種立場。他認爲，武漢是一種『虛構』，而非革命運動底中心。關於左派國民黨現在是代表什麼的問題，托洛茨基同志回答說：『暫時還沒有什麼？或差不多沒有什麼。』（見托洛茨基：『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底提綱』）就假定武漢政府是一種虛構吧。但是武漢既

爲一種虛構，爲什麼托洛茨基同志不要求堅決反對這個虛構呢？從什麼時候起，共產主義者是支持該虛構，參加該虛構，領導該虛構……的呢？共產主義者必須和虛構鬥爭，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共產主義者拒絕與該虛構鬥爭，便是欺騙無產階級和農民，這難道不是事實嗎？爲什麼托洛茨基同志不提議即使是採用共產黨人立即退出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的辦法，以與虛構鬥爭呢？爲什麼托洛茨基同志提議還留在這個虛構裏邊，不從那裏退出呢？這是什麼邏輯呵？托洛茨基同志先看不起武漢，名之爲虛構，後來又在自己提綱中怯懦起來，不敢做出相適應的結論，這不是就說明了這種邏輯的不調和性嗎？

或者就拿季諾維也夫同志來做例。季諾維也夫同志在其於今年四月份散發聯共中央全會的提綱中，把武漢的國民黨評價爲一九二〇年時期基

馬爾主義者之政府。但基馬爾主義者之政府乃是反對王農之政府，乃是共產主義者在其中沒有也不能有容身之地的政府，因之，從對武漢政府之這種評價中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與武漢作堅決的鬥爭，推翻武漢政府。有着平常人的邏輯學的平常之人，一定是要這樣想的。但是季諾維也夫同志可不是這樣想的。他在把武漢政府評價爲基馬爾主義者之政府時，同時却提議對這個政府，予以最有力的幫助，不許共產黨人退出這個政府，不要拋開武漢國民黨等等。他正面地說：『必須對漢口予以最有力和各方面的幫助，從那裏對加雅科進行強有力的抵抗。在最近的將來，正是必須集中力量於幫助組織與鞏固漢口。』（見季諾維也夫底提綱）誰能懂得呵？托洛茨基同志說，武漢是一個虛構。反之，季諾維也夫同志却斷言說，武漢是一個基馬爾主義者之政府。由此就應當作出這樣的結論：與虛構作鬥

爭，或者爲推翻武漢政府而鬥爭。可是托洛茨基同志也好，季諾維也夫同志也好，却都在從他們的前提中所必然產生的結論面前躩來躩去，而季諾維也夫同志更進一步，提議『對漢口予以最有力和各方面的幫助』。所有這些說明什麼呢？說明反對派糾纏在矛盾中了。反對派喪失了在邏輯上思考的能力，失掉了一切前途。

在對於武漢的問題上，觀念糊塗，失去了任何前途，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和反對派底立場，如果一般把糊塗可叫做立場的話。

四 論中國工農代表蘇維埃

或者再拿關於中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問題來做例子。關於組織蘇維埃的問題，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曾通過了三個決議案：列寧底關於在落後國

度內成立非無產階級的農民蘇維埃的提綱；羅易底關於像在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度裏成立工農蘇維埃的提綱；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的提綱，是關於『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條件之下才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問題。

列寧底提綱是說明，在土耳其斯坦這類國度裏面，應建立『農民的』、『人民的』、非無產階級的蘇維埃，這些地方是沒有工業無產階級或差不多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在列寧底提綱裏，沒有一句話說到在這類國度裏面應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並且列寧底提綱，認為蘇聯無產階級對這些落後國度革命之直接的援助乃是在這些國度裏發展和建立『農民的』、『人民的』蘇維埃底必要條件之一。很明顯的，這個提綱不是指中國或印度而言的（因為在這類國度裏，有着某種最少限度的工業無產階級，在這類國度裏，在某種條件之下，建立工人蘇維埃，乃是建立農民蘇維埃底先決條件），

而是指其他更落後的，如波斯一類的國度而言的。

羅易同志底提綱，主要是指中國和印度這類有工業無產階級的國度而言的。在這個提綱中，提議在一定條件之下，在由資產階級革命轉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過渡時期中，應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很明顯的，這個提綱對中國有直接的關係。

第二次大會底特別提綱，其標題爲『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條件之下才可以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它是根據俄國和德國革命底經驗，說明工人代表蘇維埃的作用。該提綱曾肯定說：『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蘇維埃，不可避免地要變成爲對蘇維埃的嘲弄。』很明顯的，在我們討論在中國立刻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問題時，應當考慮到這個提綱。

若是考慮到現時的中國環境和武漢國民黨——革命運動中心——之存

在，並考慮到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後面這兩個提綱底指示，那末，關於在中國立刻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這個問題，應當怎樣去處理呢？

現在，比方在武漢政府底活動區域以內，就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那就是說，在中國成立兩重政權，提出推翻左派國民黨和建立新的蘇維埃政權的口號。工農代表蘇維埃乃是為推翻現存政權而鬥爭之機關，是為新政權而鬥爭之機關。工農代表蘇維埃一出現，便不能不造成兩重政權，而兩重政權又不能不使全部政權應該屬誰的問題尖銳化起來。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月、五月、六月間俄國的勝利，就是這樣的。當時有臨時政府存在，它握有半個政權，但却是較為現實的政權，因為當時軍隊還是支持它的。與此並存的，又有工兵代表蘇維埃，它也握有半個政權，雖然是不如臨時政府那樣現實的。當時布爾什維克底口號是推翻臨時政府，將全部政

權移交工人士兵代表蘇維埃。當時在布爾什維克中誰也未想到要加入臨時政府，因為要是你既要進行推翻這個政府的話，那就不能加入這個政府了。是否可說一九一七年三月至六月間俄國的環境是與現時中國的環境類似呢？不可以說的。其所以不可以說，不僅是因為俄國當時是處在無產階級革命之前面，而中國現在是站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前面；而且是因為俄國臨時政府當時是個反革命的政府，而現在的武漢政府則是資產階級民主這個字義上的革命的政府。

與此相聯繫，反對派是怎樣向我們建議的呢？反對派提議在中國應從速建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作為組織革命運動的中心。但是我們知道，工農代表蘇維埃並不是只是組織革命運動的中心而已。工農代表蘇維埃首先而且主要地乃是反對現存政權的起義機關，建立新的革命政權之機關。反

對派不懂得：只有當作起義機關，只有當作新政權底機關——才能把工農代表蘇維埃變成爲革命運動底中心。否則，工人代表蘇維埃便要變成虛構，變成現存政權底附屬品了，如一九一八年在德國，一九一七年七月在俄國就會是這樣的。反對派是否懂得：現在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是表示在蘇維埃和武漢政府之間造成兩重政權，而且必然不可避免地要走到推翻武漢政府的口號？季諾維也夫同志是否明白這個簡單的問題，我是很懷疑的。但托洛茨基同志是完全明白這個問題的，因爲他在自己的提綱中正面地說：『蘇維埃的口號是表示號召經過兩重政權之過渡政體去建立實際的政權機關。』（見托洛茨基：『中國革命與斯大林底提綱』）

這樣，便得個結論說，我們在中國建立蘇維埃，同時就是建立『兩重政權政體』，推翻武漢政府，建立新的革命政權。顯然的，托洛茨基同志

是拿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一時期的俄國革命歷史中的事件作榜樣的。當時在俄國確有過兩重政權，當時我們確曾推翻了臨時政府。但是我已經說過，當時沒有人想到要加入臨時政府。爲什麼托洛茨基同志不提議現在即刻退出國民黨和武漢政府呢？怎麼可以建立蘇維埃，建立兩重政權，而同時又加入這個準備要推翻的武漢政府本身呢？托洛茨基同志底提綱對於這個問題沒有回答。很明顯的，托洛茨基同志在這裏又陷入自己的矛盾迷魂陣裏了。他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混淆起來了。他『忘記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僅未曾完結，不僅還未勝利，而且僅只處在其發展的第一時期。托洛茨基同志不懂得拒絕支持武漢政府，提出兩重政權的口號，現在經過馬上成立蘇維埃以推翻武漢政府，——這是說對蔣介石和張作霖予以直接而毫無疑義的援助。

有人向我們說：在這種場合之下，那應當怎樣去了解一九〇五年在俄國建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這件事實呢？難道當時俄國不是經歷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嗎？但是：第一，那時一共只有兩個蘇維埃——即在列寧格勒與莫斯科——而且這兩個蘇維埃底存在，還沒有在俄國造成蘇維埃政權的系統。第二，列寧格勒與莫斯科蘇維埃當時曾經都是反對舊的沙皇政權的起義機關，這又再度證實，不能把蘇維埃只看作僅僅是一種組織革命底中心，只有把蘇維埃作為起義機關和新的政權機關，它才能成為這樣的中。第三，工人蘇維埃底歷史告訴我們說，這樣的蘇維埃要能夠存在和發展下去，只有在有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直接轉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順利條件時，因之，只有在有從資產階級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順利條件時才行。一九〇五年列寧格勒和莫斯科工人蘇維埃，以及一九一八年德國工人

蘇維埃之所以滅亡，難道不是因為當時沒有這些順利的條件嗎？

如果一九〇五年在俄國會經存在過像現在中國左派國民黨之類的廣大的革命組織，有可能那時在俄國是沒有蘇維埃的。不過，這樣的組織當時在俄國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在俄國工農中間是沒有民族壓迫底成份的，俄國人自己是在壓迫着其他民族，而像左派國民黨之類的組織，只有在有着民族壓迫的環境中才能產生，因為這種壓迫把國內的一切革命分子都結合到一個廣大的組織裏來了。只有瞎子才能否認左派國民黨有革命戰鬥機關底作用，反對中國封建殘餘和帝國主義底起義機關之作用。從這裏得到什麼結論呢？從這裏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中國左派國民黨對現時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大概與蘇維埃在一九〇五年對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演的作用是一樣的。如果在中國沒有像左派國民黨這樣普

遍而革命的民主組織，那應當別論了。但是，既有這樣一個特殊的、適合於中國條件特點且已證明了其對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一步發展有用的革命組織——那末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剛剛開始，還沒有獲得勝利而且還不會很快獲得勝利的現在，把這個多年造成的組織破壞了，這就未免太愚蠢和不智了。

有些同志，從這一點出發，便作出這樣的結論，說，在將來，在轉到無產階級革命時，還可利用國民黨，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組織形式，並且他們在這一點上看到有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平轉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革命之和平發展的可能，一般說來，自然是不排斥的。在我們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之初也曾說過革命有經過蘇維埃而和平發展的可能。但是：第一，國民黨不是蘇維埃，即使國民黨可適用於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之發

展，但這還不是說，國民黨就能適用於無產階級革命之發展，那時，工人代表蘇維埃却是無產階級專政之最適合的形式；第二，甚至在一九一七年在俄國有蘇維埃的條件之下，事實上和平轉到無產階級革命也已經不可能了；第三，在中國，無產階級底中心這樣的少，而中國革命底敵人却是那樣的強大而衆多，以致革命向前底每一推進和帝國主義者底每一襲擊，都不可避免地要伴以國民黨發生一些新的分裂和共產黨底力量則因國民黨的威信日形縮小而漸形擴大。我想，中國革命底和平發展道路，應當認爲是不會有的事。我想，在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過渡時期，在中國必須要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因爲沒有工農代表蘇維埃，這樣的轉變便是不可能的。起初應當在全中國展開土地運動，應當鞏固武漢，並支持它與封建官僚制度的鬥爭，應當幫助武漢澈底打倒反革命，應當到處

廣泛地發展農民協會、職工會和其他革命的組織，作為建立蘇維埃的基礎，應使中國共產黨鞏固它在農民與軍隊中的影響，——只有在做了這些事情以後，才必須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作為爭取新政權的機關，作為兩重政權底因素，作為準備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因素。

在中國建立工人蘇維埃，不是一句空話或一篇空洞的「革命的」宣言。不能像托洛茨基同志這樣輕浮地來看這個問題。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便是說要首先退出國民黨，因為一面建立蘇維埃，往前推進兩重政權，號召工農羣衆起來建立新政權，而同時又留在國民黨及其政府裏面，這是不可能的。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便是說要把現今在國民黨內部的聯盟，代以在國民黨以外的聯盟，代以類似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國布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聯盟的那種聯盟。爲什麼？因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

期的問題是要建立工農革命專政，故在國民黨內部聯盟的政策是完全與此相適應的，而在建立蘇維埃和在轉到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問題，是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蘇維埃政權，而要準備和建立這種政權，只有在一個政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有可能。

其次，說到工人代表蘇維埃問題，再還要注意一層。現在中國工人每月所得不過八元至十五元，是生活在不可能的條件之下，工作時間太長。這種情形，現在需要而且可以拿增加工資，施行八小時工作時間制，改良工人階級底居住條件等來解決。但在工人代表蘇維埃之下，工人底要求便不會僅止於此的。他們將對共產黨人說（而且他們是說得對的）：我們既有蘇維埃，而蘇維埃又是政權機關，那末，可否壓一壓資產階級，「略略」沒收其財產呢？要是共產黨人在工農代表蘇維埃存在之下，而不採取

沒收資產階級財產的辦法，那他們將成爲吹牛皮的大家了。在革命的現階段上，可以不可以，而且必要不必要採取這個辦法呢？不，是不必要的。將來在工農代表蘇維埃之下，可以不可以，而且必要不必要拒絕沒收資產階級底財產呢？不，是不可行的。但是要想在這種情形之下，保持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部的聯盟，——那就是陷於妄想，不了解在由資產階級革命轉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過渡時期中階級力量鬥爭底規律。

關於在中國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問題，就是這樣。

看吧，這個問題，並不像幾個論事輕浮的人，如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二同志之類所說的那麼簡單。

一般說來，按原則的觀點看，馬克思主義者是否可以並且跟革命的資產階級參加在一個共同的革命民主政黨裏或一個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府內合

作呢？有幾個反對派以爲這是不可允許的。但是馬克思主義底歷史告訴我們，在一定條件之下和一定時期之內，這種參加是完全可以允許的。我可以引舉馬克思於一八四八年在德國反對專制制度的革命時期爲例，當時馬克思及其同志加入了萊茵省資產階級民主聯合會，當時這個資產階級民主政黨底機關報『新萊茵報』就是由馬克思主編的。馬克思及其同志在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合會裏，曾把革命的資產階級推動前進，同時，並竭力批評自己同盟者底不徹底性，正如現在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內一樣，應竭力批評左派國民黨裏自己同盟者底搖擺和不徹底。大家都知道，僅至一八四九年秋季，馬克思及其同志才拋棄了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合會，開始進行工人階級底獨立組織並採用完全獨立的階級政策。看吧，馬克思甚至比中國共產黨還更進了一步，因爲中國共產黨是以無產階級底獨立的階級的

政黨加入國民黨的。馬克思及其同志在一八四八年加入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合會是否合目的性，這問題可以爭論，又可以不爭論。比如盧森堡就以爲，馬克思不應加入這個資產階級民主聯合會。這是個策略問題。但在原則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經認爲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在一定條件之下和一定時間之內，加入資產階級革命的政黨是可能而且合目的的，——這是毫無疑義的。至於馬克思主義者在一定條件和一定環境之下參加革命民主政府，且在這個政府裏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合作，關於這個問題已有恩格斯和列寧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底指示在前。大家都知道，恩格斯在其『無政府主義者底工作』一書中，曾經主張這種參加的。同樣，大家都知道，列寧在一九〇五年也曾經主張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政府是可以允許的。

五 兩條路綫

由上看來，在我們面前關於中國問題有兩個完全不同的路綫：共產國際底路綫和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二同志底路綫。

共產國際底路綫：封建殘餘及依靠於這種封建殘餘且爲各國帝國主義者所竭力支持的官僚軍閥上層建築物，乃是今日中國現實生活底基本的因素。中國在現時正在經歷着反對封建殘餘又反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基礎及內容。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乃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底中心。南京和南京政府乃是民族反革命底中心。支持武漢的政策，同時就是展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後果的政策。從這裏便產生了共產黨人之參加武漢國民黨和武漢革命

政府，這一參加，並不排斥共產黨人方面對國民黨內自己同盟者底不徹底性與動搖性之竭力批評，而且以此為前提。應當利用共產黨人底這種參加，以促進無產階級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者之作用，並使轉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期快些到來。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將要接近於完全勝利及在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將表現有轉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的時候——到了這時候，需要建立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作為二重政權底因素，作為為爭取新政權而鬥爭的機關，作為新政權之機關，蘇維埃政權之機關。到了這時候，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部的聯盟，應代以在國民黨以外的聯盟，而共產黨人應當成為中國新的革命之唯一的領導者。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還處在其發展初步階段的現在，在國民黨還是一種最適合和最適應於中國特殊條件的民族民主革命形式的現在，提議即刻建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即刻

建立兩重政權如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諾維也夫同志所幹者，——這無異是破壞革命運動，削弱武漢，使它容易倒台，幫助張作霖和蔣介石。

托洛茨基與季諾維也夫二同志底路線。封建主義殘餘在中國乃是布哈林同志底虛構。這種封建主義之殘餘，在中國或者簡直沒有，或者有而不多，不能有什麼大的意義。但土地革命，現在在中國却是有的。可是這個土地革命是從那裏來的，鬼也不知道（會議席上大笑）。但這個土地革命本身既是有的，那自然要設法支持的。現在主要的事不在於土地革命，而在於爭取中國海關獨立的革命，在於所謂反海關的革命。武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不是『虛構』（托洛茨基）；便是基瑪爾主義（季諾維也夫）。一方面，須要建立二重政權，以即刻建立蘇維埃的方法，推翻武漢政府（托洛茨基）；另一方面，須要鞏固武漢政府，須要有力而全面幫助武漢政府。

其辦法似乎也是立即成立蘇維埃（季諾維也夫）。照例，共產黨人似乎應當立刻退出這個「虛構」，即退出武漢政府和武漢國民黨。可是，他們却又以爲共產黨人留在這個「虛構」本身，即留在武漢政府和武漢國民黨內要好些。要是武漢既是「虛構」，那末爲什麼還要留在武漢呢？這只有上帝知道。要是誰不同意這一點，那誰就是變節者和出賣階級者。

所謂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二同志底路線，就是如此。

再沒有比這種所謂路線更混蛋、更荒謬的東西了。

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似乎我們不是同馬克思主義者在討論問題，而是與什麼脫離了實際生活的公務員們，或者說得好點，與「革命的」旅行家討論問題。這種旅行家週遊了蘇虎門和機司羅瓦得各城市，瞥見了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對於中國革命問題所規定的根本方針，後來從報紙上

看見，在中國，在事實上爆發了一個什麼革命，好像是土地革命，又好像是反海關革命。於是決定須要做一大堆提綱，——四月裏一個提綱，五月初又是第二個提綱，五月尾又是第三個提綱，做了這一大堆提綱後，把它們接二連三地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似乎以為多作糊塗而矛盾的提綱，就是挽救中國革命的基本手段。

同志們，這就是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兩條路綫。
在這兩條路綫之間你們去選擇吧。

（「論反對派」，俄文本五八五——六〇五頁）

時事問題簡評：關於中國

——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現在中國革命已經進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對於已經走過的道路，可以作若干的總結，並考察關於檢查共產國際在中國路綫的問題了。

存在着列寧主義底幾個策略原則，不考慮到這幾個策略原則，那就不可能正確地領導革命，更不可能檢查共產國際在中國的路綫。我們的反對派，早已忘記了這些原則。正因為反對派患着健忘病，所以還需要再一度

回憶一下這些原則。我是指列寧主義底這些策略原則而言的，就是：第一、在製定共產國際對於每個國度工人運動底領導指示時，務須要考慮到這些國度的民族特點與民族特殊性之原則；第二、各國共產黨務須利用極小的可能以保證無產階級須有羣衆同盟者之原則，即使這個羣衆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堅定的、不可靠的也罷；第三、務須考慮到這個真理之原則，就是爲了政治上教育千百萬羣衆，僅僅是宣傳和鼓動一項是不夠的，爲了這個目的，還需要羣衆自身的政治經驗。

我想，考慮到列寧主義底這些策略原則，乃是必要的條件，沒有這些必要的條件，便不可能對於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路線作馬克思主義的檢查。

現在我們就從這幾個策略原則的觀點來考察中國革命的問題。

雖然我黨有思想上的增長，但是可惜地在我們黨內還存在着某類「領導者」，這些「領導者」誠懇地相信，可根據電報，可根據某些公認的共產國際的一般原則來領導中國革命，不須考慮到中國經濟、中國政治制度、中國文化、中國道德、中國傳統底民族特點。這些「領導者」與真正領導者的區別，就在於不論任何時候他們的懷中總有着兩三個現成的、「適用」於一切國度和在任何條件之下所「必須」的公式。考慮到每個國度底民族特點和民族特殊性的問題，對於他們是不存在的。把共產國際底一般原則，跟每一個國度裏革命運動之民族特點聯系起來的問題，使共產國際底一般原則適應於個別國度底民族特點的問題，對他們是不存在的。他們不懂得，在各國共產黨已經長大而成爲羣衆性的政黨的現在，領導底主要任務，就在於發現、掌握及善於把每個國度革命運動底民族獨有的特

徵，跟共產國際的一般原則結合起來，以便促進和在實踐上使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目標能夠實現。因此，便企圖把對一切國度的領導千篇一律化。因此，便企圖機械地搬用若干一般的公式，不考慮到個別國度裏革命運動之具體條件。因此，在公式與個別國度裏革命運動之間便發生了永久的衝突，這種衝突乃是這些不幸的領導者領導之基本結果。

我們的反對派，正是屬於這種不幸的領導者之列。

反對派聽到，在中國正在進行着資產階級的革命。同時，他們知道，資產階級的革命，在俄國曾經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因此，對於中國便搬來了一個現成的公式：打倒與資產階級的任何共同行動，共產黨人應當立刻退出國民黨（一九二六年四月）。可是反對派忘記了，中國與一九〇五年的俄國不同，它是一個被帝國主義所壓迫的半殖民地國度；反對派忘記了，中國

的革命，因此不簡單地是資產階級的革命，而是反帝國主義型底資產階級革命；反對派忘記了，帝國主義在中國把持着工業、商業及交通底命脈；反對派忘記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不僅傷害着中國的勞動羣衆，而且也在傷害着中國資產階級底某些層級；反對派忘記了，中國資產階級因此在一定條件之下和在一定時期內，是可以支持中國革命的。在事實上，也確是如此，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如果，拿中國革命底廣州時期，向長江流域推進的時期，在國民黨分裂以前的時期來講，那末就不能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曾經是贊助中國革命的，不能不承認共產國際關於在一定時期和在一定條件之下允許與這個資產階級採取共同行動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結果反對派放棄了他們的舊的公式，而宣佈了一個『新的』公式：與中國資產階級的共同行動是必要的，共產黨人不應當退出國民黨（一九二七年四月）。

這是對反對派的第一個懲罰，爲的他們不願考慮到中國革命底民族特點。

反對派聽到，北京政府正在跟帝國主義各國底代表者關於中國關稅自主問題發生爭吵。反對派知道，關稅自主，首先是爲中國資本家所需要的。因此，又搬來了一個現成的公式：中國革命所以是民族革命，所以是反帝國主義革命，就是因爲它是以爭取中國關稅自主爲其主要目的。可是，反對派忘記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力量，主要地不在於對中國的關稅的限制，而在於它在中國握有工廠、作坊、礦山、鐵道、輪船、銀行、商店，——這些東西，都是從中國數萬萬的工人和農民身上榨取血汗的。反對派忘記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首先而且主要地應以下列事實來說明，就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是這樣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正在支持着和

數舞着中國人民底直接剝削者——封建主、軍閥、資本家、官僚等等，中國工人和農民，若不同時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便不能戰勝他們本國的這些剝削者。反對派忘記了，正是這種情況，乃是那些使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可以長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反對派忘記了，誰宣佈中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爲爭取關稅自主的革命，那末他就要否認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有長成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因爲，他把中國革命交給中國資產階級去領導了。在事實上，後來的事實也的確證明了，關稅自主在本質上乃是中國資產階級底綱領，因爲甚至像張作霖和蔣介石這樣的反動派大驢子，現在都是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建立中國關稅自主的。因此，反對派就轉上叉路，企圖溜開他們自己的關於關稅自主的公式，想悄悄地放棄它，而依附於共產國際關於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可以長成爲社會主義革

命的立場。

這是對反對派底第二個懲罰，爲的他們不願鄭重地研究中國革命底民族特點。

反對派聽到，商人資產階級曾經滲入了中國農村，他們把土地出租給一無所有的農民耕種。反對派知道，商人不是封建主。因此，又搬來了一個現成的公式：封建制度底殘餘以及農民反對封建制度殘餘的鬥爭，在中國革命中沒有嚴重的意義，現在在中國主要地不是土地革命，而是關於中國國家關稅受帝國主義各國操縱的問題。可是反對派沒有看到，中國經濟底特質，不在於商人資本之滲入農村，而在於在保存對農民的封建中世紀的剝削和壓迫方法之下封建殘餘底統治。跟中國農村裏商人資本存在之結合。反對派不懂得，那今日在中國毫無人道地掠奪和壓迫中國農民的任何

軍事官僚機構，在本質上都是封建殘餘統治和封建剝削方法跟鄉村裏商人資本存在底這種結合上面之政治上層建築物。在事實上，以後的事實也證明了，在中國確曾展開了聲勢煥赫的土地革命，這種土地革命的鋒芒，首先而且主要地是在反對中國的大小封建主。事實證明了，這種土地革命，曾經捲入了千千萬萬的農民，而有伸展於全中國之趨勢。事實證明了，封建主——現實的和活的封建主，不僅在中國存在着，而且在好多省份裏掌握着政權，使軍隊的將領服從自己的意志，使國民黨的領導服從自己的影響，接二連三地給中國革命以打擊。在這以後，否認封建殘餘和封建剝削體系之存在爲中國鄉村裏壓迫之基本形式，在這以後，不承認土地革命爲目前中國革命運動底基本事實，那就是說，反對彰明較著的事實。因此，反對派放棄了他們的關於封建殘餘和土地革命問題的舊公式。因此，反對

汲金剛爬行者躲開他們的舊公式，悄悄地默認共產國際立場的正確。

這就是對反對派的第三個懲罰，爲的他們不願估計到中國經濟底民族特點。

餘此類推。

公式與現實間的不一致——這就是反對派中不幸的領導者之命運。而這種不一致，乃是反對派跟列寧主義底有名的關於必須要計算到每個國度革命運動中民族特點與民族特殊性的策略原則決裂之直接結果。

列寧關於這個原則撮述如下：

「現在全部問題，就在於每個國度底共產黨人，既要完全自覺地計算到與機會主義及「左」的教條主義作鬥爭底基本的原則上的任務，同時並要計算到一些具體的特點，這些具體特點是這種鬥爭依照各個國度經濟、政治、文化、其民族成

份（如愛爾蘭等）、其殖民地、其宗教派別等等原有特徵而在各該國所採取並不可避免地必須採取的。由於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並由於它不會或無力創立真正集中的、真正起領導作用的、能够指導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國際策略去爲全世界蘇維埃共和國而鬥爭的中心，現在到處都感覺到對於第二國際的不滿，而且這種不滿還在擴大着和增長着。必須要認識清楚，這種起領導作用的中心，不論如何，不能建築在使鬥爭的策略規律千篇一律、死板劃一、以異爲同的基礎之上。只要各民族之間和各國度之間的民族的和國家的差別存在一天，——這些差別，甚至在全世界範圍內實現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還將要保持很久很久的——，則各國共產主義工人運動底國際策略之統一性，就不是要求排除多樣性，不是消滅民族的差別（這在目前是癡人作夢），而是要求這樣地應用共產主義底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這種應用把這些原則在某些部分上正確地變更，使這些原則正確地適應和應用於民族的和民族國家的差別。在每個國度採取具體方式，以

便·解·決·單·一·的·國·際·任·務·，·以·便·戰·勝·工·人·運·動·內·部·機·會·主·義·和·「·左·」·的·教·條·主·義·，
以·便·推·翻·資·產·階·級·，·以·便·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應·當·調·查·、
研·究·、·探·索·、·推·斷·、·及·把·握·民·族·特·點·和·民·族·特·殊·性·（·着·重·點·是·我·所·加·的·——·斯·大·
林·）——·這·就·是·一·切·先·進·國·度·（·不·僅·先·進·國·度·）·所·處·的·歷·史·時·期·底·主·要·任·務·。」
（見「共產主義中的「左傾」幼稚病」第十章結論）

共產國際底路線就是務須計算到列寧主義底這個策略原則之路線。

反之，反對派底路線，就是與這個策略原則決裂之路線。

這個決裂，也就是反對派在關於中國革命性質和前途的問題上不幸之根源。

現在來談列寧主義底第二個策略原則。

從中國革命底性質與前途中，便產生了一個關於無產階級在其爭取革

命勝利的鬥爭中的同盟者的問題。

關於無產階級同盟者的問題，乃是中國革命底基本問題之一。在中國無產階級面前站着好多強大的敵人：大小封建主、新舊軍閥底軍事官僚機構、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東方與西方的帝國主義者，——這些帝國主義者奪取了中國經濟生活底命脈，並用海陸軍來保持他們剝削中國人民的權利。爲了擊敗這些強大的敵人，除了其餘的一切以外，就需要有無產階級底靈活的和深思熟慮的政策，就需要善於利用敵人陣營裏的每個孔隙，善於給自己找尋同盟者，即使這些同盟者是動搖的、不堅定的同盟者也能，但須有一個條件，就是這些同盟者都是羣衆性的同盟者，他們不限制無產階級政黨底革命的宣傳與鼓動，不限制無產階級政黨關於組織工人階級與勞動羣衆的工作。這種政策，乃是列寧主義底第二個策略原則之

基本要求。要是沒有這種政策，那末無產階級底勝利是不可能的。

反對派却認爲這種政策是不正確的，非列寧主義的。不過這只是說明，他們連列寧主義底最後一點殘餘都喪失淨盡了，只是說明，他們離開列寧主義之遠，簡直是一個天，一個地。

在不久的過去，中國無產階級有沒有這種同盟者呢？

是的，是有過的。

在革命第一個階段底時期，革命曾經是全民族聯合戰綫之革命（廣州時期），這時無產階級底同盟者曾爲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中國革命運動底特點之一，就在於這些階級底代表者跟共產黨人在一起，在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的組織叫做國民黨的機構內進行共同的工作。這些同盟者，不是也不能是同等可靠的。他們之中，有的

是多少可靠的同盟者（農民、城市貧民）；有的是不大可靠和動搖的同盟者（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第三種是完全不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資產階級）。國民黨在當時不容爭辯地會是多少羣衆性的組織。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部的政策，就在於使民族資產階級底代表者（右派）孤立起來，利用他們以謀革命的利益，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左派）推向左邊來，把農民和城市貧民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當時廣州是不是中國革命運動底中心呢？無疑地，是的。現在只有患神經病的人才能否認這一點的。在這一時期，共產黨人有什麼成績呢？這就是：革命地區之擴大——因為廣東軍隊曾經進至長江流域；無產階級公開組織之可能（工會、罷工委員會）；共產主義組織之編在黨內；農民組織底最初細胞之成立（農民協會）；共產黨人之進入軍隊等。

這就是說，共產國際在這一時期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

在革命第二階段底時期，蔣介石和民族資產階級轉到反革命的陣營裏去了，而革命運動底中心，由廣州遷移至武漢，這時，無產階級底同盟者，曾爲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之跑到反革命陣營裏去，可用什麼來說明呢？第一，可用民族資產階級對工人革命運動展開的恐懼來說明；第二，可用帝國主義者在上海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壓力來說明。這樣，革命便喪失了民族資產階級。這是對革命的局部的損害。但是，革命却因此而進入到其發展的更高階段——進入到土地革命階段，使廣大的農民羣衆更接近於自己。這是對於革命的優點。在革命第二階段的時期，那時國民黨是不是羣衆性的組織呢？無疑地是的。它不容爭辯地是比廣州時期的國民黨更羣衆性的組織。當時武漢是不是革命運動底

中心呢？無疑地是的。現在只有瞎子才能否認這一點的。在相反的機會之下，武漢的管轄區域（湖北、湖南），那時就不會成爲共產黨所領導的土地革命最高發展之根據地。當時共產黨人對於國民黨的政策，就在於推動它左傾，把它轉變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之核心。當時有沒有這種轉變的可能呢？是的，是有過的。在任何場合之下，都沒有理由認爲這種可能性是除外的。當時，我們會直截了當地說過：要把武漢的國民黨轉變爲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核心，至少需要兩個條件：國民黨底徹底的民主化與國民黨對土地革命的直接贊助。要是共產黨人方面，放棄這種轉變之企圖，那是很愚蠢的。在這個時期，共產黨有什麼成就呢？共產黨在這一時期，從五六千人的一個小小的黨，長成爲有五六萬黨員的羣衆性的大黨；工人底職工會曾經長成爲巨大的全中國的團體，約有會員三百萬人；最初的農民

組織，曾經長成爲巨大的團體，包括有數千萬人；農民底土地運動，曾經發展到聲勢浩大的規模，在中國革命運動中佔據了中心位置；共產黨曾給自己獲得了公開的組織革命之可能性，共產黨成了土地革命底領導者。無產階級底領導權，開始由願望轉變爲事實了。誠然，中國共產黨曾不會利用這一時期的一切可能性。誠然，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這一時期，曾經犯了一系列的重大的錯誤。但是，以爲中國共產黨在所謂轉瞬之間，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就能成爲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那是可笑的。只要把我們蘇聯共產黨底歷史回憶一下（它曾經經歷了一連串的分裂、挫折、變節、叛變等等），就可以明白，真正的布爾什維克黨，不是在轉瞬之間產生出來的。

從此可得一個結論說：共產國際在這一時期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中國無產階級有沒有同盟者呢？是的，是有的。

這些同盟者就是農民和城市貧民。

當前這一時期的特徵，就是武漢國民黨領導之投奔到反革命的陣營裏去，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底離開革命。這一離開，可由下列事實來說明：第一，就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日益增長的土地革命和封建勢力對武漢政府壓力之恐懼；第二，就是帝國主義者在天津一帶的壓力，他們要求國民黨與共產黨分裂，作為進入北方的代價。反對派懷疑在中國有封建殘餘之存在。可是現在人人都看得清楚，封建殘餘不僅在中國存在着，而且它們甚至比目前革命的突進還要強大些。正因為帝國主義者和封建勢力目前在中國還很強大，所以，革命便遭受了暫時的失敗。革命在這次又失掉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正是革命暫時失敗底徵候。但是，革命却

因此把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羣衆更密切地團結在無產階級周圍，因而造成了無產階級領導的地盤，這是對革命的優點。

反對派拿共產國際底政策來說明革命底暫時失敗。可是只有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才能這樣說話的。只有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才能要求正確的政策，不論什麼時候和必須引導到對敵人的直接勝利。布爾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的政策是否正確呢？是的，是正確的。爲什麼一九〇五年革命却遭受了失敗呢，雖然那時有蘇維埃底存在，雖然那時有布爾什維克底正確政策？因爲，封建殘餘和專制政體在那時要比工人底革命運動強大些。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間的政策是否正確呢？是的，是正確的。爲什麼那時布爾什維克却遭受了失敗，雖然那時仍有蘇維埃之存在（這種蘇維埃當時曾叛變了布爾什維克），雖然有布爾什維克底正確政策？

因爲，俄國帝國主義在當時要比工人革命底運動強大些。正確的政策，並非無論何時都會達到和必須達到對敵人的直接勝利。對敵人的直接勝利，不僅取決於正確的政策，而且首先乃至主要地取決於階級力量之相互關係，取決於革命方面力量之優越，取決於敵人陣營裏的崩潰，取決於有利的國際環境。只有在這些條件之下，無產階級底正確政策，才能達到直接的勝利。但是，還有一個必須的要求，是正確政策在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都應當加以滿足的。這個要求，就是黨的政策要提高無產階級底戰鬥力，加強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的聯系，提高無產階級在這些羣衆中間的威信，把無產階級轉變爲革命的領導者。可否說，過去的這個時期，曾是對中國革命直接勝利之最高有利的條件？顯然的，是不能這樣說的。可否說，中國共產主義的政策沒有提高無產階級底戰鬥力，沒有加強無產階級與廣大

羣衆之聯系，沒有提高無產階級在這些羣衆中間的威信。顯然的，是不能這樣說的。只有瞎子才沒有看見，無產階級在這個時候曾經做到使廣大的農民羣衆，離開了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把他們團結在自己旗幟的周圍。共產黨在革命底第一個階段上，在廣州曾經經過了與民族資產階級底聯盟，爲的擴大革命底領域，造成羣衆性的黨，給自己建立公開的組織無產階級之可能性，並給自己開闢一條到農民中間去的道路。共產黨在革命底第二個階段上，在武漢，曾經經過了與國民黨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底聯盟，爲的增加自己的力量，擴大無產階級底組織，使廣大的農民羣衆離開國民黨領導，造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條件。民族資產階級在失掉了與廣大的人民羣衆之聯系以後，便跑到反革命的營壘裏去了。武漢國民黨底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爲土地革命所嚇倒並在數百萬農民羣衆

眼中聲名狼藉以後，也跟着民族資產階級跑了。但是，千萬萬農民羣衆却因此更密切地團結在無產階級底周圍，認爲無產階級是自己的唯一的可靠的領袖和領導者。只有正確的政策，才能達到這樣的結果，難道這不明白嗎？只有這種政策，才能提高無產階級底戰鬥力，難道這不明白嗎？除了我們底反對派中間的不幸的領導者以外，誰能否認這種政策的正確性與革命性？

反對派斷言說，武漢國民黨領導者之投到反革命方面去，說明了在革命第二個階段上與武漢國民黨聯盟政策之不正確。可是，只有忘記了布爾什維主義歷史和把列寧主義喪失盡淨的人，才能這樣說話的。在十月革命時期和在十月革命以後，直到一九一八年春季爲止，布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的革命聯盟政策，是否正確呢？我想，還無人決心否認這一聯盟

之正確性。這一聯盟底結局如何呢？結局是左派社會革命黨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可否根據這個理由斷言說，與社會革命黨聯盟的政策是不正確的？顯然的，是不能這樣說的。在中國革命底第二階段上，與武漢國民黨的革命聯盟政策是否正確的呢？我想，還無人決心否認這種聯盟在革命第二階段時期之正確性。反對派自己，當時（一九二七年四月）也斷言說，這種聯盟是正確的。怎麼能够在武漢國民黨領導者離開革命後的現在，就根據這種離開的理由，斷言說，與武漢國民黨的革命聯盟是不正確呢？只有朝秦暮楚之人，才能够運用這樣的『論辯』，難道這不明顯嗎？難道什麼人會斷言說，與武漢國民黨的聯盟乃是永遠而無窮無盡的聯盟嗎？難道在宇宙上有永遠而無窮無盡的聯盟嗎？反對派絲毫不懂得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的各階級和集團的革命聯盟之第二個策略原則，難道

這不明顯嗎？

列寧關於這個策略原則撮述如下：

「要能戰勝比較強大的敵人，只有用最大的努力，同時必須最精細地、最留心地、最謹慎地、最巧妙地一面利用敵人之間的那怕是最小的一切「空隙」，利用各國資產階級之間、各個國家內部各種資產階級派別和種類之間的一切利害矛盾，他方面要利用一切即令是最小的可能來使自己得到羣衆性的同盟者，即使甚至這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的、不可靠的、有條件的。誰不懂得這一點，那誰就絲毫不懂馬克思主義和一般的科學的現代社會主義（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誰不能在很長久的時間以內和在各種很複雜的政治形勢之中，在實際上證明自己確實善於運用這一真理，那誰就還沒有學會幫助革命的階級去爲全體勞動人類從各種剝削者之下解放出來而鬥爭。而以上所說的對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治權力以前和以後的時期，都是同樣適用的。」（見列寧著「共產主義運動

中的「左派幼稚病」)

反對派底路線，乃是與列寧主義底這個策略原則決裂之路綫，這難道不明顯嗎？

反之，共產國際底路線，乃是務須考慮到這個策略原則的路綫，這難道不明顯嗎？

現在來談列寧主義底第三個策略原則。

這個策略原則所講的是關於更換口號，關於這個更換程序與方法的問題。它所講的是關於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用什麼方法把對於黨的口號轉變為對於羣衆的口號；也就是關於這樣一個問題：應是怎樣和用什麼方法把羣衆引導到革命的立場上，使羣衆自己根據其親身的政治經驗，相信黨的口號之正確。要說服羣衆，僅靠宣傳和鼓動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需

要羣衆自己有其親身的政治經驗。要達到這一點，需要使廣大的羣衆自己親身體驗到推翻現制度的不可避免性，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之不可避免性。如果，先鋒隊——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就已經相信了顛覆米留柯夫和克倫斯基臨時政府之不可避免性，那自然是很好的。但是單是這一點，還不足以進而顛覆這個政府，還不足以把顛覆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當作當前口號提出來。爲了把『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公式，由用於最近時期的前途轉變爲當前口號，轉變爲直接行動的口號，還需要一個決定性的情況，就是使羣衆自己相信這個口號的正確，給黨以這種或那種援助，去實行這個口號。應當把當作用於最近將來前途的公式，與當作當前口號的公式，嚴格地區別開來。彼得堡的一羣布爾什維克，以波格達基也夫同志爲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正是在這一點上搞錯了，

那時他們過早地提出了「打倒臨時政府，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那時列寧曾把波格達基也夫這一羣同志的這種企圖，視作危險的冒險主義，公開斥責它。爲什麼？因爲後方和前方的廣大勞動羣衆還沒有準備接受這個口號。因爲這一羣同志，把當作前途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口號，跟當作當前口號的「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口號，混淆在一起了。因爲這一羣同志，單獨跑在前面了，使黨有遭受離開廣大羣衆，離開蘇維埃而完全孤立之威脅，因爲蘇維埃當時還是相信臨時政府之革命性的。

在半年以前，中國共產黨人應否提出「打倒武漢國民黨領導者」的口號呢？不，是不應當提出的。不應當提出，因爲這是危險的單獨跑在前面的行動，這要使共產黨人難以接近還在相信國民黨領導者的廣大勞動羣衆，這要使共產黨脫離廣大農民羣衆而孤立起來。不應當提出，因爲武漢國民

黨領導者，武漢國民黨中央，還沒有竭盡自己爲資產階級革命政府的作用，還沒有因其反對土地革命、因其反對工人階級、因其投到反革命方面而使自己在廣大勞動羣衆的眼中，自遭恥辱和威信墜地。我們總是說，只要武漢國民黨領導者還沒有竭盡自己爲資產階級革命政府的作用，就不能採取破壞武漢國民黨領導者底威信和代替它的方針，而應當讓它先竭盡自己的作用，以便然後在實踐上提出代替它的問題。現在，中國共產黨人是否應當提出『打倒武漢國民黨領導』的口號呢？是的，是應當的，而且一定應當的。在國民黨領導者已因其反對革命而自遭恥辱，使自己對廣大的工農羣衆採取仇視態度的現在，這個口號在人民大眾中間就獲得了有力的響應。現在每個工人和每個農民都懂得，共產黨人退出武漢政府和武漢國民黨中央，而提出『打倒武漢國民黨領導』的口號，是很正確的。因爲現

在擺在工人和農民羣衆面前的問題是：或者是選擇今日的國民黨領導者，這時就要放棄對這些羣衆的迫切要求之滿足，就要放棄土地革命；或者是選擇土地革命和根本改善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這時更換武漢國民黨的領導當局，就成爲羣衆的當前口號了。

列寧主義底第三個策略原則，就是這樣，這個原則所講的就是關於更換口號的問題，關於將廣大羣衆引導到新的革命的立場上來的方法與道路的問題，關於以自己的政策、以自己的行動、以適時的更換口號的辦法，去幫助廣大的勞動羣衆根據其親身的經驗認識黨的路綫正確的問題。

列寧關於這個策略原則撮述如下：

「僅靠一個先鋒隊是不能獲得勝利的。當整個階級、當廣大羣衆還沒有站在直接援助先鋒隊的立場上、或者至少還沒有站在對先鋒隊採取善意中立、而對其

敵人完全無力援助的立場上的時候，單單把一個先鋒隊投進到決定勝負的戰鬥裏去，這不僅是愚蠢，而且是犯罪。爲了使真正整個階級、使真正廣大的勞動羣衆和受資本所壓迫的羣衆，都能走到這種立場上，爲了這一點，單靠宣傳、單靠鼓動是不夠的。要達到這一點，還要有這些羣衆底親身的政治經驗（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這是一切偉大革命底根本規律。這個規律，現在不僅以驚人的力量和彰明昭著地被俄國所證實了，而且也被德國所證實了。不僅對於俄國的不文化的往往目不識丁的羣衆，而且對於德國的高度文化的、人人都識字的羣衆，也都需要切身體驗除無產階級專政以外的唯一命運——那第二國際底騎士們所組織的政府之完全軟弱無能、完全沒有氣節、完全沒有辦法、專門向資產階級獻媚、十分卑鄙懶惰，那極端反動派（俄國的柯爾尼洛夫，德國的卡普之徒）專政之完全不可避免，以便堅決地轉向共產主義。國際工人運動中的覺悟的先鋒隊，即各國共產黨、共產主義團體、共產主義派別底當前任務——就是善於把廣大的

羣衆（現在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下還是沉睡的、冷淡的、守舊的、遲鈍的、沒有覺醒的）引導到這種新的地位上來，或者，更正確些說，要善於不僅領導自己的黨，而且要善於在這些羣衆走近和轉到新立場的過程中去領導這些羣衆。」（見列寧：「左派」幼稚病」，九四——九五頁）

反對派底基本錯誤，就在於他們不了解列寧主義底這個策略原則之意思與意義，就在於他們不承認這個原則，就在於他們是有系統地破壞這個原則的。

他們（托洛茨基主義者）在一九一七年初就破壞了這個策略原則，那時，他們會企圖「跳過」還沒有完成的土地運動（可參看列寧的著作）。他們（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在企圖「跳過」職工會的反動性，不承認共產黨人在反動的工會內工作之合目的性，及否認與這種工會的羈

時聯盟之必要時，也是破壞了這個原則的。

他們（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拉狄克）在企圖「跳過」中國革命運動底民族特點（國民黨），企圖「跳過」中國人民大衆底落後性，於一九二六年四月間要求共產黨人立刻退出國民黨，而於一九二七年四月間在國民黨底發展階段還沒有完結的條件下，又提出立即組織蘇維埃的口號時，也是破壞了這個策略原則的。

反對派以爲，他們既然了解了、認識了國民黨領導當局之不澈底、動搖、不可靠，他們既然認識了與國民黨聯盟底暫時性與條件性（每個有修養的政治工作人員都不難認識這一點的），那末，這就充分地足以揭開反對國民黨、反對國民黨政權之「堅決行動」了，這就充分地足以使羣衆、使廣大的工農羣衆「一下子」支持「我們」和「我們的」「堅決行動」了。

反對派忘記了，在這裏，單是「我們的」了解，還遠不足以使中國共產黨人能夠領導羣衆。反對派忘記了，要達到這一點，還必須要使羣衆自己根據他們親身的經驗去認識國民黨領導當局底不可靠性、反動性、反革命性。反對派忘記了，革命不僅是先鋒隊、不僅是個別的即使是「偉大」的「人物」所「幹」的，並且首先，而且主要地是千千萬萬的人民大衆來幹的。反對派忘記了千千萬萬人民大衆底景況、理解、和對堅決行動之準備，這是不可思議的。

我們，黨，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曾經是否知道，需要顛覆米留柯夫、克倫斯基底臨時政府，是否知道，臨時政府之存在是與蘇維埃之活動不能並存的，是否知道政權應當轉交蘇維埃手中？是的，是知道的。當彼得堡以波格達基也夫同志爲首的有名的一羣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

四月間提出了『打倒臨時政府、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而企圖顛覆臨時政府的時候，爲什麼列寧把這一羣布爾什維克斥責爲冒險主義者呢？因爲廣大的勞動羣衆，一部分的工人，千百萬農民，廣大的軍隊羣衆，以及蘇維埃本身，都還沒有準備把這個口號當作當前口號來接受的。因爲，臨時政府和小資產階級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都還沒有竭盡自己的作用，都還沒有充分使自己在千百萬勞動羣衆的眼中威信掃地。因爲，列寧知道，爲了顛覆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僅僅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無產階級政黨之理解、意識是不够的，——要達到這一點，還必須要使羣衆自己根據其親身的經驗，相信這種路綫之正確。因爲，必須要經過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月、八月間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底一切聯合盛宴，經過他們的變節與背叛，必須要經過一九一七年前綫上底可恥的進

攻，必須要經過小資產階級政黨與柯爾尼諾夫和米留柯夫底「正直的」聯合，必須要經過柯爾尼諾夫底叛亂等等，才能使千千萬萬的勞動羣衆相信，顛覆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權之不可避免性。因爲，只有在這些條件之下，才能把當作前途的蘇維埃政權口號轉變爲當作當前口號的蘇維埃政權口號。

反對派底不幸，就在於他們自始至終犯了波格達基也夫等同志當時所犯的錯誤，他們拋棄了列寧底道路，寧願循着波格達基也夫同志底道路「前進」。

我們，黨，列寧，是否知道，當我們參加立憲會議選舉和當我們在必得堡召集該會議的時候，立憲會議是跟蘇維埃政權體系不能並存的？是的，是知道的。我們是爲了什麼召集這種立憲會議的？怎麼反對國會制度

的人——布爾什維克，在建設了蘇維埃政權以後，不僅參加了立憲會議的選舉，而且自己還召集了立憲會議？這是不是尾巴主義，落後於事件，逼迫羣衆後退，對「遠遠瞄準」策略的破壞？自然不是的。布爾什維克採取這種步驟，是爲了促進落後的人民大眾明明白白相信立憲會議之無用，其反動性，其反革命性。只有用這種辦法，才能使數千萬的農民羣衆靠近自己，促進立憲會議之瓦解。

列寧關於這一點寫道：

「我們曾於一九一七年九月到十一月參加了俄國資產階級國會底選舉，參加了立憲會議底選舉。我們底策略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呢？……我們俄國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是否有比西歐任何共產黨人更有權利來說國會主義在俄國在政治上已過了時呢？自然，我們有這種權利，因爲問題不在於資產

階級國會存在多久，而在於廣大勞苦羣衆對於採用蘇維埃制度、對於解散或允許解散資產階級民主國會的準備（思想上、政治上、實際上）達到什麼程度。至於在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一月間，城市工人階級、兵士和農民，由於種種特殊條件，已經少有地準備好了去採用蘇維埃制度和解散最民主的國會，這是無可爭辯的和確鑿的歷史事實。然而，布爾什維克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前以及在奪取政權以後，不是抵制立憲會議，而是參加了選舉……由此，可以得出一個毫無爭辯的結論：我們已經證明，甚至在蘇維埃共和國勝利之前幾星期，甚至在這種勝利之後，參加資產階級民主國會，不但沒危害革命的無產階級，而且使無產階級可以容易向落後的羣衆證明，爲什麼此種國會必須解散，使得解散國會更加容易成功，使「資產階級的國會主義」更容易「在政治上過時」。（見「左派」幼稚病）

由此可知，布爾什維克在事實上曾經怎樣應用了列寧主義底第三個策

略原則。

由此可知，應當怎樣把布爾什維主義底策略應用於中國，不論關於土地革命，也不論關於國民黨或關於蘇維埃的口號，都是如此。

顯然，反對派意欲說，中國革命已經遭受了完全的破產。自然，這是不對的。說到中國革命遭受了暫時的失敗，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這是怎樣的一種失敗，而且這種失敗有多麼大，——這就是當前問題之所在。有可能，這是一種大致長期的失敗，猶如俄國在一九〇五年所遭受的，那時，革命會中斷了整整十二年，直到一九一七年二月，它才以新的力量爆發起來，推翻了專制政體，掃清了新的蘇維埃革命的道路。不能認為這種前途是除外的。然而這還不是革命底完全的失敗，同樣，不能把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的失敗認為是最後的失敗。這不是完全的失敗，因為中國革命

在發展底現階段上的基本任務——土地革命，中國之革命的統一，對帝國主義羈絆之解除，——還正待解決。要是這種前途成爲現實的話，那自然，在中國還談不到馬上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因爲只有在革命高漲的環境之下，才能成立蘇維埃，才能使蘇維埃昌盛起來。不過，很難認爲這種前途是可信的。不論如何，目前還沒有理由認爲這種前途是可信的。這是沒有理由的，因爲反革命還沒有聯合起來，也不會很快聯合起來，即使一般說來他們必然要在什麼時候聯合起來的；因爲新舊軍閥相互間的混戰，又重新爆發起來，這個戰爭不能不削弱反革命的力量，同時不能不使農民破產，怨天怨地；因爲在中國還沒有這樣一個集團或這樣一個政府，這種集團或政府能够實行類似斯托雷賓式的改良，可用作統治集團的避雷針和續命湯；因爲要抑壓那亟欲奪得地主土地的千千萬萬的農民並使他們對土

地垂頭喪氣，那是很不容易的；因爲無產階級在勞動羣衆當中的威信，一天天在增漲着，他們的力量還是遠沒有被殲滅的。

有可能，中國革命的失敗，就其程度講，類似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敗，那時，蘇維埃曾經背叛了布爾什維克，當時他們迫不得已而處於祕密地位，那時經過數月之後，革命又重新展開，掃除了俄國帝國主義政府。自然，這種比擬是有條件的。我只是在那一切保留條件之下才作了這種比擬，如果把今日中國的局面和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局面之區別，加以注意，那末，就可以看出這些保留條件是有必要的。我援用這種比擬，只是爲了大概地描繪出中國革命失敗的程度。我想，這種前途是更可信的，要是這種前途變成現實的話，要是在最近的將來——不一定經過兩個月，而是經過半年，乃至一年——革命的新高漲成爲事實的話，那

末，關於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的問題，就可以當作當前口號、當作與資產階級政府對抗的平衡物，提在日程上了。爲什麼？因爲在革命底新高漲的條件之下，在其發展的該階段上，成立蘇維埃乃是已經完全成熟的問題了。昨天——在數月以前，中國共產黨人不應提出成立蘇維埃的口號，因爲這會是我們的反對派所固有的冒險主義，因爲國民黨的領導當局還沒有使自己信用掃地，而成爲革命的敵人。反之，現在，成立蘇維埃的口號，却成爲真正革命的口號了，如果（如果！）在最近的將來爆發了新的和雄壯的革命高潮的話。因此，現在還在革命高潮到來之前，除爭取以革命的領導代替目前的國民黨領導當局外，還應當在廣大的勞動羣衆中間進行蘇維埃思想底最廣泛的宣傳。不要太跑在前面，不要現在就成立蘇維埃，要記着，只有在雄壯的革命高漲底條件之下，蘇維埃才能昌盛起來。

反對派可以說，他們是『頭一個』說這話的人，可以說這就是他們叫做『遠遠瞄準』策略的東西。

寶貝們，這是不正確的，這是完全不正確的。這不是什麼『遠遠瞄準』的策略，而是搖擺不定的策略，是不斷瞄高或瞄低的策略。反對派曾在九二六年四月間要求共產黨人馬上退出國民黨，這就是瞄高了的策略，因為反對派自己後來迫不得已而承認共產黨人應當留在國民黨以內。反對派會宣佈中國革命為爭取關稅自主的革命，這就是瞄低了的策略，因為反對派自己後來迫不得已而爬行着躲開了他們的說法。反對派曾於一九二七年四月間宣稱中國的封建殘餘是被誇大了，而忘記了羣衆的土地運動之存在，這就是瞄低了的策略，因為反對派自己後來迫不得已而悄悄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反對派於一九二七年四月間曾提出馬上成立蘇維埃的口號，

這就是瞞高了的策略，因為反對派自己那時迫不得已而承認了自己陣營內的矛盾，其中一個（托洛茨基同志）會要求採取顛覆武漢政府的方針，反之，而別一個（季諾維也夫同志）却要求對該武漢政府給以『各方面的幫助』。然則，從什麼時候起，在我們中間曾把這種搖擺不定的策略，不斷瞞高或瞞低的策略，宣佈為『遠遠瞞準』的策略呢？

關於蘇維埃必須要說明的，就是共產國際在其文件中，在反對派以前，老早就當作前途說過了在中國成立蘇維埃的問題。至於反對派在今年春季爲了對抗革命的國民黨（國民黨在當時是革命的，不然季諾維也夫同志就用不着喊叫對國民黨予以『各方面的幫助』了）而提出的當作當前口號的蘇維埃，這是一種冒險行動，這是一種空喊的單獨跑在前面的行動，這正是波格達基也夫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所犯的那種冒險和那種單獨跑在

前面的行動。說蘇維埃的口號，在中國於最近將來可以成爲當前口號，還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反對派在今年春季所提出關於蘇維埃的口號不是危險而有害的冒險行動。同樣，說『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曾經被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間承認是必要和適時的口號（可看中央關於起義的有名的決定），還不能因此就得出結論說，波格達基也夫同志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提出這個口號不是有害和危險的冒險行動。波格達基也夫同志在一九一七年九月間，也可以說他是『頭一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就說到蘇維埃政權的人。這是否說，波格達基也夫同志是對的，而列寧把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的行動斥責爲冒險主義是不對的呢？顯然，波格達基也夫同志的桂冠並不能拯救了我們的反對派。

反對派不懂得，問題並不在於『頭一個』說話，單獨跑在前面，攪亂

革命事業；而在於說得恰合時機，並且要說得使所說的能被羣衆所掌握而變爲行動。

事實就是這樣的。

反對派離開了列寧主義的策略，其政策是超左的冒險主義——這就是總結。

（「論反對派」，俄文本六一五——六三六頁）

「國際形勢與蘇聯國防」：關於中國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

中央監委會全體聯席會議上的演說

現在來講中國的問題吧。關於反對派在中國革命性質與前途問題上的錯誤，我就不提及了。我所以不提及，是因為關於這個問題，已經說得很多、很確實，這裏不值得再去重複了。有人說，現階段的中國革命，彷彿是爭取關稅自主的革命（托洛茨基），關於這一點，我也不提及了。有人說，在中國似乎已沒有封建殘餘存在了，即使是存在的話，也沒有什麼

嚴重的意義，因之，土地革命在中國，就成了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了（托洛茨基和拉狄克），關於這一點，也不值得再提及了。關於反對派對中國問題的這些和諸如此類的錯誤，大家從我們的黨的刊物上一定知道的很多了。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列寧主義在解決殖民地和附庸國度革命問題時的基
本出發點吧。

共產國際和一般共產黨在處理殖民地和附庸國度革命運動問題時的出發點是在什麼地方呢？

是在於把帝國主義國度即壓迫別國人民的國度裏的革命，跟殖民地及附庸國度即受別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度裏的革命，加以嚴格的區別。帝國主義國度裏的革命是一回事：在那裏，資產階級是別國人民的壓迫者；

在那裏，資產階級在革命底一切階段上都是反革命的；在那裏，沒有解放鬥爭的要素——民族的要素。殖民地和附庸國度裏的革命，又是一回事：在那裏，別國的帝國主義之壓迫，乃是革命的因素之一；在那裏，這種壓迫不能不撞着民族資產階級；在那裏，民族資產階級，在某一階段上和某一時期內，可以支持本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在那裏，爭取解放的鬥爭要素——民族的要素，乃是一個革命的因素。倘若不作這一區別，不了解這個差別，把帝國主義國度裏的革命和殖民地國度裏的革命，混爲一談——那是說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離開了列寧主義的道路，而走上第二國際同道者的道路上去了。

列寧在其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報告中，關於這一點曾說道：

「我們提綱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是什麼呢？這就是對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之間的區別。我們強調這個區別，以與第二國際及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相對立。」（『列寧全集』，二十五卷，三五頁。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反對派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他們不了解和不承認這一類型的革命與彼一類型的革命之間的這一區別。

反對派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他們把俄國這個壓迫其他民族的、帝國主義國度裏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和中國這個半殖民地、被迫得不得來反對別國帝國主義壓迫的、被壓迫國度裏的革命看成一樣了。

在我們俄國，在一九〇五年，革命曾是反對資產階級，曾是反對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雖然革命曾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爲什麼呢？因爲帝國主義國度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不能不是反革命的。正因爲如此，當時

布爾什維克不曾談到而且也不能談到跟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作臨時的妥協和同盟。反對派以此爲出發，斷定說，在中國，在革命運動底一切階段上，也應當如此，跟民族資產階級暫時的妥協和同盟，不論任何時候和在任何條件之下，在中國都是不能允許的。可是反對派忘記了，只有不了解和不承認被壓迫國度革命和壓迫國度革命之間的區別的人，才會這樣說的，只有放棄列寧主義而滾到第二國際擁護者方面去的人，才會這樣說的。

列寧關於跟殖民地國度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可以成立暫時妥協和同盟一點，說道：

「共產國際應當跟殖民地和落後國度底資產階級民主派訂立暫時的妥協，甚至同盟，但不要跟他們合流起來，甚至在其萌芽的形式之下都要無條件地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二十五卷，二九〇頁）……「我們共產主義者，只有在

落後國度的資產階級解放運動是真正革命的運動，其代表者不阻礙我們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和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羣衆的時候，才應當而且將要援助這種運動。」（『列寧全集』，二十五卷，三五三頁。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列寧在俄國曾雷電交作似地反對跟資產階級妥協，却又承認在中國可以容許這種妥協和同盟，這是怎麼『發生』的呢？也許列寧錯了吧？也許列寧由革命的策略又回到機會主義的策略了吧？自然，不是的！這所以『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列寧懂得被壓迫國度革命和壓迫國度革命之間的區別。這所以『發生』的原因，是因為列寧懂得，殖民地國度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其發展的某一階段上，可以支持本國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反對派不願意懂得這一點，可是他們不願意懂得這一點，是因為他們離開了列寧底革命的策略，離開了列寧主義底革命的策略。

反對派的領袖們，在自己的演說中，竭力避免列寧的這些指示，害怕撞着了它們，雖然布哈林同志在其報告中曾直率地向他們提出了關於列寧這些指示的問題，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種情形呢？爲什麼他們要迴避列寧對於殖民地和附庸國度的這些人所週知的策略上的指示呢？爲什麼他們害怕這些指示呢？因爲他們害怕真理。因爲列寧的策略上的指示顛覆了托洛茨基主義對中國革命問題的一切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立場。

現在來談談中國革命的各階段吧。反對派混淆黑白，竟否認現在中國革命發展中有任何階段。難道有沒有若干發展階段的革命嗎？難道我們的革命沒有自己發展的幾個階段嗎？卽拿列寧的四月提綱來說，你也可以看到，列寧曾承認我國革命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其主要軸心爲土地運動；第二個階段是十月革命，其主要軸心爲無產

階級奪得政權。中國革命有幾個階段呢？據我看來，它必須有三個：第一個階段是全民民族聯合戰綫的革命，就是廣州時期，那時革命底鋒芒主要是打擊外國帝國主義，而民族資產階級則是支持革命運動的；第二個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國民革命軍達到長江之後，那時民族資產階級已經離開了革命，而土地運動已經發展成爲數萬萬農民的強大的革命（今日的中國革命正是處在其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上）；第三個階段是蘇維埃革命，這個革命還是沒有的，但是它正在到來着。誰要是不懂得，革命沒有若干發展階段，那是不會有的，誰要是不懂得，中國革命在其發展中有三個階段，那他就一點也不懂馬克思主義，一點也不懂中國問題。

中國革命第一個階段的特徵是什麼呢？

中國革命第一個階段的特徵，就是：第一，它會是全民民族聯合戰綫的

革命；第二，它的鋒芒主要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壓迫（香港罷工等等）。當時廣州是不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根據地呢？絕對是的。現在只有瞎子才會否認這的。

殖民地革命的第一個階段正應具有這樣的性質，對不對呢？我想，是對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關於中國和印度革命的補充提綱中，曾直截了當地說，在這些國度內，『外國的壓迫，仍時時在阻礙着社會生活的發展』，『因此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應該是推翻外國資本主義』。（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報告記錄，第六〇五頁。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中國革命的特徵，就在於它已經經過了自己發展的這個『第一步』，第一個階段，已經經過了全民族聯合戰綫革命的時期，而進入到其發展底第二個階段，進入到土地革命的時期了。

反之，例如，土耳其（基馬爾主義者）革命的特徵，它是擱淺在其發展的『第一步』上，擱淺在第一階段上，擱淺在資產階級解放運動的階段上，甚至不想轉到其發展的第二個階段上去，土地革命的階段上去。

國民黨和它的政府，在革命第一階段上，在廣州時期，是代表什麼的呢？當時它們是工人、農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當時廣州是不是革命運動的中心，革命的根據地呢？當時把廣州國民黨當作跟帝國主義進行解放鬥爭的政府而加以援助的政策，是不是正確的呢？當廣州和安哥拉進行反對帝國主義鬥爭的時候，我們對中國的廣州和土耳其的安哥拉予以幫助，對不對呢？是的，我們是對的。我們是對的，我們當時是依着列寧的足跡前進的，因為廣州和安哥拉的鬥爭，分散了帝國主義的力量，削弱了和損傷了帝國主義，因而也就是便利了世界革命根據地發

展的事業，因而也就是便利了蘇聯發展的事業。今日的反對派的領袖們，當時跟我們在一起支持廣州和安哥拉，給它們以相當的援助，對不對呢？是對的，讓人們去懷疑這吧。

但是怎樣來了解在殖民地革命第一個階段中跟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呢？這是不是說，共產黨人不應該增強工農反對地主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鬥爭，無產階級應該犧牲自己的、即使是最小限度的、即使是一分鐘的獨立性呢？不，決不是這個意思。統一戰綫，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和只有在這種條件之下，就是它不妨害共產黨去進行自己獨立的政治的和組織的工作，把無產階級組織爲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喚起農民反對地主，公開地組織工農的革命，以準備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條件時，才有革命的意義。我想，布哈林同志在其報告中根據大家所知道的文件，業已完全證明了，共

產國際正是以這種統一戰綫的理解，來啓示中國共產黨的。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同志在這裏引證了一件唯一的一九二六年十月拍往上海的電報，該電說：在上海佔領之前，暫勿增強土地運動。我決不承認這個電報是正確的。我從來不認爲，現在也不認爲，我們的中央是會毫無過錯的。個別的錯誤是會有的，這個電報，無可爭辯地，是錯誤的。可是，第一，這個電報，過了幾個星期之後（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未經反對派方面的任何指出，即被我們取消了。第二，反對派爲什麼直到現在對這件事沉默不言，爲什麼他們經過九個月之後，才記起了這個電報，爲什麼他們要把這個電報在九個月前即被我們取消的事實來隱瞞黨呢？因此，有人以爲這個電報曾決定了我們領導的路綫，這是惡意的造謠中傷。實際上，這是一件個別的插話式的電報，絕對不是共產國際路綫和我們領導的路綫。

所特有的。我重複一遍，這從這件電報經過幾星期之後即被許多文件所取消一事上，就可以看出來，這些文件會規定路綫，且爲我們領導所絕對特有的。

讓我來把這些文件引證幾處吧。

例如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即上述電報拍出後一個月，共產國際第七次全體會議決議案中有一段說道：

「當前形式底奇妙的特點，就是它的過渡性，此時無產階級應該從下面兩個前途中選擇一個：或與大部分資產階級聯盟，或進一步鞏固自己與農民的聯盟。要是無產階級不提出急進的土地政綱，那末它就不能把農民捲入革命鬥爭，而要失掉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領導權。」（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又說：

「如果·不·把·民·族·解·放·運·動·與·土·地·革·命·，·視·作·同·一·，·則·廣·東·國·民·政·府·在·革·命·中·便·不·能·保·持·政·權·，·便·不·能·對·外·國·帝·國·主·義·與·國·內·反·動·派·達·到·完·全·的·勝·利·。」（若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參看「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

這就是真正決定共產國際領導路線的文件。

非常奇怪的，反對派領袖們竟迴避了這個衆所週知的共產國際的文件，一字不提。

我把我於同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共產國際中國委員會上的演說，摘引一節，不會算是不客氣吧，該委員會，自然，我也是參加的，它會起草了七次擴大全會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這篇演說後來會印成單行本，題爲「論中國革命底前途」。茲引那次演說中的幾段於下：

「我知道：在國民黨人中間，甚至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有些人不主張解放開鄉村裏的革命，害怕農民捲入革命，破壞了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綫。同志們，這是最重大的謬誤。中國農民捲入革命越快越徹底，則中國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綫，亦將越強大越有力量。」

又說：

「我知道，在中國共產黨人中間，有些同志認爲工人爲改善其物質和法權地位的罷工是不應有的，勸告工人不要罷工。（會場喊聲：「在廣東和上海就有這樣的事實！」）同志們，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這是對中國無產階級底作用和比重之最嚴重的估計不足。這個絕對不好的現象，應當在提綱中指出來。要是中國共產黨人不利用現今順利的環境，去幫助工人改善其物質的和法權的地位，即使是經過罷工也罷，那是很大的錯誤。那時中國革命究竟爲的什麼呢？」（參看斯

大林：「論中國革命底前途」

第三個文件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發出的，那時中國各城市都圍攻共產國際，人們確信工人鬥爭的展開，定要引起恐慌、失業、工廠和作坊的關閉。該文件說：

「各城市中退却和制止工人改善其生活鬥爭的一般政策是不正確的。在農村裏面必須展開鬥爭，但同時並需要利用適當的時機，改善工人的物質和法權地位，竭力使工人的鬥爭具有組織性，排除過火和過度跑在前面的行動。特別要努力的，就是使城市中鬥爭的目標是朝向反對大資產階級層級，首先是反對帝國主義者，以便使中國小資產階級和中等階級都儘可能地留在反對共同敵人的統一戰綫的範圍以內。我們認為調解法庭、仲裁裁判等體系是適宜的，以保證這些機關中的正確的工人政策。同時，我們認為需要警告的，就是反對罷工和工人集會等

自由的命令是絕對不許可的。鑒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須有經常的報告。」

第四個文件是在蔣介石叛變前一個半月發出的，其中說：

「必須要加強軍隊中國民黨和共產黨支部的工作，凡沒有支部或有成立可能的地方，都須成立支部；凡成立共產黨支部不可能的地方，必須要彙隱密的共產黨員的幫助，進行強烈的的工作。」

必須要堅持武裝工農的方針，要將各地的農民委員會變爲有武裝自衛的真正權力機關等等。

必須要使共產黨到處要以共產黨出面；絕不容許自願的半秘密性的政策；共產黨萬不可作阻礙羣衆運動的活動；共產黨不應該隱蔽國民黨右派叛國和反動的政策；必須要動員羣衆圍繞在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周圍，以揭破他們。

必須要使一切忠於革命的工作者，必須注意：現時中國革命因階級力量的重新結合和帝國主義軍隊的集中，正處在危急關頭，革命的更進一步的勝利，只有

在發展羣衆運動的堅決方針之下，才有可能。不然，革命就要受到巨大的危險。所以，這個指示的執行比任何時期都必要。」

尙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即在國民黨右派和蔣介石叛變前一年，共產國際就警告中國共產黨，向它指示「須要設法使右派退出國民黨或將右派開除出去」。

共產國際對於殖民地革命第一階段上反帝統一戰綫的策略就是這麼理解的，並且還在繼續這樣理解着。

反對派是不是知道這些指導的文件呢？當然是知道的。爲什麼他們要對這些指導文件保守緘默呢？因爲他們是爲了吵嘴，而不是爲了求真理。

曾經有過一個時期，那時現在的反對派領袖們，特別是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兩位同志，還懂得一點列寧主義，在基本上對中國的革命運動所

堅持的政策，與共產國際所進行及列寧同志在其提綱中給我們所描畫者相同。我是指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間共產國際六次全會而言，那時季諾維也夫同志曾是共產國際的主席，那時他還是個列寧主義者，還沒有投到托洛茨基的營壘中去。我所以提及共產國際六次全會者，是因為存在着這次全會關於中國革命的決議案，這個議決案是在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間一致通過的，其中對於中國革命第二階段、廣州國民黨和廣州國民政府的估計，大體上和共產國際與聯共所作的一樣，可是反對派現在却否認這個估計了。我所以要提及這個決議案者，是因為季諾維也夫同志當時是投票贊成它的，中央委員中，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同志以及現時反對派的別的領袖們，都不除外，沒有一人曾提出過異議反對它。

讓我從這個決議案中引證幾段吧。

這個決議案中關於國民黨說道：

「中國工人底上海和香港的政治罷工（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月）在中國人民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解放鬥爭中造成了一個轉捩點。……無產階級的政治發動，對國內一切革命民主組織、首先對國民黨及廣州革命政府之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會給以有力的推動。國民黨——其基本核心是與中國共產黨員聯合起來行動的——自身，乃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城市民主派基於這些階層底共同的階級利益而反對外國帝國主義者及生活中的一切軍事封建制度、為爭取國家底獨立和統一的革命民主政權而鬥爭的一個革命聯盟。」（參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會決議案」，着點重是我加的——斯大林）

如此，廣州時期的國民黨，乃是四個階級的聯盟。你們瞧吧，這差不多就是當時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同志所崇拜的「馬爾丁諾夫主

該決議案關於廣州國民黨政府說道：

「國民黨在廣州所建立的革命政府，已經與工人、農民及城市民主派底最廣大羣衆聯系起來，並且依靠他們，擊敗了受帝國主義者所支持的反革命匪幫（而且實行着使廣東省全部政治生活急劇民主化的工作）。這樣，廣州政府就成爲中國人民爭取獨立鬥爭中的先鋒隊，它可作爲該國內將來的革命民主建設底榜樣。」

● 「馬爾丁諾夫主義」由馬爾丁諾夫（從前是少數派，經聯共第十二次大會通過，加入聯共的隊伍）名字得來的。馬爾丁諾夫在其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一篇論文中，曾提出了一個「不與現存政權發生堅決衝突和尖銳鬥爭，不經第二次革命」而和平地轉向無產階級專政的論題。爲了達到挑撥的目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黨聯盟，企圖把馬爾丁諾夫的這一錯誤論題的責任，轉嫁於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領導。

——譯者

(參看同上決議案。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可知廣州國民黨的政府，乃是四個階級的聯盟，它是個革命的政府，不但是革命的，而且甚至是中國未來的革命民主政府的模範。

該決議案關於工人、農民及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綫說道：

「在這種新的危險面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應該發展最廣泛的政治工作，並組織羣衆的行動去支持國民軍底鬥爭，利用帝國主義者營壘中的內部矛盾，而以革命民主組織領導下的最廣大的人民各階層（工人、農民和資產階級）底民族革命的統一戰綫去與帝國主義者對立起來。」（參看同上決議案。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這樣看來，在殖民地國度內，在殖民地革命的一定階段上，跟資產階級的暫時聯盟和妥協，不但可以容許，而且簡直是必要的。

這跟列寧在其關於共產主義者在殖民地 and 附庸國家內策略的有名的指示中所告訴我們的話，如出一轍，難道這不是事實嗎？所可惜的，只是季諾維也夫同志竟然把這忘記了。

該決議案關於退出國民黨的問題說道：

「暫時聚集在國民黨周圍的中國大資產階級，其個別層級，在最近一年來，已經離開了該黨，以致引起了國民黨右翼底不大的集團之形成；這個集團公然出而反對國民黨與勞動羣衆的密切聯合，主張從國民黨內開除共產黨員，並且反對廣州政府底革命政策。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六年一月）對這個右翼之斥責以及對國民黨和共產黨人戰鬥聯盟底必要性之確認，遂鞏固了國民黨和廣州政府底活動之革命方向，而給國民黨保證了無產階級底革命的支持。」（參看同上決議案。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可知在中國革命第一階段上，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會成爲嚴重的錯

誤。所可惜的，只是曾經舉手贊成這個議決案的季諾維也夫同志，過了個把月，便把它忘記得一乾二淨了。因為不出一九二六年四月間（經過一個月），季諾維也夫即要求共產黨人立刻退出國民黨。

該決議案關於中國共產黨中的各種傾向和不許跳過革命之國民黨階段。說道：

「中國共產黨人底政治自決，將在反對兩種同樣有害的偏向的鬥爭中發展起來：即一面要反對右的取消主義，此種偏向是抹煞中國無產階級獨立的階級任務，而走同與一般的民主的民族運動底不拘形式的合流；另一方面要反對極端左的情緒，這一偏向力謀跳過運動底革命民主階段，直接走向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底任務，而忘掉了農民，這個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底基本的和決定的要素。」（參看同上決議案。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你們瞧吧，所有這一切，都是現在反對派想跳過中國國民黨發展階

段、輕視農民運動、而立刻跳到蘇維埃方面去的確證。這是很中肯的。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等同志是不是知道這個決議案呢？

應該說是知道的。無論如何，季諾維也夫同志是不能不知道這個決議案的，因為這個決議案，是在他主席之下，在共產國際第六次全會上通過了的，而且他本人曾是舉手贊成的。爲什麼現在反對派領袖們要迴避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最高機關的這一個決議案呢？爲什麼他們要對這個議決案保守緘默呢？因爲在中國革命的一切問題上，這個決議案會掉轉來反對他們的。因爲這個決議案要顛覆今日反對派底全部托洛茨基派的立場的。因爲他們已經離開了共產國際，已經離開了列寧主義，而現在他們害怕自己的過去，害怕自己的後影，不得不怯懦地來迴避共產國際六次全會的決議案。

中國革命第一階段的情形，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談中國革命的第二個階段吧。

如果第一階段的特點是：革命的鋒芒主要是反對外國帝國主義，那末，第二階段的特點，則是革命的鋒芒主要是反對內部敵人，首先是反對封建主，反對封建制度。第一階段是不是解決了它的推翻外國帝國主義的任務呢？沒有，沒有解決。它把這一任務之進行，轉交給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了。它僅給了革命的羣衆以反對帝國主義的頭一步躍進，以便結束自己的賽跑，將這個事業交給未來。可以說，革命的第二階段也不能完全解決驅逐帝國主義的任務。它將給廣大的中國工農羣衆以反對帝國主義的進一步的躍進，它之所以這麼做，是爲了將這個事業之完成交給中國革命的下一階段——蘇維埃階段。這是毫不足爲奇的。在我國革命的歷史上，也

有類似的事實，雖然是在另一種環境之下，和在另一個情況之下，難道這不是人所週知的事嗎？我國革命的第一階段，並沒有完完全全解決自己的完成土地革命的任務，而是把這個任務交給革命的下一階段，交給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才完完全全解決了根除封建殘餘的任務，難道這不是衆所週知的事嗎？所以，要是在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上，不能全部完成土地革命，要是革命的第二階段，在發動千百萬農民羣衆，使他們起來反對封建殘餘之後，要把這一事業交給革命的下一階段、蘇維埃階段去完成，這是一點都不足奇怪的。這只是對中國未來的蘇維埃革命之好處。

在中國革命的第二階段上，革命運動的中心，顯然已由廣州移到武漢，同時，與武漢革命中心並存的，在南京並造成了反革命的中心，這時共產黨人的任務是在什麼地方呢？是在於盡量利用黨，無產階級（工會），

農民（農會）和一般革命底公開組織之全部可能性。是在於推動武漢的國民黨人到左邊來，到土地革命方面來。是在於把武漢的國民黨變為反對反革命的中心，變為未來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的核心。

這個政策是不是正確的呢？事實證明，這個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它能够以革命進一步發展的精神去教育廣大的工農羣衆。

當時反對派會要求立刻成立工農代表蘇維埃。可是這會是冒險主義，會是冒險主義的冒進，因為立刻成立蘇維埃，在當時是表示跳過左派國民黨的發展階段。爲什麼？因為武漢的國民黨，曾支持和共產黨人的聯盟，還沒有在廣大的工農羣衆的眼中失掉信用和揭破自己的真面目，還沒有竭盡其爲資產階級革命組織的作用。因為在羣衆還沒有根據他們親身的經驗相信這個政府的無用，相信有推翻這個政府的必要的當兒，提出蘇維埃和。

推翻武漢政府的口號，那是說冒進，脫離羣衆，失去羣衆對自己的支持，因而斷送業已開始的事業。反對派以爲，要是他們懂得了武漢國民黨的不可靠、不堅固和不够革命（一切在政治上有經驗的工作者都不難懂得這一點的），那末這就完全足够使羣衆也懂得這一切，完全足够以蘇維埃來代替國民黨，而領導羣衆前進了。不過這是反對派底一個慣常的超左的錯誤，他們往往把自己的意識和理解，當作千百萬工農羣衆的意識和理解。反對派要是說黨應該走在前面，都是不錯的。這是一個普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論則，不遵守這個論則，就沒有也不能有真正的共產黨。不過這只是真理的一部分。全部的真理，就在於黨不僅要走在前面，而且要領導千百萬羣衆前進。走在前面，而不領導千百萬羣衆，那是說在事實上是落後於運動，作了運動的尾巴了。走在前面，脫離後衛，不善於領導後衛，那就是

說造成冒進，足以在某一時期毀壞羣衆的前進。老實地說，列寧主義底領導，就在於先鋒善於領導後衛，先鋒前進時，不與羣衆脫離。然而要使先鋒不與羣衆脫離，要使先鋒能够真正領導千百萬羣衆，就需要有一個決定的條件，就是使羣衆自己根據他們親身的經驗，相信先鋒隊底指示、命令和口號的正確。反對派的不幸，正在於他們不承認這個簡單的列寧主義的領導千百萬羣衆的規則，不懂得，如果沒有千百萬羣衆的支持，單是一個黨，單是一個先進的集團，是不能够進行革命的，不懂得，歸根結蒂，革命乃是由千百萬勞動羣衆來「幹」的。

我們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雖然曾經相信，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即有推翻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必要，但是當時爲什麼我們不提出推翻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實踐的口號呢？因爲後方和前

纓的廣大勞動羣衆，以及蘇維埃本身，還都沒有準備消化這個口號，他們還相信臨時政府的革命性。因爲臨時政府還沒有因其對後方和前纓的反革命之支持而使自己信用掃地。一九一七年四月間，波格達基也夫派在列寧格勒曾提出立刻推翻臨時政府和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口號，列寧爲什麼要責斥他呢？因爲，波格達基也夫的企圖是個危險的向前冒進。這一冒進有造成布爾什維克黨脫離千百萬工農羣衆之虞。

政治上的冒險主義，在中國革命問題上的波格達基也夫主義，——這就是現在殺死我們的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東西。

季諾維也夫同志說，我在說到波格達基也夫主義時，是把今日的中國革命和十月革命視爲同一了。當然，這是胡說八道。第一，我自己在「時事問題簡評」一文中，曾有保留地說：「這種比擬是有條件的」，「我只

是在那一切保留條件之下，作了這種比擬，就是如果把今日中國的局面與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局面不同，加以注意，就可以看出，這些條件是有必要的。」第二，如果有人說，在評述某國革命中的某些傾向和某些錯誤時，萬不可一般地與別國的革命相比，那是很愚蠢的。難道一國的革命，不能學習別國的革命嗎，即使這些革命不是同一類型的？不然，革命的科學應歸到什麼地方去呢？老實說，季諾維也夫是否認有革命科學之可能的。列寧於十月革命前一時期，曾經責斥契海才、蔡雷特利、斯却克洛夫等爲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中的『路易·勃朗主義』，難道這不是事實嗎？請你把列寧的『路易·勃朗主義』一文讀一下，就會明白，列寧在評述十月革命前某些活動者的錯誤時，曾經廣泛地利用了與一八四八年法國革命相比的方法，雖然列寧很明白，一八四八年的法國革命和我們的十月革命

不是同一類型的革命。如果可以說，在十月革命前的一時期，契海才和蔡雷特利是『路易·勃朗主義』，那末，爲什麼不能說，在中國土地革命時期，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是『波格達基也夫主義』呢？

反對派斷言說，武漢不是革命運動的中心。但是爲什麼當時季諾維也夫同志却要說，對武漢的國民黨，『必須要予以各方面的幫助』，以便使它成爲反對中國卡維涅克們鬥爭的中心呢？爲什麼不是別的地方，正是武漢的轄境，曾成了土地運動高度發展的中心呢？正是武漢的轄境（湖南、湖北），在本年初曾成爲土地運動高度發展的中心，難道這不是事實嗎？爲什麼沒有羣衆的土地運動的廣州，可以叫做『革命根據地』（托茨茨基語），而在其轄境內開始了和發展了土地革命的武漢，却不能叫做革命運動的中心，『根據地』呢？在這種情形之下，反對派會要求共產黨留在武

漢國民黨和武漢政府內，用什麼來說明呢？難道反對派在一九二七年四月間是主張和『反革命的』武漢國民黨成立聯盟嗎？反對派爲什麼這樣『健忘』和糊塗呢？

反對派幸災樂禍，說，跟武漢國民黨的聯盟，結果是短命的，他們並且確定說，共產國際不會警告中國共產黨人，說武漢國民黨有崩潰之可能。反對派的幸災樂禍，只是證明了他們的政治的破產，這是不用證明的了。顯然，反對派以爲，在殖民地國度裏，跟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應當是長久的。然而，只有把列寧主義喪失盡淨的人，才會這樣想的。倘若封建主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在當前階段上，要比革命强大些，倘若這些敵對勢力的壓力，曾引導到武漢國民黨的向右轉變和中國革命的暫時失敗，那末只有患失敗主義病的人，才會對這幸災樂禍的。至於反對派斷言

說，共產國際不曾警告中國共產黨，說武漢國民黨有崩潰的可能，那末這更是那現在充滿反對派武器庫的很平常的誹謗之一了。

讓我引幾個文件來駁斥反對派的誹謗吧。

第一個文件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發出的，其中說：

「現在在國民黨對內政策中最主要的是在「鄉村一切政權歸農民協會和農民委員會」口號之下，在各省，特別是在廣東有系統地開展土地革命。革命和國民黨成功的基礎，就在這裏。在中國，建立廣大而強盛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軍隊之基礎，就在這裏。在實踐上，沒收土地的口號，在那些有強大土地運動的省份，如湖南、廣東等省，是完全合時的。否則，開展土地革命是不可能的……（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現在應該從革命的工農當中開始組織八個或十個師團，以絕對可靠的分子任

官長。這將是在前綫和後方保衛武漢，解除不可靠部隊的警衛軍。這是刻不容緩的工作。

應該加緊在蔣介石後方和部隊中的分化工作，並對廣東的農民游擊隊予以幫助，在該省，地主的政權是特別不能夠容忍的了。」

第二個文件是一九二七年五月發出的，其中說：

「沒有土地革命，則勝利是不可能的。沒有土地革命，則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就要變成不可靠的軍閥們底可憐的玩具。反對過火是應當的，但不要派軍隊去，而應經過農民協會去執行。我們堅決地主張由下而上的實際上的奪取土地。對譚平山出巡的疑懼是有些根據的。不應脫離農民運動，而應用各種方法去促進它。不然，事情就要弄糟了。」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幾位元老，害怕事變，表示動搖、妥協。應當儘可能地從下而上吸收新的工農領袖加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他們的勇敢的呼聲，可使元

老們變成堅決的。或者把他們拋擲出去。目前國民黨的機構應當改變。國民黨的上層務須加以刷新，而補充以從土地革命中所提拔出來的新的領袖，並應利用工會和農會中的千百萬會員擴大外圍。不然，國民黨就有脫離實際生活，喪失一切信心的危險。

應當消滅對不可靠的軍閥之依賴。應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加上五萬湖南湖北的革命的工農，編成幾個新的軍團，利用軍官學校的學生做官長，並且要刻不容緩地及時組織自己的可靠的軍隊。不然，就不能担保不失敗。這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是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應組織革命軍事法庭，以非共產黨員的有聲望的國民黨人為首腦。處罰與蔣介石保持聯系或挑唆兵士殘殺人民、殘殺工農的軍官。光是勸告是不够的。應該立即開始行動了。應該懲罰惡漢了。假使國民黨人不學做革命的雅谷賓黨人，那末他們對於人民，對於革命都要滅亡的。」（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瞧吧，共產國際曾預先看到了事變，它時時放出危險的警號，警告中國共產黨人：倘若國民黨人不能做革命的雅谷賓黨人，那末武漢國民黨就會滅亡的。

加米涅夫同志說，中國革命的失敗，應歸咎於共產國際的政策，並說我們『在中國培植了卡維涅克們』。同志們，只有甘心叛黨的人，才會這樣說我們的黨的。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失敗時期，即俄國卡維涅克們登台的時候，孟什維克就是這麼來說布爾什維克的。列寧在其『關於口號』一文中寫道，七月的失敗是『卡維涅克們的勝利』。當時孟什維克幸災樂禍說，俄國卡維涅克派的出現，應歸咎於列寧的政策。加米涅夫同志是否想過，俄國卡維涅克們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失敗時期的出現，應歸咎於列寧的政策，我黨的政策，不應歸咎於別人？在這個場合之下，加米涅夫同志，

配不配模仿孟什維克老爺們呢（哄笑）？我未曾想過，反對派中的同志們竟會弄得這麼卑劣……大家知道，一九〇五年革命遭受失敗了，而且這次失敗，比現時中國革命的失敗，更爲深刻。孟什維克當時曾說，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應歸咎於布爾什維克底極端革命的策略。加米涅夫同志不是在這裏想把孟什維克對我國革命史之解釋作爲榜樣來打擊布爾什維克呢？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失敗是用什麼來解釋呢？也許是要用列寧的政策，而不是用階級力量的對比來解釋吧？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失敗是用什麼來解釋呢？也許要用共產國際的政策，而不是用階級力量的對比來解釋吧？怎麼能夠斷言說：某個黨的策略能夠廢止或顛倒階級力量的對比呢？我們在一九〇五年的政策是否正確的呢？爲什麼當時我們遭受了失敗呢？難道事實沒有告訴我們說：在反對派的政策之下，中國革命走上失敗

比實際上更要快嗎？凡忘掉了革命期間階級力量的對比而企圖僅用某黨的策略來解釋一切的人，怎樣稱呼他呢？關於此種人，只能說一句話，就是他們已經脫離馬克思主義了。

作幾句結論吧。反對派的主要的錯誤如下：

第一，反對派不懂得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

第二，反對派沒有看見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殖民地國度裏的革命和帝國主義國度裏的革命之間的區別。

第三，反對派完全放棄了列寧主義在革命第一階段上對殖民地國度內民族資產階級關係問題上的策略。

第四，反對派不懂得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的問題。

第五，反對派違反了列寧主義對於先鋒（黨）和後衛（幾百萬的勞動

羣衆）之間相互關係問題上的策略之基礎。

第六，反對派完全放棄了共產國際六次和七次全會的決議案。

反對派喧囂地頌揚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政策，說，這個政策倘被採用，中國現時的情形也許要好些了。在反對派所犯的這些重大的錯誤之下，倘若中國共產黨採取了反對派的反列寧主義的、冒險主義的政策，那它也許完全走入絕路了，這是不用證明的了。中國共產黨在一個短促的期間內，既由二千人的一个小集團，增長而為一個有六萬黨員的羣衆性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期間內既做到將三百萬無產者組織到工會中來；中國共產黨既做到從沉睡中喚醒了千百萬的農民，並把數千萬的農民吸引在革命的農民協會以內；中國共產黨既做到在這個期間徵收了國民革命軍中的十幾團和幾師到自己方面來；中國共產黨既做到在這個期間將無產階級領導

權的思想由願望變成事實，總之，中國共產黨既做到在一個很短的期間獲得了這一切勝利，那末這正是因為它依了列寧所指示的道路，依了共產國際所指示的道路前進的原故。

不用說，在反對派的政策之下，在他們的錯誤之下，在他們的對殖民地革命問題的反列寧主義的方針之下，中國革命的這些勝利，不是一無所得，便是得到的很少很少。

只有超左的變節者和冒險主義者，才會對這一點懷疑的。

（「論反對派」，俄文本六四四——六六四頁）